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3卷

杰出人物

主编 潘光

副主编 虞卫东 陈心仪 刘夏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3卷

杰出人物

Sources on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Vol.III
Outstanding Figures

主编 潘光
副主编 虞卫东 陈心仪 刘夏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卷介绍了来华犹太难民中20位杰出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罗生特、“洋八路”汉斯·米勒、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汉斯·希伯、音乐大师卫登堡、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的韩芬、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爱泼斯坦、八宝山墓碑上的奥地利友人严斐德、“波兰白求恩”傅拉都、犹太难民画家白绿黑、从难民到巨富的艾森伯格、犹太作曲家弗兰克尔、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鲁门撒尔、上海犹太画坛巨擘希夫、从难民少年成长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斯特恩、参加中国革命的红医战士傅莱、从跟着“阿妈”学画到为总统画像的彼得·迈克斯、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魏璐丝、视上海如故乡的工程师韩布葛、比较语言学专家罗逸民、职业革命家和优秀摄影师叶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三卷,杰出人物 /

潘光等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13-16558-9

I. ①来… II. ①潘… III. ①犹太人—难民—史料—

中国—现代 IV. 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9255号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三卷): 杰出人物

主 编 潘 光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64071208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上海春秋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4千字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6558-9/K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33854186

谨以此书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1937.7.7）

淞沪会战爆发80周年（1937.8.13）

犹太难民来华避难80周年（1937-1939）

前　言

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它们对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的拒绝，等于是扼杀了一个生命。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人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其总人数达到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等城市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中国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这一人数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当600万犹太人在欧洲被屠杀之时，来华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艰难岁月，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目前，仍然健在的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作出的一大“善举”和贡献，受到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我记得，20多年前，在

欧洲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但只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作主题发言，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会后几天，奥地利议会决定设立基金，对纳粹暴政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给予赔偿。现在，每年都有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来到我担任主任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

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 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进入21世纪，上海正式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不仅以色列总统、总理、各国犹太名流，而且其他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来上海都要访问该馆，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来到纪念馆“上课”。

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和“避难地”的代名词。上海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人民互相支持的难忘历史成了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关于这个题材的论文、著作、小说、电影、戏剧、展览会不断涌现，因为这个题目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有人公然出来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来华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

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还通过研讨会、展览会、系列讲座、媒体和影视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我们对该历史事件的基础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特别是对许多还健在的犹太难民尚未进行采访,对一些第一手资料也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剖析。

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使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6年多来,我们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及档案资料。经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我们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推出质量更高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我们推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的完全是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期、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力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将已收集到的大量与来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报刊、记忆、人物、评析等各方面资料整理出版,为课题最终成果的完成作好准备。正在我们在2015年推出若干“犹太难民与上海”著作之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决定开始实施“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建立

了密切合作关系。这样，我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今后的一系列著作都将纳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之内。《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便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文件报刊资料；第二卷是记忆资料，包括口述和文字记忆；第三卷是关于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资料；第四卷是本课题组专家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关于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和评析的汇集。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三卷）：杰出人物》主要汇集了来华犹太难民中20位杰出人物的资料：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罗生特、“洋八路”汉斯·米勒、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犹太难民中的音乐大师卫登堡、为中国和上海精神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韩芬教授、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爱泼斯坦、八宝山墓碑上的奥地利友人严斐德、国际主义战士傅拉都、犹太难民中的著名画家白绿黑、从难民到巨富的艾森伯格、德国犹太作曲家弗兰克尔、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犹太难民布鲁门撒尔、上海犹太画坛巨擘希夫、从难民少年成长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赫尔穆特·斯特恩、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红医战士傅莱、从跟着“阿妈”学画到为总统画像的著名画家彼得·迈克斯、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魏璐丝、视上海如故乡的犹太工程师韩布葛、犹太难民中的比较语言学国际权威罗逸民、热爱中国的职业革命家和优秀摄影家叶华。在编写这些犹太民族优秀儿女在中国的感人事迹时，我时常激动得热泪盈眶，相信读者们一定会有同感。

需要指出，《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三卷）：杰出人物》不可能包括来华犹太难民中所有杰出人物的资料。有些人物的资料现在还比较简单，不能单独成篇；有些人物的事迹可

能在其他各卷中出现,本卷不再重复;还有些人的事迹我们至今仍不了解或了解不多。但可以相信,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还会发现更多的关于犹太难民中杰出人物的资料。

还要指出,包括本卷在内的《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四卷只是发表了我们收集的资料中的一小部分,将来我们当然还要把其他所有资料奉献给读者,也许不是通过出书的形式,而是要建立一个资料库或数据库。为此,我们正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各级档案馆、上海市政协等相关单位进行商议和协调。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历史上那些难忘篇章仍然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包括我们课题组成员和交大出版社编辑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长期以来辛勤工作,收集、整理、研究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活资料,就是要为后世保存重要的历史记忆,使子孙后代能记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世界更美好而奋斗。

但愿我们这本书以及我们的工作能够通过宣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感人业绩,以及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为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潘 光

2016年9月10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目 录

- 1-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罗生特大夫
12- “洋八路”汉斯·米勒
22- 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
31- 犹太难民中的音乐大师卫登堡
42- 韩芬与上海精神卫生
58- 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爱泼斯坦
74- 爱泼斯坦：投身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犹太人
90- 八宝山墓碑上的奥地利友人严斐德
97- 波兰白求恩：国际主义战士傅拉都
104- 犹太难民中的著名画家白绿黑
112- 从难民到巨富——艾森伯格与中国的不解缘
119- 杰出的德国犹太作曲家弗兰克尔
129- 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犹太难民布鲁门撒尔
136- 上海犹太画坛巨擘——希夫
145- 从难民少年到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155- 参加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红医战士傅莱

165-彼得·迈克斯：从跟着“阿妈”学画到为总统画像

171-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魏璐丝

177-视上海如故乡的犹太工程师韩布葛

189-犹太难民中的比较语言学专家罗逸民

204-热爱中国的职业革命家和优秀摄影家叶华

211-后记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罗生特大夫

1996年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隆重举办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罗生特大夫生平事迹展览会”。山东省莒南县派人专程送来许多展品，罗生特在那里工作过多年，曾在26个村庄住过，除为部队官兵诊治外，也医治过100多位老乡。在这次展览会开展之前，1992年10月5日，在莒南曾举行了隆重的罗生特纪念碑揭幕式。罗生特的家属——嫂嫂、妹妹、弟弟、侄女、侄孙女也应邀参加。会上发言的人中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昊苏（陈毅之子），也就是罗生特当年接生的那个婴儿。在会上，当年被罗生特救活的弃儿张月芹，送给恩人的侄女一面锦旗，绣着“没有罗生特医生，就没有俺一家人”。纪念碑揭幕式以后，莒南人民医院大楼之顶层，以罗生特的名字命名举办了展览会，陈列了众多的绘画、画片和资料，生动地介绍了罗生特在部队的生活。相隔不到一年，即1993年秋季，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市（Graz），一所“急救医院”也改以罗生特的名字命名。这两所以罗生特之名命名的医院，相隔万里而交相辉映。在以色列，除了特拉维夫的基里亚特·绍尔公墓长眠着罗生特的英灵外，在特拉维夫大学的犹太人大离散博物馆里，从1999年10月19日起，举行了为期3个月的罗生特展览会。放映了《我在



罗生特大夫

中国当过将军——罗生特大夫》电视剧，以德语和华语讲解，英语译配。

罗生特，已成为联系中、奥、以三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从维也纳到上海

罗生特的全名为雅各布·罗森菲尔德 (Jakob Rosenfeld)，犹太人，190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之勒謨堡 (现名利沃夫，在今乌克兰西南部)。他的父亲是帝国军队中主管出纳的士官，母亲是犹太庄园主的女儿。雅各布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由于当时犹太人能够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医生和律师，因此他决定学医。1922年，他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当时有“医学界的麦加”之美誉。他在医学院攻读了6年，于1928年毕业，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几家医院任职。由于思想“左倾”，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1934年奥地利内战爆发，社会民主党被取缔，他一度被捕入狱。到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德国“兼并”后，他因为既反对法西斯，又是犹太人，更成了纳粹分子的眼中钉。5月下旬，他再度被逮捕，先后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进集中营后，他尽管身陷缧绁，处境凶险，但在囚友有难需他帮助时，依然挺身而出，救死扶伤。有一次，建造牢房用的砖堆倒塌，把20多个“犯人”压在下面。他不顾自己肾脏损伤，奋不顾身为他人急救包扎。当他跪在雪地上为一个双足被压断的“犯人”包扎时，被纳粹看守用枪托狠砸头部、颈部、背部，鲜血淋漓，昏倒过去。他后来曾于1944年元旦的山东《大众日报》撰文，以亲身经历揭露和控诉了纳粹集中营的非人暴行。关押将近1年以后，

由于“犯罪情节较轻”，营中又人满为患，他被释放，并限定在两周内离境。

茫茫世界，何处容身？他曾考虑去苏联，但那里的大清洗令他心胆俱寒。他也想过去美国、英国或巴勒斯坦，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严格控制移民入境。这时的上海，成了世界大城市中唯一不需签证就可进入的地方，已经有大批犹太人到那里避难。由于纳粹当局只允许有签证者离境，他设法从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处获得了签证，终于离开奥地利，于1939年8月5日到达上海。

从上海行医到参加新四军

初到上海时，他曾在一所专为新到的犹太人而开设的难民医院工作，是泌尿科会诊时的权威大夫。不久，他就在国泰电影院至兰心大戏院之间的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上，同别人合开了一个诊所，那里是著名的高级地段。从他行医用的中英文名片可以看到，他当时用的汉名是“乐孙特”，专治肾脏、膀胱、前列腺疾病。很快，他就声名鹊起，收入不菲。然而，罗生特毕竟是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人，不能心安理得地过这样庸庸碌碌的优裕生活。罗生特离开维也纳时，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写了介绍信，让他到上海找汉斯·希伯。希伯出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后来在德国参加了共产党，1925年初次到中国，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和政论。1932年希伯携夫人第二次来上海，同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等组织了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小组，研究国际和中国的大事。

罗生特带了介绍信去找希伯，此后晚上常到希伯家，或独自做客，或参加小组活动，希伯在学习时经常谈论在

新四军驻地的见闻。后来，新四军的医务处长（后为卫生部长）沈其震来到上海，秘密动员进步知识分子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沈住在希伯家里，也参加小组学习讨论。罗生特本来就对中国大众的悲惨生活深表同情，通过学习更加深了认识，已不能再安心做有钱人的私人医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罗悲愤填膺，想参加新四军。沈起初以为罗只是一时冲动，但经过多日观察，觉得罗确有吃苦准备，而且具有丰富的医学经验，新四军又急需医生。于是，沈向盐城军部发了密电，得到同意后，于1941年3月中旬与罗分乘两艘小火轮，由十六铺码头上船去苏北。罗由一个交通员护送，在如皋县张黄港登岸，取道前往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盐城。

“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罗生特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后，受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和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刘同先期到达的希伯与罗、沈交谈了几个小时，耐心解释了中国封建制度难以改变的原因，给罗留下深刻的印象。陈毅代表全军将士欢迎罗不远万里而来，为了抗击日寇、搞好军中医疗工作贡献才华。刘、陈任命罗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而罗也确实不负他们的期望，不但在新四军中，而且后来在八路军中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民主联军（后为第四野战军）中，极度认真地工作。不论是看门诊或是动手术，也不论是替干部、战士或民众治病，都一丝不苟。他经常越过敌人的封锁和克服水网地带的交通不便，奔走于各支部队之间。他还建议在各路军队中开办卫生学校，以培训医务人员。据原新四军卫生学校校长左英回忆，他定期亲自上课，自编教

材，自制教具，把基础理论和各科专业知识传授给学员。左英记得，由于缺少医生，他几乎什么病都看，成了一个技术高超的“神医”。高超的医术、负责的精神、和蔼的态度，使他赢得了全军的尊敬和赞美，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罗生特同沈其震、吴之理、崔义田、宫乃泉、齐仲桓、王雨田（即黄农）这些在新四军各师中担任卫生部长或领导职务的中国医学专家经常交流经验，切磋医术。为了让学员掌握正确的手术操作，他们甚至举行过一次比武性质的“手术会诊”。罗生特医德高尚。病人何时来，他何时给看。有急诊，随叫随到。他检查时不用听诊器，而是直接用耳朵在病人胸腹部细听，这样听得更真切，而不在乎有些农民患者身上比较脏。他也入乡随俗，尊重男女有别，做妇科检查时总是要有女助手在场。他善于动脑筋，因地制宜解决工作上的困难。在盐城时，他曾设法征调一批银圆，熔化后交给银楼老板按照绘制的精确图纸，打制手术必需的子宫颈扩大器、括条、尿道探条等器械，以弥补不锈钢器械的不足。他在讲解固定伤肢问题时，强调夹板不一定需用木板制造，有什么材料用什么材料，树枝、枪把、伞把，甚至高粱秸都行。在山东时，他对卫生工作人员的土办法很欣赏：他们没有金属镊子便用竹片制成镊子；没有凡士林，就用牛油、羊油随季节不同改变比例调配成土凡士林；没有胶布，使用牛皮纸涂一层胶来代替。他还把竹镊子、土胶布收藏起来，准备将来带回国，让同胞看看中国抗日军民是如何克服困难的。除了开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罗生特还参与编写过一本《军医必携》，供医务人员阅读。

通过工作和生活实践，罗生特觉得已经找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并受人尊重的新故乡，他于1942年春向华中局钱

俊瑞提出了入党的申请。钱听取了罗的陈述后说，他很乐意介绍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答应报告上级。陈毅知道后，也乐意做罗的入党介绍人。于是，罗就作为特别党员被接纳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罗荣桓司令员悉心治病

1943年1月，当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又是115师政委兼代师长的罗荣桓患了严重的尿血病，但查不出病因。陈毅得悉后，致电中央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请罗生特诊治。经同意后，罗荣桓由随行人员陪同于4月下旬到达新四军4师驻地，罗生特为他进行了检查，随后又做了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当时只有做膀胱镜检查才能确诊是肾脏出血还是膀胱出血，但这样做对病人很痛苦。罗生特顾虑罗荣桓身体虚弱，因而犹豫不决。罗荣桓看透他的心思，说自己一定好好配合，要他打消顾虑。果然，做检查时，罗荣桓忍住剧痛，不吭一声。结果，罗生特估计他右肾有病变，但由于没有X光透视仪，无法进一步检查。他也怀疑是恶性肿瘤，但在敌后不具备开刀的条件，只好暂作保守治疗。在罗生特的精心护理下，罗荣桓的病情稳定了下来。但由于山东战事紧张，罗荣桓住了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赶回去。罗生特要罗荣桓少吃油脂，不吃辣椒，多吃蔬菜、水果，要多休息，不能过分疲劳，最好坐担架，不要骑马。

到了8月份，由于殚思竭虑地工作，经常骑马到前线指挥战事，罗荣桓的病情再度恶化。陈毅和刘少奇请罗生特火速前去山东。罗生特为罗荣桓仔细检查后，发现病灶仍在右肾。后经过一段时期特别护理、周密观察和保守治疗，罗荣桓的病情有所好转。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

饭，相处如同一家人。罗荣桓的长子当时只有五六岁，一见罗生特就叫“大鼻子叔叔”，与他一道玩耍。罗荣桓任命罗生特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罗荣桓带了罗生特等一行到达沈阳工作，与先期到达的彭真和林彪会合。罗生特奔波于沈阳各大医院，要为罗荣桓选择一个各方面条件都较好的医院检查身体和动手术，最后选择了一所日本军医院。检查结果：右肾有肿瘤，左肾功能代偿性增大。这同罗生特在山东的诊断一致。1946年5月下旬，苏联方面来电同意罗荣桓去治病。罗生特提出，希望陪罗荣桓去莫斯科，然后回奥地利探亲。但由于苏联方面不同意罗生特随行，他未能同去。罗荣桓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切除了右肾。1947年复查时，诊断为左肾功能紊乱等疾病，建议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但东北关键性的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罗荣桓坚决回国指挥战斗。罗生特又赶到哈尔滨为罗荣桓诊治，检查出肾功能衰竭，提出立即减轻工作、严禁烟酒等医嘱，但罗荣桓以国事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令罗生特无可奈何。北平和平解放后，罗生特回国的申请批准了。罗荣桓在自己手表上刻了字，赠给罗生特留念。

最后的生命旅程

1949年9月，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已成定局。此时，罗生特离开祖国已经整整10年，渴望回去看看。早在2月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已从沈阳迁往北平，住了几个月，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大学，也到协和医院检查了身体，发现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后来，罗生特又经南京到上海。先前的老战友陈毅已是上海市市长；崔义田和宫乃泉分别

是华东军区卫生部正、副部长，崔又是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任职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的吴之理正好也在上海采购药品。老友重逢上海，经常聚会，回忆往昔战斗生活，十分愉快。崔义田夫妇还陪罗乘车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医院和医学院。罗也回到他原来开诊所的迈尔西爱路，怀旧了一番。

往昔陈毅在新四军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把罗生特的生活安排得尽量舒适。部队从日军那里缴获到罐头、咖啡、糖果时，总是按陈的命令交给罗，罗也总是与在场的人同享。现在进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条件好起来了，陈自然更要尽量好好招待。陈让罗下榻在百老汇大厦，每月发给生活费，还让人替罗定做了一套合身的漂亮西服。10月1日开国大典以后不久，上海市交际处为罗生特办好了回国的船票。在临行前为罗饯行的宴会上，陈高度评价了罗对中国的贡献，称罗是“活着的白求恩”，并将第三、第四野战军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亲手交给了他。

罗生特从上海起程后，于1949年11月底回到了维也纳。母亲被纳粹关进集中营惨死焚尸炉的噩耗，使他无比痛苦。经作彻底检查，发现他心脏很不稳定。当交运的行李全部到齐后，他便根据自己采访和搜集到的资料，为他所熟悉的中国党、政、军领导写传。他同陈毅是莫逆之交，同陈进行过多次彻夜长谈，采访到陈的许多资料。他也利用长年为罗荣桓治病的机会，对罗进行采访。但罗荣桓沉默寡言，很少谈到自己。罗生特无奈，只好通过采访其战友、部属，以了解其生平。他还向刘少奇本人及熟悉刘的干部搜集了关于刘的资料，对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邃的理论修养钦佩不已。他也对罗炳辉、彭雪枫、黄克诚、赖传珠等

新四军将领进行过采访，索取过他们个人的传记材料。他对罗炳辉的枪法如神、彭雪枫的知识渊博、黄克诚的直言不讳印象深刻。罗炳辉的枪法，表现在他款待罗生特的饭桌上，他嫌准备的蔬菜、猪肉、鱼虾太少，便随手拿过警卫员的枪走出去，隔了一会儿就从天上打下几只野鸭，烤了请罗生特吃。罗炳辉赠给罗生特的礼品中，有一双银筷子，上面刻着中文字“赠给罗生特大夫，弟罗炳辉”。罗生特惊奇地问道：“罗师长比我年长，怎么能这么称呼呢？”经过解释，罗生特才知道这是中国人尊敬对方的称谓。罗生特深信，他在人民军队的时间比白求恩、斯诺都要长，他的书一定会受到德语国家的欢迎。1950年5月底，他在一封信中说，但愿到10月能把这本书写完。非常不幸的是，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显然，要在奥地利出版这样一本介绍中共将领的传记是不可能的。

罗生特对维也纳的生活已经适应不了了。他身体虚弱，盗汗，心脏不舒服。罗生特在1951年8月给妹妹的信中，说他已到以色列探望弟弟约瑟夫夫妇。罗生特虽然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但是据他的弟媳贝巴说，他临终的那天整日情绪都很好，晚饭时还唱了歌。他供职的阿苏塔医院的一位同事下午进城时还为自己和他买了电影票，到6点钟返回时，却看到他心脏病严重发作。但接着他又觉得好一些，还问同事电影票买到了没有，随后便安静地躺下来。睡了一会儿，他突然张开口大喘气，一瞬间就咽了气。罗生特生于1903年1月11日，卒于1952年4月22日，享年仅50岁。

罗生特的墓坐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特甘，墓碑上用希伯来文镌刻着他的姓名，他默默地长眠在这片犹太民族宁静美丽的故土上。除了在以色列拉马特甘和中国营南

的墓碑和纪念碑，在他的故乡维也纳的中央公园也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已使他的名字成为国际主义无私奉献的象征。许多不远万里来到以色列的中国友人，都要到他的墓地瞻仰凭吊，人们按犹太人的习俗放上石块，肃立默哀。

(摘编自格·卡明斯基主编，杜文棠等校译：《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洋八路”汉斯·米勒

在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部分抗战老战士、烈士亲属、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代表时，有一位日本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叫中村京子，1945年从日本福冈来到中国，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定居中国，离休后在北京安享幸福晚年。她的丈夫，就是著名的“洋八路”汉斯·米勒(Hans-Miller)。2015年，对中村京子而言是个大日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还是她的丈夫汉斯·米勒的百年诞辰。她回顾丈夫的点点滴滴，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到中国去 到延安去

汉斯·米勒出生于德国莱茵区迪斯朵夫市的一个平民家庭，是父母的独生子。米勒的童年、青少年生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饥饿和失业经常前来叩门的阴郁年代里度过的。1933年，是他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的3月，希特勒的纳粹党占据了国会的绝大多数席位，法西斯独裁牢牢地控制了德国。米勒中学毕业后，升学无门，被迫进入被希特勒政府吹嘘为“消灭一切失业现象”的准军事组织“青年劳动服役营”。米勒是一个性格刚烈、疾恶如仇，具有

民主思想的小伙子。劳动营粗暴强制的管理制度引起他的强烈不满，而且他们还以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对他施加压力。米勒对日益严重的法西斯专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在同伴的帮助下逃出了服役营。双亲对逃回来的米勒又喜又惊，惶惶不可终日。父亲终于为他想出了一条出路——到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医学主任的老朋友那里读书。经过一番周折，米勒进入了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大学学习期间，米勒勤奋读书，各门功课都取得优秀成绩。由于家境贫苦，米勒常常为交不上学费而苦恼，这更锻炼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的反法西斯意识。他关心世界形势，经常同进步同学纵谈时事，抨击法西斯主义，因而引起学校当局的监视。说来凑巧，在巴塞尔大学，他结识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同学蒋兆先。他从蒋兆先那里不仅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而且了解到中国人民已经在世界的东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

1938年，命运又一次带给了米勒新的抉择。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顶峰，米勒的父亲被投入集中营。同年秋，蒋兆先也突然被捕。不久，米勒接到瑞士警察局通知，限他在半年之内离境。米勒不顾一切，日夜攻读，在半年之内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非常清楚，由于欧洲各强国对法西斯战争势力采取绥靖主义政策，整个欧洲已经对他关上了大门。朋友劝他到南美建立诊所，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对此，他不感兴趣。他的志向是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他想起了中国。他感到，在绥靖主义空气弥漫欧洲，搞得人们昏昏欲睡的情况下，中国人率先拿起了反抗法西斯的武器。“希望在东方”，米勒这样



汉斯·米勒(左)

想着。恰好这时蒋兆先获释归来。他们彻夜交谈，十分投机，相约一起到中国去。蒋兆先由于有事未能与米勒同行，他告诉米勒到中国香港找“保卫中国同盟”联系。1939年，年仅24岁的米勒毅然卖掉了自己的照相机，购买了船票，离开瑞士，前往法国的马赛港，登上前往中国香港的“杜梅号”海轮。

抵达香港后，米勒急着去找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面向全世界广泛争取道义和物资上的帮助。这个机构的核心领导来自四面八方，外国人占了一大半。米勒急切地报名，要求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出力，坚决地要求到战斗第一线去。于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把米勒介绍给了廖承志。米勒还遇到了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也是“保盟”的中央委员。他去过延安，向米勒介绍了很多有关延安的情况，此次将由他带队前往延安，与米勒同行的还有几位志愿者。1939年6月中旬，米勒他们一行向着目的地——延安出发了，带队的就是贝特兰。他们从香港登上小巧的近海货轮“泰山号”起程前往海防。然后，再经由越南到广西，经贵州、四川等地进入西北。他们此行还带着“保盟”在香港募集到的一批抗日根据地急需的医疗物资，包括30辆卡车、15 000加仑汽油，600多箱急需的医药物资，还有一辆由约翰·桑尼科罗夫特爵士送给宋庆龄的特制的大型救护车。

延安窑洞的谈话

经过3个月漫长而艰险的路途，米勒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延安。一天下午，米勒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设便宴招

待他。米勒既紧张又兴奋。他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党内享有极高威望的政治家。他刚到中国，什么也不了解，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真不知道到时候怎么同毛泽东交谈。

他只记得被请进一间宽敞的窑洞，毛泽东气度非凡、精力充沛，亲切地同他握手。毛泽东和蔼的态度一下子使他消除了拘谨。他注意到桌子上、木箱上凌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和文件。毛泽东几乎没有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而是与米勒随意地攀谈。他们谈到了德国的社会状况，米勒的家乡杜塞尔多夫的风俗民情，米勒来中国的所见所闻。德国的文学、席勒的戏剧、歌德和海涅的诗，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米勒发现，毛泽东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富有幽默感，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刻板的人。看来自己对政治家的印象也是片面的。

他们两人还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米勒表示，他坚信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是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表示赞同米勒的看法，建议他在延安各处看看，不要急于工作，作为刚从欧洲来到中国陕北的医生，对中国的一切要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卫生部门的领导征求了米勒的意见后，决定安排他在延安拐峁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在米勒的再三请求下，3个多月后，他从延安出发，来到太行山区我八路军医院工作。战斗是激烈的，生活是艰苦的，米勒毫不畏缩，他一心想着：战士们在前方为我们打仗，

我们也必须为他们“打仗”，医务人员要消灭的“敌人”，就是死亡、疾病和伤残。从1940年1月至1942年12月，他先后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及外科指导医生、八路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一二九师医务顾问。1943年，组织上照顾他的身体，调他回延安，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批准他免职回国探亲。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为他签发了通行关文，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为他做了工作鉴定。这两件历史文件最有力地证明了作为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的米勒在中国战场上的卓越表现。由于内战爆发，米勒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探亲的机会，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任冀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不管在晋东南部队，还是在冀热辽军区医院，他总是紧张地工作、学习。晚上要是没有任务，他屋里的灯光总要伴随着他度过午夜。他觉得人民没有摆脱苦难，科学没有在阿基米德、哥白尼和牛顿的面前止步，不学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根据地的医疗设备是简陋的，加上那时上有敌机，下有炮火，部队经常转移而且常常是夜行军。尽管这样，米勒对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1940年，我八路军对华北敌军开展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即“百团大战”。一天，日军已占领了距我后方医院只有两公里半的村庄。医院有几百名伤病员还未转移，情况十分危急。米勒镇定地指挥两位中国医生带领轻伤员迅速转移到一片树林子里，他自己同担架队一起负责重伤员的转移。他和其他同志先将重伤员背出村子隐蔽，然后再转移到那片树林里。就这样，直到把最后一个伤员安全转移，米勒挂满汗珠的脸上才露出

欣慰的笑容。米勒本来是内科专家，但在那时候，不管什么科，遇到什么病都得解决。因为是战争环境，外科疾病自然多些，对此，米勒一点不含糊，一一地及时解决了。由于他个子高大，所以无论是做手术，还是查房、换药等，总是趴着、跪着，那仔细认真的劲头，活像绣花工。现任北影导演的张铮的阑尾炎手术，就是米勒给做的。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说：“那时的病床就是门板，无影灯就是蜡烛。米勒同志就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执行着他‘消灭敌人’的任务。”

米勒性格开朗，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任冀热辽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时，他为大伙的衣食住行操着心，风趣地称自己是“米草科”主任。米勒是勤奋好学的人，不仅对医术精益求精，而且对汉语、中国风俗与文化知识学得也很快，对老百姓的许多通俗语言，都能熟练运用。有一次，他给冀热辽军区卫生部部长李资平的爱人林紫做完手术，已经很疲劳了，但他还是很幽默地对她说：“你死不了啦！阎王爷还没给你下传票呢！”说得大家都哈哈乐了起来。米勒非常珍惜“同志”这两个字，他深知“同志”的真切含义。对病人、对战友、对驻地群众，他都是真诚相待，热情关心。在冀热辽军区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小米成了最高级的粮食，领导上照顾他，宣布全军只给米勒和另外一位同志供应小米。可是米勒每次领到小米，不是送给病人、产妇，就是给了同志的家属小孩。行军时他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却和战士、警卫员徒步行军。初到一个地方，老百姓对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大个子八路军”总会产生几分生疏和隔膜，但是，不久他们就会发现，他同其他同志一样和蔼可亲。危急时刻，他之所以能成功地指挥医院顺利转移，与群众对他的爱戴和信任是分不开的。

幸福安宁的晚年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米勒也惦念着贫苦生活中的父母亲。父亲被关在集中营，生死未卜。母亲从德国逃出来，曾经在1940年到上海来找他，未能谋面，又只身返回欧洲，他是在事后收到由党组织从上海转来母亲的亲笔信才知道这一情况的。米勒的家庭的不幸遭遇，更坚定了他为人类和平、幸福而战斗的决心。

1945年底，他遇到了参加八路军、解放军的日本护士中村京子，爱情之花绽放了。1949年7月24日，米勒和中村在天津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革命式的婚礼。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殷希彭以主婚人的身份参加了婚礼，并代表华北军区向兄弟军区的新郎、新娘祝贺。李资平夫妇最为活跃，什么主婚人、证婚人、男女傧相，都由他们包了。就这样，一个德国医生和一个日本女护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相遇了，并且像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革命者一样，在战友的帮助下，在上级的关怀、撮合下，度过一段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恋爱过程，结成了百年之好。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先是成了爸爸妈妈，后来又做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像中国的老年人一样，对儿孙绕膝颇为惬意。在孙子将要降生的时候，米勒给孙子取名为“爱德华”，家里人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先是留在东北，先后在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和沈阳医学院工作。1950年，米勒正式申请并加入了中国国籍。1956年，他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米勒调入北京，先后在积水潭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医科大学）任副院长，为发展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在社会活动方面，他是政协全国

委员会委员，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顾问、外文出版社德文编辑。

长期的医疗实践，使米勒对肝炎特别是乙型肝炎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威胁感到寝食不安，下决心攻克肝炎防治这一难关。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肝炎的诊断和防治等许多技术方面迅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80年前后，他在德国及美国报刊多次发表医学文章，介绍新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他在日本召开的国际肝炎学术会上作中心发言，他的论文《医学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发表于1980年联邦德国《自然科学杂志》。1973年，他与路易·艾黎合著《西方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出版。1972年，米勒和中村访问了日本。这是中村京子离开祖国27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第二年，他们又访问了联邦德国。踏上祖国的大地，他几乎无法辨认她的面貌。直到这时，他才得知双亲的消息：父亲在纳粹集中营整整关了7年，后死于1953年；母亲则先于1948年就告别了人世。在寻找父母的遗踪过程中，米勒发现，在德国警察局的户籍登记簿上，汉斯·米勒早已成为亡魂，对此他哭笑不得。

米勒的晚年生活是平静、安逸的。他酷爱中国的古瓷和山水画，墙上、柜橱里，到处都是他搜集的青花瓷、彩绘古瓶瓷盘和名人山水条幅、中堂画，室内显得格外典雅。他对中国象棋非常着迷，没有人对弈时，便一个人饶有兴趣攻守厮杀一番。中村京子爽朗好客，对疾病缠身的米勒照顾得十分周到。她常告诉客人：“米大夫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家里都是做中式饭菜。米大夫喜欢吃川菜的回锅肉，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切糕，那是我刚到中国后在锦州学习时就喜欢上的。”除了一般的交友，他们还有一个独特的小圈

子——同马海德一家、爱泼斯坦、路易·艾黎等聚会、游览、聊天。

战争带给米勒一家的创伤太深了。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昏暗的年代，悲惨的年代。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这沉痛的一页，更希望战争永远成为过去。他们认为，不论东方和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人类有责任、有义务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现今的中村京子更加怀念她的丈夫汉斯·米勒。她希望，曾经逝去的岁月不被尘封，曾经发生的故事不被淡忘。中村说，她由衷地希望世界远离战争，希望中日两国永不再战。愿世界永远和平！人民永远幸福！

(摘编自沈海平：“战斗在太行山上——洋八路米勒的抗战往事”，《档案春秋》2015年07期；冯彩章、李葆定：《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部分材料来自本书主编对米勒的采访。文章标题和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

在鲜花簇拥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两臂交置胸前，一手持钢笔、一手持采访本，神态安详，深邃的目光凝视前方。这就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犹太裔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

原国务院副总理、曾与希伯一起并肩作战过的谷牧回忆道：“他是一名记者，却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他是一名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各种方式进行战斗的外国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同法西斯强盗战斗而死的欧洲人，他是第一个。”

积极投身中国革命运动

1897年汉斯·希伯出生在奥匈帝国克拉科夫（现属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后在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五种文字。希伯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波兰语CRZYB，德文名Müller，英文名Hans Shippe。来到中国后，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

希伯很早就向往具有5 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对中国的时势十分关心。192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同年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做编译工作。他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看到无法将国民党的观点与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汉斯·希伯愤然辞去了国民党内的职务，经上海返回欧洲。回到欧洲后，他仍时刻关心中国的革命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从广州到上海：1925—1927年》一书。

不过，希伯的中国情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而断绝。1932年秋，希伯告别新婚的妻子秋迪，再度来华。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丈夫来到中国。希伯来到上海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形势。此后的5年间，他在上海广泛活动，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和德国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

战斗在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远东新闻记者，希伯先后多次奔赴中国的抗日前线。1938年春天，希伯穿越敌人的道道封锁线，几经周折，终于踏上了延安这块圣地。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1939年初，希伯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等从上海出发，由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陪同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此后，希伯就这次



汉斯·希伯(右)

采访所得写了一些报道和政论，先后发表在《美亚评论》杂志上。他在这年4月所写的《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中，详细地报道了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开展游击战取得的成绩以及它对抗日的战略意义，热情赞颂了新四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无比英勇的牺牲精神。同年6月，他写了《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一文，报道了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报告的要点。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闻讯义愤填膺，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希伯尖锐地指出，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中央政府完成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即消灭了长江以南在南京和芜湖一带的新四军成功地建立起来并正在坚持的游击根据地”。1941年5月，当希伯得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便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由上海乘船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及粟裕等。在刚抵达盐城时，希伯便在为他自己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称：“国际人士知道，新四军、八路军已为中国写下最光辉的抗战史迹；假使中国没有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抗战和中国光荣的独立运动史”“我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在自由的世界里站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在苏北期间，希伯始终被无处不在的抗日热情所感染、打动，他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陆续发往国外，向全世界如实地报道新四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的感人事迹。他在《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

“新四军通过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依靠宣传群众和关心群众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论是穷人或富人，都信任新四军。”在《重访新四军根据地》一文中。希伯更是发出了“没有另一支军队像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称赞和热爱”的感慨。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中国通”拉铁摩尔到重庆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是美国《太平洋事务》的主编，与希伯私交甚厚。当时，希伯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忧虑不已，于是以私人关系致电在重庆的拉铁摩尔，痛斥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必须制止，而民主团结必须推进。他表示他愿以今后的时间与精力，为中国的民主团结和坚持抗战方针而奋斗。他说：“我这个人，平生不管做什么，总是完全地献上一切……凡可能献上我全力的事，绝不只能献上一只手。”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老希大爷”

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艰苦抗日的真实情况，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希伯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激动地说：“这次到山东敌后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使我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区内，来往自如地‘旅行’在中国领土上。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在中国敌后坚持抗战的民主人士们，还给了我

以最大可能的方便与舒适，这是许多外国记者们所想象不到的。我一定要把我亲身经历到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告诉他们：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搏斗，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局势动荡不安，战斗生活十分艰苦。一个国际友人不顾自己的安全冒险来到这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欢迎。当时正值初秋，鲁中南大地上，青纱帐刚刚褪去，一垄一垄的地瓜秧还泛着青绿。一个外国友人的到来，给纯朴、好客的老乡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大人、小孩对这位身材高大、头发卷曲、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仿佛看不够似的，围着他转。希伯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弯腰同大家握手，用很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叫希伯！你好！”希伯极有兴趣地在梭庄和界湖一带参观妇救会的军鞋组，向一些大娘、大嫂们询问军鞋组给八路军做军鞋的情况，并且拿起一双双蒙山鞋，用手指敲着鞋底，不断地点头夸好。当地逢五逢十赶集，希伯也由翻译陪同，饶有趣味地欣赏着集上的一切。他看着大嫂们在铁鏊子上烙煎饼。也试着自己去推石碾帮着压小米。希伯很喜欢小孩，很高兴和儿童团在一起，喜欢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喜欢看着他们拿着红缨枪神气地站岗放哨。他同一些儿童团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儿童团员们亲热地叫他：“老希大爷！”

希伯穿着八路军军装，脚上本来穿的是大皮鞋，为了爬山方便，也与老百姓一样穿上了“蒙山鞋”。他和沂蒙山区人民一样，以煎饼果腹。庄上的老百姓省下白面给他做面

条，希伯婉言谢绝。他常说：“你们过得去，我就过得去。”希伯来山东根据地不久，就对这里的抗日军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我真像明星！人们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能和山东的抗日军民见面我很荣幸，实现了我的愿望！”

而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感和生动的文笔，客观地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在日本侵略者于11月初全面展开的大扫荡开始前，他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他在这些通讯稿里说：除民主团结外，不能用其他手段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抗战坚持到今天是不能想象的。他警告说：“一切反共反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行为，不论采取何种口实都只能有利于敌人。”

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不久，日军大扫荡开始。为了保证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分局决定让前来探望丈夫的秋迪女士提前回上海，并劝说希伯也一起回去。希伯说：“让秋迪先回去，我同意。但我决不离开山东。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来吧！”部队首长劝他说：“你的任务是采访，是用笔当枪。”希伯笑着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秋迪走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趋险恶，敌人大举侵犯沂蒙山区。对八路军来说，已无前方和后方可分，希伯也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在漫天风雪中，希伯跟着一个梯队在东蒙群山之中围着山和敌人“推磨”，他很快适应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流动生活，还学会了射击，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的联络信号，希伯已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了。不过，每当到了宿营地，万籁俱寂。战士们已进入梦乡，他却又要忙于写作。于是，《反扫荡日记》等大量生动描写八路军反扫荡的通讯和特写在打字机不知疲倦的“哒哒”声中诞生。

一天深夜，希伯随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在师特务营的掩护下，转移到留田村时，突遭日寇围剿。日寇在留田村四周的山头上，燃起了冲天大火。正当日寇做着踏平留田、合围成功的黄粱美梦时，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干部会议，希伯应邀列席会议。鉴于当前面临的危急形势，一一五师决定向南突围，直插敌人大本营临沭附近，迫使敌人仓促回师，以此来粉碎敌人的扫荡。

晚上，希伯和战士们一起，一手提着压子弹的枪支，一手紧握着手榴弹，沉着机智，直奔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张庄，从敌人的火网缺口冲穿梭出去。希伯在这次突围战斗中亲眼看见了抗日战士行动敏捷、严明军纪的作战作风。他无比兴奋，紧握着罗政委的手，热烈祝贺突围成功。一到驻地，希伯不顾疲劳，立即为一一五师的《战士报》写了一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通讯。文中写道：“八路军战士是那样的神速勇猛，以致日军的巡逻兵在刚要喊叫和射击的一刹那，就被消灭了。只有共产党军队的将军和士兵才能有这样的英勇和机智，才能这样团结一心。”

敌人并不甘心，一场更大的扫荡正在酝酿中。不久，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战役——大青山战役。11月29日晚，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一个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3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强烈要求加入最后突围的第3分队。尽管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都倒在血泊中。希伯满腔怒火。从牺牲者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他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44岁。

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希伯弹痕累累的遗体。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1942年，山东军民为了纪念希伯烈士，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所撰“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1981年，秋迪女士到临沂扫墓，用德文题了词：“无数先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希伯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我们将永远铭记所有的先烈。”

（摘编自王永娟：“汉斯·希伯：埋骨大青山”，《解放日报》2015年9月30日—10月2日。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犹太难民中的音乐大师卫登堡

阿尔弗雷德·卫登堡 (Alfred Wittenberg) 在纳粹上台前已是驰誉德国，乃至欧洲乐坛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然而，纳粹的反犹政策使他在德国无法演奏，甚至难以生存，不得不随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他的音乐天才在艰苦条件下反而得到了超常的发挥，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战后，他没有回德国，而是继续在中国演奏和教学，直至生命的终点。卫登堡永远活在中国音乐人的心中。

驰誉德国、欧洲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

卫登堡 1880 年 1 月 14 日出生在当时属于德国的布雷斯劳（现为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是 19 世纪闻名全球的匈牙利犹太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 (Joseph Joachim, 1831—1907) 的关门弟子。10 岁时，在一次音乐会上，他既拉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又弹了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居然把两种不同乐器的高难技巧和作品的丰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年纪便脱颖而出。虽然在漫长的音乐史上，“神童”的夺目光芒曾不时闪耀，但像卫登堡这样集“二长”于一身的奇才，实不多见。他在 18 岁时又获得门德尔松提琴比赛首奖。



卫肇堡

卫登堡的老师匈牙利人约阿希姆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并创作了许多小提琴作品，尤以他为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所作的华彩乐段最为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他培养出众多卓有成就的小提琴家。后来创立俄罗斯小提琴乐派的利奥波德·奥尔就是他的大弟子，驰誉世界乐坛的埃尔曼、津巴利斯特、海菲茨，都出自奥尔的门下。卫登堡则是约阿希姆的关门弟子，他同恩师年龄相差近50岁，情同祖孙。

后来，卫登堡果然不负众望，技艺日见长进。他在德国皇家歌剧院为首席小提琴手，又与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施纳贝尔等组成了三重奏组，连续数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柏林音乐生活中的盛事。他的崇高声望，使前往柏林举行音乐会的演奏家纷纷慕名造访，以能得到他的接见为荣。他宽敞的客厅内，陈放着两架名牌的大三角钢琴。他使用的小提琴系17—18世纪意大利制琴圣手斯特拉迪瓦里所造。他功成名就，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避难上海 声名鹊起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的处境日益险恶。1938年11月，纳粹排犹暴行升级，卫登堡不得不下定决心，毅然放弃他在柏林乐坛获得的崇高地位，放弃多年积累的丰富家业，带着妻子和岳母，投身于难民浪潮，于1939年2月来到上海。由于纳粹德国规定，犹太人离境时每人只准携带现金10个马克，因此难民个个囊空如洗，窘迫万状。幸运的是，卫登堡到上海不久，就有机会在犹太总会（旧址即今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在北京西路1623号）的半圆厅内，与其他两位犹太音乐家联袂举行了室内乐演奏会。听众虽然只

有200多人，但许多观众却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的乐师。当时这支乐队号称“远东第一”，乐师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卫登堡高超的琴艺，得到他们的承认。于是，他们就介绍几个外国学生给他，让他依靠教学谋生。但仅教有限的外国学生还是入不敷出的，他必须打开局面，收中国学生。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中国小提琴师陈宗晖听说工部局乐队的小提琴手费德降（Fidlon）的孩子跟一位著名小提琴家学习大有进步。向费问起此事，做父亲的洋洋得意地说，是换了一个大能人卫登堡做老师，并且说，非但儿子学，我也去学。陈大为惊奇，因为费当时在上海乐坛已相当有成就，竟肯再拜别人为师。陈也心动了，立即请费德隆介绍，也拜在卫登堡门下。对这个瘦弱矮小、身高仅1.65米、貌不惊人有点驼背的老汉，陈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令他惊讶的是，老师在为人作钢琴伴奏时居然不用看谱子，不仅记住了众多经典名曲，连练习曲也背得出。陈宗晖成了老师的热烈崇拜者，不仅勤奋地跟他学琴，而且每逢老师开音乐会，他总热心帮助推销入场券，还自己买票请一些音乐同行如谭抒真、毛楚恩等去欣赏，并在音乐会散场后评析卫登堡的演艺。就这样，卫登堡的名声在中国人的音乐圈子中渐渐传扬开了，谭抒真、马思宏、杨秉荪、毛楚恩、章国足、窦立勋、司徒海城、司徒兴城、司徒华城这些当时已有一定成就的提琴家，也纷纷拜在他们门下深造。后来，人们在欧美出版的一些音乐词典和百科全书中，看到在施纳贝尔的条目下面，提到施氏组建的钢琴三重奏组成员，拉小提琴的就是卫登堡。室内乐重奏组要求组员彼此功力悉敌、配合默契，演出方能珠联璧合。卫登堡能与施纳贝尔这样的大家同台演

奏，自然绝非等闲之辈。从此，上海的音乐圈子对他格外尊崇。继富华之后相继担任工部局乐队首席小提琴的奥地利犹太人费迪南德·阿德勒和俄罗斯犹太人米沙·里斯金也甘愿拜他为师。而国内名家如范继森、杨体烈等，尽管已是教授，仍乐意立门程门。因此，卫登堡又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著名音乐家李名强自幼受到他的亲炙。另一位著名钢琴家傅聰回忆，他跟卫登堡学了两三个月钢琴，老师就溘然长逝了，老师教他弹的是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仿佛一“曲”成谶，令他感伤不已。有的歌唱家也慕名请卫登堡弹钢琴伴奏，如著名花腔女高音高芝兰就对他的高超伴奏深表赞赏。高芝兰还深情地回忆说，卫在严冬季节经常冒着严寒，“两颊冻得通红”，按时到她家为她伴奏，令她十分感动。

卫登堡在上海除以教小提琴和钢琴以及弹钢琴伴奏为生外，有时也办音乐会。他与谭抒真和后来曾长期担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黄贻钧举行了几次音乐会。同台演出的除谭、黄和范继森等几位已卓有声望的音乐家外，还有诸如周广仁、王羽、杨秉荪、司徒华城、严开礼、陈鼎臣等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卫虽已届古稀之年，又是同学生和后辈一同演出，有时还为后辈（如司徒华城、陈鼎臣）弹伴奏，却一律认真对待，一如他青年时代同世界第一流音乐家合作时那样一丝不苟。卫登堡不仅有超凡的演奏技巧，而且音乐知识非常渊博，精通音乐历史、乐理基础、曲体结构。他为学生们细心讲解逐一示范世界级的提琴大师，如他的老师约阿希姆和师兄奥尔，同时代的克莱斯勒、埃尔曼、西盖蒂、海斐茨、梅纽因等人的演奏风格，同时阐释如何处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的经典作品，

他们各有什么特点。因此卫登堡传授学生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音乐修养和深邃广博的文化修养。他给学生上课，从不需要谱子，学生学什么，他总是能不假思索，随手在钢琴上弹出伴奏。他教学生，从不拘泥于弓法、指法，而是从大处着眼，教他们如何诠释出乐曲的内涵和精髓。卫登堡有时也收儿童做学生。以他这样闻名遐迩的大师，在教孩子们拉琴时却出奇地和蔼耐心，他常对孩子们说，“这首曲子有点难，但是不要紧，咱们慢慢学”，这使学生在心理上能有准备。如果孩子天性聪颖，容易领会，他又会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噢，原来并不那样难，你真聪明”，所以孩子也很喜欢他。

卫登堡长年奔波授教，他收的学费比别的外国名牌教师低，而且与学生相处较长时间后，学费多少，迟交早交，他从不计较。学生们感到他实在辛苦，于心不安。于是居住条件宽敞的学生就主动提出，愿意在家中提供地方让他设点授课，他们称之为“码头”。授课到了吃饭时间，学生总是留他共餐。这样的“码头”有多处，毛楚恩家是一处；后来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的李文华家是一处；司徒兄弟姊妹家是一处；林宜弩、盛荫夫妇家又是一处。在毛楚恩家上课的除毛本人外，还有胡彭寿、张尧祖等三四人。卫登堡从提篮桥乘三轮车去毛楚恩家后，车夫就到外面去兜生意，到约定的时候再去接他。教课从下午2点开始，教四五个学生，至下午6点结束，卫登堡留下来在毛家吃晚饭，有时毛的家里没有什么小菜，毛就炒鸡蛋给他下饭，卫登堡对饭菜毫不讲究。

在虹口的艰难时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寇步纳粹之后尘，也向犹

太人伸出魔爪。此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到了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根除全部上海犹太人的毒辣计划。日本虽未采纳这项计划，却在提篮桥一带画地为牢，将犹太人圈禁在名为“指定地域”的隔离区内；没有日本当局颁发的通行证，不得随意出入。日本当局在1943年2月18日通过广播和报纸的头版，正式宣告隔离区的建立，规定自1937年以来从欧洲国家来上海避难的“无国籍者”，一律迁入隔离区。

卫登堡一家同逃难来沪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被迫搬进隔离区。他家住在提篮桥长阳路50弄。那是一幢开间很小的二层楼弄堂房子。楼上、楼下各有一间14平方米的正房，和两间分别为8平方米和6平方米的小房间。卫登堡家住在楼上，楼下是一家盐行用来堆盐的仓库。后来，由于长阳路50弄30号的房主需要收回房子自用，卫登堡家迁到一街之隔的东长治路961弄10号，条件更差。谭抒真去探望他时，见到他一家三口人挤在一间用板壁隔开的房间里。后来胡彭寿也去过他家，那时他的妻子和岳母已先后去世。胡见到他睡的是帆布床，一只箱子放在地板上，没有家具，四壁萧然。

住进隔离区以后，使卫登堡难以忍受的是离他家不远处就是管理犹太人隔离区事务的日本官员合屋的办公处的一位官员。他自封“犹太人之王”，脾气暴躁，性情乖戾，对待向他申请通行证的犹太难民，百般刁难，动辄就以打人耳光取乐。更麻烦的是此人会拉一点小提琴，便附庸风雅，时常把卫登堡叫去给他弹钢琴伴奏，还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命令这位大音乐家按他的要求弹奏，并威吓说：“照我吩咐的弹，不然我毙了你！”在这样无端的凌辱下，卫登堡更思念他

的中国学生，只有在中国学生中间，他才能感受到一点人间的爱和活着的乐趣。

一个炎热的夏天，卫登堡顶着烈日，蹒跚地走远路为学生上课。他的心情沉重，穿着又破又旧的皮鞋走在被烈日晒得发软的柏油路上，步履更加艰难。突然，他觉得地底下仿佛伸出一只黑手，紧紧地攥住他的脚，把他狠狠地摔倒在地上。原来，是融化的柏油把他的鞋底黏住了，他腿骨折断，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中国学生们闻讯后，纷纷去看望他，有的带着补品，有的带着饭菜，抚慰他那颗酸楚、悲怆的心。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幸亏医治得法，没有落下残疾。

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卫登堡有一位过去的外国学生在美国搞流行音乐发了财，想把恩师从上海接到美国，且已为他找好工作，赠他房屋、汽车，但他没有动心。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过去的好友如施纳贝尔和津巴利斯特等音乐大师，又为他在美国谋得了待遇优渥的教学职位，邀他前往。虽然他一家三口在上海的居住条件很不理想，但他仍婉拒了美国之行。他说，年纪大了，又有妻子、岳母，不愿远涉重洋。再说，中国学生待他太好，师生情深，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远走高飞。而后，妻子、岳母先后去世，卫登堡孑然一身，独居斗室。他对物质生活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追求，而一心沉浸在音乐和教学中。

最后的三年

苦难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上海解放了。卫登堡的学生谭抒真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邀请老师到该院任教，卫登堡欣然应允。当时校址在江湾市京路，地处一片田野包围之中。到学校授课，

乘公交车到五角场下车，再进去就要靠步行，或坐在农民骑的自行车车包架上代步。晴天还好，雨天田埂泥泞，浊水溅裤，不仅肮脏而且危险。但是卫登堡虽年逾七旬，却不以此为苦，晴日欣赏阡陌纵横、一望无际的田野，雨天品味雨中迷漾的情趣，还不时同骑车的农民聊上那么几句。然而，他毕竟已是古稀之年，多次这样晚间外出参加音乐会和教课，白天又每日到学生家上课，路途都是遥远的。表面看来，他身体似乎还不错。其实不然，细心的学生察觉，他已不能双腿连续挪动走路，而要走一步停一步。他本来就驼背，这时似乎又添了腰痛，有东西落在地板上时，他已无法弯下腰去拾，而总是蹲下身去拣。

卫登堡步入老年后，听觉渐渐差了，拉琴时声音常常不准，自己却不能察觉，于是他扬长避短，转而以从事钢琴教学和钢琴伴奏为主。但是对于小提琴，他仍锲而不舍地自习，以温故而知新。他为自己定下了规矩，以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作为日课，除安息日外，他每天复习一首，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这六首曲子采用了小提琴在不用钢琴伴奏下拉出双音、三音与和弦等难度极高的技巧，是由于他的恩师约阿希姆以非凡的演奏忠实地再现作品的音乐内涵，而被现代小提琴家公认为小提琴作品的高峰。每当拉起这些曲子，他便回想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回想起老师对他的谆谆教导。他也欣慰地想到，自己有幸能承前启后，引导众多中国学生进入了西洋古典音乐的堂奥。

1952年7月16日，每天到卫登堡家的女佣发现他倒在地上，提琴摔在一旁，谱架上摊放着琴谱，显然他是在练琴时跌倒的。经送宝庆路大华医院急救，弥留了3日，至7月19日上午8时30分溘然长逝，享年72岁。一位在茂名北路

151 弄挂牌行医的霍克斯大夫开了死亡证明书，称他是因中暑心脏衰竭而死亡。

卫登堡偕同家人离开柏林于1939年2月25日抵达上海，直至逝世，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有条件前去美国任教时却不愿前往，而是视上海如家。他把“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乐事，孜孜矻矻，在小提琴界和钢琴界培养出众多俊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栽培出的这些学生，随着工作的调动而散布到各地。他的小提琴学生杨秉荪和司徒华城，曾先后在号称“全国头牌交响乐队”的中央乐团担任过小提琴首席。司徒华城的哥哥兴城，则在我国台湾最好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司徒弟兄一门三杰，都是出自卫登堡的门下，尤其为人们津津乐道。卫登堡在德国时用的是一把意大利制琴圣手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名琴，但是拉起来并不称心。他不信迷信名牌，毅然卖掉，换了一把名气稍逊的Camillo Camilli牌提琴，使用顺手，音色美妙，他珍若拱璧。他逝世后，人们遵照遗愿，将爱琴送到以色列，赠予年轻有为的提琴新秀。

卫登堡去世后，他所属的中欧犹太团体 (Juedische Gemeinde, 社址设在长阳路62号摩西会堂) 为他在倍开尔路(现惠民路) 犹太公墓营建了墓地。这座公墓建于1917年，是犹太人在上海所造的四座公墓中最大的一座，共葬过1692人。中欧犹太团体发请柬给谭抒真等人，邀请卫氏的中国友人和崇拜者参加揭碑仪式。除谭抒真外，毛楚恩、傅聪也去了。从谭抒真保存的照片看，墓地造得相当不错，素雅大方，墓石上方有七弦琴图案。墓文上用英文镌刻着“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阿尔弗雷德·卫登堡”字样，出生年月日采用公历，逝世年月日则分别采用公历和犹历。犹历是犹太

人从《圣经》传说中的上帝创造世界算起，要早于公历3760年。故而卫氏逝世的1952年，应为犹历5712年。从照片上看，墓石上摆满了鲜花。这一点与正统派犹太教的丧葬礼仪不同，他们是在坟上置放石块而不是鲜花。这可能与卫登堡毕生居住德国和中国，风俗习惯已经改变有关。

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交响乐团到北京访问，顺便问起卫登堡的下落，得知卫登堡于1939年流亡到上海，在那里收了许多学生，可惜已亡故了。来人听后，嘘了一口长气说：“卫登堡逃到上海，总算万幸。1939年以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一直在找他，没有成功，还以为他早已葬身在焚尸炉中呢！”安德雷亚斯·莫塞(Andreas Moser)在他用德文撰写的《小提琴演奏史》中，列出了卫登堡的老师约阿希姆所收门生共50人的名单，以奥尔打头，卫登堡排在末位。但该书在1966—1967年出增订版时，卫登堡的名下仍只有生年而无卒年，说明著者那时仍不知卫登堡的下落。

卫登堡长眠在上海，安息在敬爱他的中国学生中间。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韩芬与上海精神卫生

导　　言

与上海相关的犹太人历史中，奥地利籍精神病学家韩芬的名字常被提及。民国时期具精神医学与神经学背景的专家甚少。20世纪30年代韩芬应邀来华，对上海地区此两领域的发展，乃至精神卫生运动的推动，有相当贡献。其所训练的若干名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也成为中国医界的先驱。

早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医学史家王吉民先生，以及民国时期曾任沪江大学心理学教授的韦斯特波洛克 (Charles Hart Westbrook) 就详细记录了韩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作的成绩。此两人与韩芬相识，所著文章对各项事迹记载翔实。¹许布曾先生所著《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一书，利用珍贵档案详尽记载韩芬教授对中国精神病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其中国学生们关于其生平与事迹的回忆。²其他医学与心理学史研究，则简短提及韩芬在中国现代精神医学创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上述关于韩芬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整理其事迹。相较之下，对于韩芬在华活动的背景、脉络，乃至在精神医学与精神卫生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学界迄今着墨较少。本文试图补足这一较未深探的部分。史料上，除当时

1 K. C. Wong, "A Short His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68 (1950), 44–48; Charles Hart Westbrook,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Shanghai,"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0.4 (1953): 301–306.

2 许布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医学期刊、报刊杂志及学者研究外，本文运用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所藏韩芬教授的档案，¹包括简历、各类文书证件、书信、演讲稿、剪报、学术出版品等，希望透过性质多元的史料，更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犹太裔专家学者与中国社会间的关系。

背景与来华渊源

韩芬 (Fanny Gisela Renata Halpern, 1899—1952；中文又名哈而本、哈尔本或解而本) 1899年8月1日出生在现今波兰大城市克拉科夫 (Krakow/Cracow/Krakau) 的犹太家庭。克拉科夫为历史悠久的中欧古城，长久以来是波兰重要的文化、学术与经济中心。19世纪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间，克拉科夫为奥匈帝国所兼并。也因此，韩芬的家族史与此时的奥地利史紧密扣连。父亲 Simon Halpern (1865—1939) 曾任奥地利军医。母亲名为 Rosalie (1875—1951, 原名 Rosalie Salkind)。² 韩芬于克拉科夫及维也纳完成中学教育。大学时期 (1917—1924) 先后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 (University of Graz) 及维也纳大学 (University of Vienna) 习医。³

克拉科夫及维也纳这两个城市的近代史，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犹太人自中古世纪便定居克拉科夫，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约占全城人口四分之一。此时居住在该城的犹太人在融入当地社群、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亦能维持其传统的族裔认同。⁴ 此外，由于19世纪以来维也纳对犹太人实行较宽容的政策，该城在法西斯主义崛起前成为欧洲犹太人聚集，寻求发展的热门之地。犹太人在这一帝国首都表现也颇为亮眼；除传统擅长的工商业之外，犹太人在文化、医学、

¹ Th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Archives (以下简称 SFU), Series F-58-4, Fanny Halpern Records。许步曾先生亦曾利用此批档案材料。

² SFU, F-58-4-1-0-1, “Declaration. To be Rea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Dr. Fanny G. Halpern.”

³ SFU, F-58-4-1-0-1.

⁴ Sean Martin, *Jewish Life in Cracow, 1919–1938*.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04.



韩芬

法律等领域亦有不错表现。¹根据学者推估,20世纪第二个10年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生四成左右为犹太裔,该校医学院的教师以及在维也纳执业的医师,具犹太背景者比例则达到半数。²

韩芬于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决定在维也纳大学习医,主要理由应为该校长久以来一直是奥地利的顶尖学府,且其医学院自19世纪以来更是欧洲医学发展重镇。³虽然20世纪初期就整体而言,德国医学发展相较下更为先进,然维也纳大学因其优秀传统表现亦十分优异。例如,20世纪前半叶共有四位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相关的学者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包括该校教授神经精神科的瓦格纳-尧雷格教授 (Julius Wagner-Jauregg, 1857—1940) 因其发明以疟疾发热疗法治疗麻痹性痴呆 (general paresis of the insane) 的贡献,荣获192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⁴对心理学、精神医学及现代思潮影响深远的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也曾就读该校并于1881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韩芬1924年年底以优秀成绩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甫毕业后便陆续在维也纳大学医院门诊部、维也纳总医院及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工作。1925至1926年初间于维也纳总医院内科服务。1926年11月至1933年11月间则任职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科门诊部。在该单位任职期间,韩芬先后在瓦格纳-尧雷格及奥图·波尔兹尔 (Otto Poetzl, 1877—1962) 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1931年因研究与工作成绩优秀,升任临床助理 (clinical assistant)。⁵韩芬之所以得到瓦格纳-尧雷格及奥图·波尔兹尔青睐,自然跟其优秀表现相关。在维也纳任职期间,她在当时德语系重

¹ Marsha L. Rosenblit, *The Jews of Vienna, 1867–1914: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² Steve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3–38.

³ Erna Lesky, *The Vienna Medical School of the 19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⁴ SFU, F-58-4-1-0-1, F-58-4-1-0-1.

⁵ SFU, F-58 4-1-0-1, "Curriculum Vitae," "Curriculum Dr. Emmy G. Halpern."

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与生化、大脑病理、临床神经学及临床精神病学的文章，其专业水平与教学表现亦十分杰出。¹或因欲融入主流社会，犹太裔的韩芬于1932年改信天主教。²

韩芬与中国的渊源，起自1933年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1882—1970）邀请她赴上海任教。相较于其他现代医学专科，神经学与精神医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一般而言中国医学生对其兴趣亦不高。20世纪30年代初期，时任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夏自中央大学独立，改为国立上海医学院）³院长的颜福庆希望发展神经精神医学。毕业于美国医学及精神医学发展重镇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雷门（Richard S. Lyman, 1891—1959）1931年应其邀请至该校工作。然雷门来沪数年后，即因上海缺乏相关精神病专门临床与教学机构，转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接任神经精神科主任。⁴或因瓦格纳-尧雷格在精神病学领域的成就，颜福庆透过曾于维也纳任职的北平协和医院眼科皮乐德教授（Arnold Pillat, 1891—1975）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奥地利政府联系，寻求适合来华任教人选。在瓦格纳-尧雷格及波尔兹尔的推荐下，韩芬于1933年接受上海医学院神经精神科助理教授一职的聘书，⁵并于12月中旬抵达上海。⁶

韩芬来华，自然与其表现备受肯定，受师长推荐相关。然而，此时欧洲大学与社会环境对身为犹太裔女性医学研究者而言并不友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00年方才开始招收女学生。⁷此外，韩芬据称是首位于维也纳大学精神科担任临床助理的女性。⁸此现象一方面显示韩芬表现杰出，但也说明当时维也纳大学正式教职几乎全由男性担任的事

1_SFU, F-58-4-1-0-1.

2_ "Prof. Dr. Halpern gestorben," *Neue Wiener*, July 22, 1952.

3_ 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5—137页。

4_SFU, F-58-4-2-0-3, F. C. Yen to Dr. A. Pillat, June 9, 1932; Charles Hart Westbrook,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Shanghai,"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0.4 (1953): 301–306.

5_SFU, F-58-4-2-0-3, F. C. Yen to Dr. A. Pillat, June 9, 1932; SFU, F-58-4-2-0-3, F. C. Yen to Fanny G. Halpern, March 9, 1933; "Oesterreichische Aerztin in Kanada gestorben," *Das Kleine Volksblatt*, 22 July 1952.

6_ "Psychiatrist Arrives Here to Begin Work," *The China Press*, December 16, 1933.

7_ "Women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https://www.univie.ac.at/archiv/tour/15.htm>.

8_ "Dr. Fanny Halpern Speaks to Danube Women and Guests," *The China Press*, March 25, 1934.

实。实际上，也由于类似的性别因素，19世纪末以来若干西方女性医疗者（包括相当比例的医疗传教士）或因被歧视，或发展受限而转赴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发展。¹再者，此时维也纳大学中具犹太裔背景者的教师比例虽高，但要升至职位数量甚少的正教授极为困难。²在此状况下，中国教育部具名邀请，再加上在亟须专业人才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工作，相信对韩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1933年底抵达上海，至1951年年底离华，韩芬旅居中国超过17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虽动荡不安，但韩芬的工作也获得不错的成果，受到各方肯定。就性质而言，其在华活动主要可分为教学研究、机构建置与精神卫生事业三大方面。下文分段简短介绍。

教学研究

韩芬抵达上海不久便开始逐渐建立起在上海地区的神经精神科教学网络。教学工作包括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学医院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以及中山医院）教授，并于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Shanghai Wome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开授课程。1935年于上海医学院升任教授。抗战爆发后因该校迁至昆明，1939年韩芬转任圣约翰大学担任神经系病学及精神病学教授，并兼任其教学医院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神经精神科主任。同一时期也在同济大学、马格理医校（Margaret Williamson Medical College）开授课程。³许步曾先生的著作列举了相当多的中国神经科与精神科医师皆受其教诲及影响，或与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就韩芬的学术及研究取向，深受当时德语世界精神

¹ Hsiao-Yun Wang, "Stranger Bodies: 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Regina Morantz Sanchez, *Sympathy and Science: Women Physicians in American Medicin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² Steven Beller, *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5-37.

³ SFU, F-58-4-1-0-1.

医学、神经学以及心理学科发展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大学精神科的研究取径主要属于生物精神病学。瓦格纳-尧雷格在精神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贡献分别为因梅毒引发的麻痹性痴呆的疗法，以及甲状腺呆小症(*thyroid cretinism*)。此一现象便清楚说明当时维也纳精神病学着重大脑及神经系统病理，解剖以及与生理学的研究特色。瓦格纳-尧雷格亦长期关注遗传因素在引发精神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晚期更积极参与奥地利的优生学运动，鼓吹防止具不良心智素质及犯罪倾向者生育子女。¹此外，作为正统生物精神病学的代表，瓦格纳-尧雷格虽然承认精神疾病有其心理层面，但对同一时期在欧洲蓬勃发展的精神分析相当有意见。²韩芬在维也纳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也承袭上述传统，偏重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的病理与生理研究。³

任职上海期间，韩芬学术研究着重在中国人梅毒及神经性梅毒的盛行率，胰岛素休克疗法对中国人的疗效研究，脑海绵状血管瘤临床报告等。⁴此部分出版数量较维也纳时期少，但基本上延续之前的研究方向，并将之放在中国的脉络下思考。有趣的是，从韩芬在中国发表的公开演讲及推动的工作，部分重点与维也纳大学精神科与神经学的取径有相当差异。对她而言，现代精神医学的发展特色之一，除着重对精神疾病进行器质性与生理学研究外，也同时强调心理成因及心理学的考察。⁵也因此，韩芬对于当时心理学及动力精神医学的发展，也有所掌握。若干论者指称韩芬为弗洛伊德的学生。然严格而言，精神分析在20世纪20年代并未在大学正式开授，韩芬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成绩单上亦无相关记录。⁶相较于弗洛伊德，韩芬恐怕透过非正

1 Magda Whitrow, "Freud and Wagner-Jauregg: A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Psychiatric Bulletin* 14 (1990): 356–358; Cynthia J. Tsay, Julius Wagner-Jauregg and the Legacy of Malaria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General Paresis of the insane, *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86 (2013): 245–254.

2 Magda Whitrow, *Julius Wagner-Jauregg (1857–1940)*. London: Smith-Gordon, 1993.

3 SFU, F 58 4 1 0 1, F 58-4-2-0-9.

4 F. G. Halpern and J. C. Tseng, "The Incidence of Syphilis and Neuro-Syphilis among the Chinese," *China Medical Journal* 53 (1938): 281–286; Fanny G. Halpern, "Insulin Shock Therapy of Schizophreni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96.5 (1940): 1153–1165; Fanny G. Halpern, "A Case of Cavernous Angioma of the Brain,"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6.4 (1941): 134–139.

5 SFU, F-58-4-2-0-10, Fanny G. Halpern, "Problems of the Mental Welfare and Mental Hygiene in China" (1936); SFU, F 58 4-2-0-10, Fanny G. Halpern, "What is Mental Welfare" (1938).

6 SFU, F-58-4-1-0-3。大学修业课程精神科领域包括瓦格纳-尧雷格1922年开授之“神经疾病临床”课程。

式课程受阿德勒 (Alfred Adler, 1870—1937) 的影响更大。¹ 20世纪初以来积极参与精神分析运动的阿德勒于1911年与弗洛伊德决裂后，自创个体心理学 (individual psychology) 学派。其学说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国际上影响力颇大。从韩芬上海时期的公开演讲与相关报道来看，其使用与人格结构、心理与文化及精神卫生相关的概念，如“自卑情结” (inferiority complex)，“社会情感” (social feelings) 等，多出自阿德勒的学说。²

机构建置

民国时期各式精神卫生资源缺乏，特别是都会地区对治疗及疗养机构需求相当高，然同时设置此类机构的难度也极大。20世纪30年代之前，仅有广州、苏州、北平几处由外国教会或地方政府兴办疗养院或精神病院。此时上海虽已有几所由私人、外国教会及租界政府兴办的精神病院，但规模甚小，院内环境与设备亦不甚完备，实不足以解决该市及邻近地区精神卫生方面的需求。³ 韩芬在二战后回忆时亦提及，1933年来华时曾参观过慈善家陆伯鸿 (1875—1937) 兴办的新普育堂 (St. Joseph's Hospice)，其中留置的精神病患被铁链拘禁躺卧在地。而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疯犴可以医治，而大部分病患被拘留在家中。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华南及华中地区医学院并未提供神经科与精神科课程，本地医师无从学习相关知识与疗法。⁴

韩芬到任未久 (1934年) 便于上海医学院开授神经学及精神病学课程，并于红十字第一医院设置神经精神病科。同年，韩芬听闻陆伯鸿计划在上海近郊闵行开办救济院，劝之改办精神病院，并主动提供协助。1935年6月普慈疗养

¹ Charles Hart Westbrook,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Shanghai: Historical Sketc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0.4 (1953): 301–306; Geoffrey Blowers, "Bingham Dai, Adolf Storfer, and the Tentativ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tic Culture in China: 1935–1941,"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6.1 (2004): 93–105.

² 韩芬，论心理卫生，《西风》，46 (1940): 351–358; SFU, F 58-4-2-0-10; Fanny G. Halpern, "Mental Hygiene" (1940)

³ K. C. Wong, "A Short His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68 (1950): 44–48; Veronica Pears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sychiatric Services in China 1891–1949," *History of Psychiatry* 2.6 (1991): 133–147.

⁴ Fanny Halpern, "His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China under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Conditions in South-and Central China," SFU, F 58-4-3-0-3.

院 (Shanghai Mercy Hospital for Nervous Diseases) 正式成立，被誉为上海第一所“现代”的精神病院。陆伯鸿担任院长，韩芬出任医务主任，并邀请外籍修士及修女负责护理、治疗工作。¹ 1935年7月接受《大陆报》记者访问时，韩芬强调希望将维也纳的方法与资源带入上海，在上海地区设置现代精神病院。1937年韩芬及 J. Gray 医师参与红十字医院神经病理科的成立，诊治因敌争头部及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士兵与百姓。除由天主教会与上海各政府兴办普慈疗养院之外，宗教团体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与上海精神卫生促进会也于1940年6月成立“神经系病治疗院”(Therapeutic Institute for Nervous Diseases)。韩芬参与该单位的规划，并于1940—1943年间担任医务主任一职。一如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此一单位就当时中国标准而言颇具实验性。一般病房收容中外病患，精神医师与心理学家、社工师及教师合作研究与治疗病患。治疗院内另设有儿童心理指导所 (Child Guidance Clinic)，可就问题儿童进行调查、测验与治疗。² 抗战爆发日本占据上海，对相关机构的运作也产生影响。“神经系病治疗院”被迫关闭。同仁医院也被日本人接管，改为“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the Civic Assembly Centre) 附属医院。韩芬受上海瑞士总领事馆邀请，担任该院医师，诊治外国侨民的神经与精神疾病。³

1_Fanny Halpern, "His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China under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Conditions in South-and Central China," SFU, F-58-4-3-0-3.

2_ "Neuro-Pathology Department Forme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August 27, 1937; "Work for Shell-Shocke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September 7, 1937.

3_ 精神卫生促进会，《申报》，1940年7月18日；"The Therapeutic Institute for Nervous Diseases of the World Red Swastika Society," *Shanghai Medical News* 6.25 (1940): 4.

4_ SFU, F-58-4-1-0-3, Swiss Consulate General, "Medical Attention," September 28, 1945.

以上机构的建置与发展，可放在两个脉络下理解。首先，随着20世纪初期疟疾发热疗法 (malaria fever therapy)、胰岛素休克疗法 (insulin coma therapy) 及精神药物疗法的普及，包括韩芬在内的精神医师相信可以治疗为目的的“医院”(hospitals) 取代19世纪以来以拘禁及收容病患为目的的“疗养院”(asylums)。换言之，对医界而言，精神病患成

为可以积极治疗,而非消极监禁或疗养的物件。其次,随着此时国际间精神卫生运动的推动,预防精神疾病的重要性更胜于其治疗。当时论者鼓吹精神医师应该跟更多的专家与社会人士合作,自然也因此强调精神卫生人才的训练,精神卫生知识的推广。根据这一精神,疗养院及医院不单纯只提供医疗服务,更是促进民众的精神健康网络的重要机构。¹

上述机构在上海等地成立,显示的不单纯是现代精神医学与精神卫生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医疗专业人士的参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团体也使其成立与运作得以可能。以上海普慈疗养院为例,热心天主教教务且急公好义的陆伯鸿成立该院,主要是出自慈善动机与宗教情怀。普慈疗养院自规划阶段至营运期间,接受包括上海租界政府及上海特别市政府的补助,可见该机构负担起维持社会治安,以及提供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服务的功能。而对病患及其家属而言,疗养院提供治疗赡养精神疾病的服,协助维持家庭完整,并分担照料家人的压力。自然,包括韩芬在内的西方与中国专家们提供的医疗服务,也促使此时精神疗养院及精神病医院所具有的多元社会功能得以运作。²

精神卫生事业

韩芬旅沪期间,对于推广精神卫生亦极为热衷。20世纪初国际精神卫生运动首先由美国开始,强调精神疾病的预防比其治疗更为重要。也由于强调精神疾病的预防,该运动所涉及的工作层面十分广泛,不单纯是精神疾病的治疗与研究,还包括整个社会心理健康与福祉的提升,甚至社会

¹ 王文基,《疯狂、机构与民国社会》,未刊稿。

² 王文基,《疯狂、机构与民国社会》,未刊稿。

秩序的重构。¹在此同时，各国因情势不同，所推行精神卫生的重点也有所差别。²

1934年中华医学会于广东召开第三届年会，韩芬提议组成精神病学委员会，由大会同意通过。在1936年召开的委员会中，颜福庆担任主席，韩芬担任秘书。该委员会此时工作主要为医护人员开设精神病学及神经学课程，筹设对象为教育工作者及一般民众的精神卫生及儿童指导研究班。另与律师起草与精神病相关之民法与刑法规定。³1937年，上海医学、教育、社会服务、妇女及慈善团体联合成立“上海精神卫生委员会”，韩芬也是该单位重要推手之一。其主要宗旨在预防及解决儿童精神与心理问题，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精神卫生协助，开设精神病学及心理学课程，以及训练精神卫生义工等。韩芬担任该委员会医药顾问，并为特别挑选的50名大学生开授心理学课程。⁴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精神卫生运动的发展，1939年韩芬访问英国、美国及加拿大等国，考察重要精神医学及精神卫生机构与作法。她对美国精神卫生的蓬勃发展印象最为深刻，特别是政府对运动的大力支持，心理学、社工等专家对运动的积极参与，对问题儿童处置的重视，以及对康复病患出院的照护与观察等。⁵

由于上海邻近地区受过精神医学及精神卫生专业训练人数不多，韩芬也通过公开演讲一方面推广精神卫生意识，另一方面藉此吸引更多社会人士直接或间接参与相关工作。1934年至1940年，其发表的讲题包括个体心理学、性格学、自我认识、问题儿童，神经症及其预防，精神卫生与精神福利，中国的社会问题等；而邀请单位则多为西方人兴办组织，涵盖妇女、社会、医疗公共卫生以及宗教各界。⁶就此点

1_Gerald N. Grob, *Mental Illness and American Society, 1875-194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4–178; Johannes Coenraad Pols, “Managing the Mind: The Culture of American Mental Hygiene, 1910-195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7.

2_Mathew Thomson, “Mental Hygiene as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in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sations and Movements, 1918-1939*, edited by Paul Weind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83–304

3_“C. M. A. Committee on Psychiatry,” *Shanghai Medical News* 2.9 (1936): 2; SFU, F-58-4-2-0-10, Fanny G. Halpern, “Problems of the Mental Welfare and Mental Hygiene in China” (1936)

4_“Mental Welfare Committee,” *Shanghai Medical News* 4.26 (1938): 2.

5_“US Mental Hygiene Impresses Specialist,”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November 14, 1939.

6_SFU, F 58-4-1 0-1, “Lists of Papers and Lectures given by Dr Halpern to Various Organizations.”

而论，虽然韩芬特别强调以医院及医学院作为训练各式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的主要基地，但其他包括社会服务、成人教育以及妇女团体的合作，也促使精神卫生网络所包含的层面更为广阔。

就韩芬的精神卫生思想而论，其基调与同一时期国际精神卫生运动一致，强调个性发展、情感与心理的安定，以及帮助个人适应社会。也由于此时精神卫生特别强调精神疾病的预防、儿童行为、情感与态度的指导，亦十分重要。然而在此同时，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强调的若干概念，也使得韩芬的想法与做法具有其特色。例如，个体自幼年所形成“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 左右其一生与外界的互动；错误的生活方式将导致社会适应不良，引发包括行为与情绪问题，甚至神经症与自杀。此外，权力意志 (the will for power) 或自我肯定的本能 (self-assertion instinct) 也常常与社群意志 (the will for community) 或社会本能 (social instinct) 产生冲突，进而导致无法适应社会。认识自我、了解适应不良所可能引发的自卑、懒惰、退缩或固执等不正常的态度，有助于维持精神健康。此外，透过教育及精神治疗的手段，可协助个体导正这些错误，引导朝向正确的生活目标前进。¹相较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年轻精神卫生专家较多受瑞士裔美国精神医学家阿道夫·迈尔 (Adolf Meyer, 1866—1950) 与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²韩芬选择的是动力精神医学的另一个走向。由此可知，精神卫生于民国时期有几个核心发展基地，在建制与精神上也颇受国际精神卫生运动的影响。然而若就学术渊源及思想的细节，几个基地间仍有所差异。

最后，由上文可知，在理想状况下（姑且不论法西斯主

¹ SFU, F-58-4-2-0-10. Fanny G. Halpern, "What is Mental Welfare" (1938); 韩芬, 论心理卫生, 《西风》, 46 (1940), 351-358. SFU, F-58-4-2-0-10, Fanny G. Halpern, "Emotional Balance in Daily Life" (1949).

² Wen-Ji Wang, "Neuroasthenia and the Rise of Psy Disciplines in Republica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0.2 (2016), doi: 10.1163/15685396-01002002.

义的兴起、性别与族裔歧视等时空背景），韩芬若留在维也纳或德语世界其他大学神经精神领域系统内发展，她心理学的知识在此一生物精神医学主导的环境中恐无用武之地。或许可以说，在中国推动精神卫生运动的需求，以及上海中西各界人士对该运动的热诚及其所具有的相关知识，使得韩芬得以发展原有心理学的兴趣。就此意义而言，韩芬的形象，或韩芬与民国时期上海精神卫生的关系，恐怕较我们所熟悉的说法更为复杂。她并非单纯是不少论者笔下一位将现代精神医学及神经学知识引进中国的西方专家。此时的上海提供了一个颇佳的环境，来自各地且性质不同的知识得以在此交流、激荡。换言之，无论是韩芬，旅沪西方各社会团体（包括妇女、心理、社工、宗教界、租界政府），或是中国当地人士（士绅、医界、地方人士、官方等）的想法及作法，都有可能藉此机会转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结语

战后至1951年间韩芬持续在上海地区重要大学及医院服务，包括在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公济医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仁济医院（Lester Chinese Hospital）、西门女孺医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在内等单位。战后初期也协助处理英美各国侨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因韩芬长期对中国精神医学领域的贡献，1948年底奥地利公共卫生部及社会事务部部长特别发函表扬。¹ 1947—1948年间中国情势及环境不适合研究与临床工作，韩芬曾思考前往美国或加拿大工作，并与美国若干研究与医疗单位取得联系。然恐因美国执业需先通过该国医师国家考试之故，后并未成行。² 1951年，韩芬以治疗疾病及料理家务之故，申请前

¹ SFU, F-58-4-2-0-4, Karl Maisel to Fanny G. Halpern, November 30, 1948.

² SFU, F-58-4-2-0-4, Beulah Brewer to Mrs Lloyd H. Ziegler, June 10, 1947; Beulah Brewer to Fanny G. Halpern, June 25, 1947; Jacob Morgenstern to Fanny G. Halpern, December 8, 1947; SFU, F-58-4-2-0-5, J. C. McCracken, November 3, 1947; Fanny G. Halpern, November 28, 1947; Jacob Morgenstern to Fanny G. Halpern, February 20, 1948.

往加拿大。¹该年11月韩芬离开旅居多年的中国，抵达加拿大，后与旅居温哥华的弟弟及弟媳团聚。抵加后韩芬因肺结核入院治疗，1952年6月26日病故，享年53岁。

在20世纪前半叶，犹太人因为不同的理由来华发展，其中颇多因为俄国大革命及法西斯主义兴起等因素流亡或逃离家园。与之不同，韩芬是因为国民政府的邀请，出自个人意愿来华发展，也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在国际情势极为动荡的1930、1940年代，韩芬自然也无法完全自外于民族的命运。战时她与上海犹籍团体保持接触，或发表演讲，或就精神卫生问题提供专家咨询。²此外，韩芬若干家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也与中国相关。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对韩芬一家造成巨大影响。父亲Simon Halpern 1939年2月去世。政府对犹太人系统性的迫害也促使韩芬母亲Rosalie，弟弟Georg及弟媳Ida（原名Ida Ruhdörfer）离开维也纳，移居上海。甫获得维也纳大学音乐学博士的Ida Halpern曾短暂任教于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³ Georg与Ida二人于193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具有维也纳化学博士学位的Georg经商，Ida则成为加拿大著名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st）。母亲Rosalie选择留在上海陪伴韩芬，1951年6月底于上海去世。

20世纪40年代上海为日军占领，抗战结束后全中国社会与经济状况不佳，精神卫生工作推动成果有限。再加上1949年后政治与社会局势不变，韩芬及其同事于20世纪30年代间由当时国际精神医学与精神卫生角度为华洋杂处的上海所进行的诸多规划，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势必不合时宜。在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及医学发展也非从零开始。持平而论，韩芬在引进医学知识及技术，以及专业人员

1_SFU, F-58-4-2 0-8.

2_SFU, F-58-4-2-0-4.

3_Douglas Cole and Christine Mullins,
“‘Hilda Ida’：The Musical World of Ida
Halpern,” *BC Studies: The British
Columbia Quarterly* 97 (1993): 3-37.

训练上，留下一定的成绩。而这些成果如何在20世纪后半叶转化、进而产生新的生命，这些或许是在评价韩芬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时也需一并思考的重点。

（作者为台湾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王文基，编者将原文由繁体转为简体，保留了所有注解。）

附录：

韩芬的同事、同行和学生

粟宗华是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韩芬于1933年到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时，粟宗华已于上一年在该院毕业，以后直至1935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然后再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粟在1938年回国后，在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红十字会总医院任神经、精神科主任和自己创办虹桥疗养院，设立精神科病房期间，与韩在业务上时有接触，粟常把病人介绍给韩，韩对于粟介绍去的病人在诊金上给予优惠。

夏镇夷是中国精神医学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精神病学专家。他于1933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正是韩芬从奥地利来华，在该院任教的那一年。后来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名誉院长。夏镇夷说过，韩芬介绍过3种对精神病的疗法：疟疾发热疗法、胰岛素休克疗法及精神药物疗法。

周孝达医师在毕业并担任精神病科医师以后，仍常返校听韩芬的课，足见韩芬医道的精深。韩芬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任教时，代理校长卜其吉（老校长卜舫济的儿子）在向新生介绍她时，对她精湛的医术予以推崇。圣约翰医学

院的同事如倪葆春、兰锡纯、黄铭新、叶衍庆，都对她的医道非常赞赏。这些都是当时上海的名医，其中有些人后来享誉国内外。

精神病科是一门需要有其他许多科目会诊的科目。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放射科医师徐惊伯，于1937年至1947年在中比镭锭医院（肿瘤医院前身）任职。徐说，韩芬常介绍病人到该院拍片检查或做放射治疗。该院也常请韩芬会诊或开医学研讨会。徐说，韩芬医道确有一套。

与韩芬同样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医师杨保傲，也常由韩芬介绍病人来检查眼底。两人由于受业于同一学校的缘故，对对方所写的德文病历都很满意。韩芬的学生，有许多后来成为其他科目的专家，如黄偶麟在胸外科，陈美璞在妇产科，叶椿秀在心胸外科，葛成筠在眼科，他们都已年过八旬，黄偶麟于近年逝世。当年在韩芬严格的教育下，他们对精神病学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韩芬上课不用现成的教材，也不发讲义，只是口头讲授，由学生记笔记。细心的陈美璞发现，韩芬讲授的两堂课之间，衔接得总是很密切，这说明韩芬的讲课貌似信手拈来，其实是经过很好安排的。韩芬用英语上课，她的英语不错，只是德、奥人的口音较重。韩芬考试从不用笔试，全是口试。学生回忆，韩芬的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艰深的课程内容，严格的口试，题目的交叉学科性，常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口试常在她位于亚尔培路亚尔培国王公寓（今陕西南路陕南村）的家中进行。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爱泼斯坦

1915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 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波兰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范围内。他的父亲曾因领导劳动者起义而被俄国当局关押，母亲则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爱泼斯坦的父亲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也逃亡到亚洲投奔他的父亲。最终，全家于1917年迁往中国，并于1920年定居于天津。爱泼斯坦是父母的独生子，父母竭尽全力让爱泼斯坦接受最好的教育。由于在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学习英语，后来爱泼斯坦一直以英文写作。

接受革命思想

爱泼斯坦从看俄文的儿童读物开始，然后迷上了普希金的诗、再到他所钟爱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之后，他又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著作。再后来，他开始读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在阅读俄文书的过程中，爱泼斯坦逐渐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有了认识，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天津亲眼看见的现实也冲击着爱泼斯坦年轻的心灵：

“我10岁前，中国连年内战，我看到很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他们流着眼泪向他人讨一口饭吃，有的人出卖亲生的孩子，有的人愿意作奴婢也不愿活活死去。一个寒冬的早晨，我走出家门上学去，一出门就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蜷缩在那里躲避刺骨的寒风，实际上那已经是一具被冻僵的尸体！”就这样，现实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切与他所吸收的先进思想相互交织，使他选择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1931年，16岁的爱泼斯坦初中毕业，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了记者生涯。1933年底，有人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战线》交到了爱泼斯坦的手中，要他写一篇评论。在阅读《远东战线》时，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在北平的住址，专程去拜访了斯诺，自此开始了两人长达40年的友谊。此后，在对斯诺的拜访中，爱泼斯坦听到了斯诺访问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新鲜见闻，看到了《西行漫记》的手稿，他开始与中国进步青年接触。并真正开始对中国革命感兴趣。斯诺也有意无意间促成了爱泼斯坦为中国共产党做的第一份工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护送邓颖超回延安。说起斯诺对自己的影响，爱泼斯坦在《回忆埃德加·斯诺》一文里这样写道：“是斯诺让我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联系，是他使我与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外国进步人士相识，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发展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是他介绍我阅读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一些文章。没有斯诺，我会仍在黑暗中摸索。”

投入抗日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失守后，爱泼斯坦



2005年，胡锦涛主席看望爱泼斯坦(左)

的家人不愿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打算移居美国。然而，经过一番思量后，爱泼斯坦却决定留在中国。作为一名没有国籍的犹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中国从事新闻工作时刻都会有危险，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并且说出了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话：“我要留在中国。看看日本是怎么战败的。”

从1937年到1938年，身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他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这是他头一回亲临战地采访。面对大炮轰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战争惨烈景象，他和几个记者都感到十分紧张。当站在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兴奋无比的他和著名纪录影片导演伊文思合影留念，欢呼中国军队的胜利。爱泼斯坦写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胜利。”对于当时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爱泼斯坦有这样的记述：“八路军用事实表明了他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并深深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群众懂得，保家卫国，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在这里，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权利，第一次可以作为人、作为公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纷纷涌向八路军新成立的军事组织，并带去自己的武器……”

爱泼斯坦始终旗帜鲜明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

他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在读了《人民之战》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阅读。”埃德加·斯诺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延安之行

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到边区时，爱泼斯坦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号子”，与《黄河大合唱》的基调结缘。他回忆道：“我们乘一艘平底木船渡过黄河的腾飞激流。船上可容约50人，有16名船夫都伸腿坐着，几个人划一支桨，运用全身力气、齐声高唱号子，那种雄浑高亢的声音令人终生难忘（这个号子是中国杰出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的基调，后来我们在延安听到一两百人高唱这首歌曲，内心感到巨大的震撼）。”爱泼斯坦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如此的不同，从将军到士兵再到民众，他们都同自己前些天在陕南国民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旗帜和横幅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一个年轻，另一个有些胡子。他们同我们握手，说是乡政府派他们来的。然后带领我们爬上山头，进入一个村子。村子里有在黄土高原上常见的一口口窑洞，我们住进了其中一个窑洞，窑洞里有一个很长的炕和一个炉灶。窑洞前是一个院子，养着一头奶

牛,一头驴子和一群鸡。”

到达后的第二天。爱泼斯坦一行第一次见到王震,在《见证历史》中,爱泼斯坦如此形容王震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第二天一早,一位军人骑马来到,他穿着一身沾满灰尘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陕甘宁边区南部警卫部司令员王震,已经为我们备好马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在接下来继续西行赶赴延安的途中,爱泼斯坦记录道:“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顾马匹。总体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在边区采访的每一天,都让爱泼斯坦处于兴奋状态,他在给自己妻子邱茱莉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边区不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言语和行

动中，从他们每一次的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10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到达延安后，爱泼斯坦进行了3个月的采访，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震、聂荣臻等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谈，并在此期间做了将近十本采访日记，发表了众多新闻稿件。他还获得了毛泽东赠送的一幅石版画像，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家中。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爱泼斯坦也毫不吝啬地大加赞赏。在延安采访的中共领导人中，让爱泼斯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面。”在爱泼斯坦的印象中，毛泽东同记者团成员会餐时也是比较随意的。“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矩。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

一次单独的、没有时间限制的采访，让爱泼斯坦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地形象地去说服别人。他一生的经历从当教员开始不是没有好处的。”在爱泼斯坦心中，毛泽东当时虽然偏居一隅，但是对国际形势却是了然于胸：“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

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

爱泼斯坦在他的回忆录《见证历史》中还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过比较形象的对比：“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粗壮裸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患的迹象）。毛泽东则相反，他当时虽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上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在当时发给《纽约下午报》的文章中，爱泼斯坦如此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同样的印象。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相处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么就是干脆不见你，要么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复问题非常严肃，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爱泼斯坦还采访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总司令爱吃蔬菜，他自己开垦了一块地，种植西红柿。“我们外国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己种的西红柿送了我们好几百，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了这些好吃的鲜果，还使我们

产生了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在爱泼斯坦当时的采访记录中，他对朱德有这样的认识：“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宽宽的脸庞；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

在延安几个月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中，爱泼斯坦写道：“我们这次旅程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八路军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对每个据点里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能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

多年后，爱泼斯坦每当回忆起这次去延安的经历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天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

“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这次访问之后，爱泼斯坦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尚未结束的革命》。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周恩来的深厚友情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爱泼斯坦在武汉见到了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的风度和言谈深深吸引了他：“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有时去拜访他，尽管我那时年轻、各方面不成熟，但他还是很耐心地、热情地对我讲解了许多事情。他那坚毅、诚恳、明确、有耐心和对原则问题极端严肃的态度，同他的豪爽风度和言谈交织在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那么谈笑风生，不咬文嚼字，敷衍了事或干巴巴的。有时候他还派助手来提醒我对各种事件和倾向的注意，教育我，使我懂得了过去所不知道及不了解的事情。”

在此之前，爱泼斯坦就已经对周恩来崇敬已久。1936年冬天，在看了斯诺《西行漫记》的初稿以及他所拍摄的照片后，周恩来和中共领袖们的形象和言论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西安事变发生后，爱泼斯坦又在斯诺那里看到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英籍新西兰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从西安发来的信，记述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这次危险而又成功的使命中，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针，使这个事件成为全国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转折点”。

到了重庆，爱泼斯坦回忆道：“在重庆，我作为一个外国

记者，所获得的最可靠的消息都来自周恩来的办公室，有的是直接取得的，有的是通过龚澎或他的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同外国记者保持着经常接触”“外国新闻记者（不论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如何）都知道，他们从周恩来及他的联络人员那里所得到的材料比国民党发言人所提供的材料更真实。”

在《见证历史——爱泼斯坦回忆录》中，爱泼斯坦对周恩来作为领导人的超凡魅力深有感触：“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来到了会场，就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马上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交谈的主角。”此外，周恩来同中共代表团中其他成员相处时那“亲如一家”的气氛也让爱泼斯坦印象深刻，觉得“很有教育意义，令人难忘”；“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厨师、警卫、通讯员等），他都平等相待。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儿保育到文娱晚会。”

爱泼斯坦还提到自己和另外一些国外友人参加过的一次文娱晚会，周恩来的音乐才能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但是在工作上，周恩来“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严格要求的，直到每一个具体细节”。爱泼斯坦提到，有一次周恩来同外国记者交谈时，自己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结果周恩来的回应是对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在重庆给爱泼斯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皖南事变前后周

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刚毅不屈的精神。他说：“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暗中下毒手，在皖南事变中向新四军发动了血腥的攻击。周恩来同志机智无畏地进行了斗争。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要把事实真相登出来，被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官删去了。周恩来同志亲自执笔写了一首控诉的诗，照相制版后，填补在‘开天窗’的空白版面上，谴责这次血腥进攻。等新闻检查官回家后，他指示报纸重新开印。并且宣布，假如敌人妄图以‘违法’的罪名逮捕报社任何工作人员的话，那就得先逮捕他本人。周恩来同志把关于这个事件的党的全部声明交给了当时正在重庆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立刻把这些声明带到国外，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1944年，爱泼斯坦离华时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坦诚直率的谈话。对于这次对话对自己的影响，爱泼斯坦曾这样写道：“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在《见证历史》中，爱泼斯坦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自己对周恩来的印象：“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后来，他成了新中国的‘敬爱的总理’。其实，早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他就为人们所敬爱了。”

《黄河大合唱》

延安之行，让爱泼斯坦成为将《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传唱国外的第一人。半个世纪以来，爱泼斯坦一直珍藏着在延安的采访笔记和照片；另一件一直被收藏的珍贵物品，便是由延安带回的《黄河大合唱》的乐谱。“风在吼，马

在叫，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当年，在延安随处可以听到这首歌曲，那激昂铿锵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黄河大合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强音，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强的精神。当时，他特意向延安有关部门要了一套《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从此一直珍藏着。

当爱泼斯坦前往美国途经英国时，遇到了他的中国老朋友、翻译家叶君健，久已酝酿在心的奇想蓦然凸显：何不将《黄河大合唱》这首优美杰出的歌曲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去？那一定会产生宣传中国、增进了解中国的效果！到美国后，爱泼斯坦揣着心爱的《黄河大合唱》乐谱及译词，四处奔走。他先是把《黄河大合唱》送给俄裔美国朋友、著名的“唐格坞音乐节”的作曲兼指挥谢尔盖·科斯维茨看，希望在他那里演出。但这位俄国流亡者不屑地说配器法太简单，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爱泼斯坦并不气馁。他又通过美国“援华委员会”请一位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德福·莱格尔来合作。在莱格尔的帮助下，乐曲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使演奏效果更具震撼力。爱泼斯坦还得到了纽约州长查尔斯·爱迪生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夫人的赞助。他们都被爱泼斯坦的真诚所打动，接受了他的请求，并说服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演出。

从此，《黄河大合唱》为世界所知晓，并为很多国际友人广泛传唱。

“欢迎回家”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此后冷战爆发，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爱泼斯坦的处境甚为艰难。195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向爱泼斯坦夫妇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他们能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爱泼斯坦夫妇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们经过了49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天津港。随后又乘火车从天津抵达北京。抵达北京后，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欢迎回家。”这四个字让当时在美国饱受怀疑、调查与跟踪的爱泼斯坦倍感温暖。

事实上，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结识要前推至抗日战争打响后的广州，两人在游行的队伍里第一次相遇。随后，他便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了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并在转移到香港之后担负起这个组织的宣传工作。在战火中结成的友谊，使爱泼斯坦一生对宋庆龄都非常敬重，把她视为自己的良师和慈母。而宋庆龄则认为爱泼斯坦是最了解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作家和出版社负责人请求得到她的允许为她作传，她都谢绝了。宋庆龄说：“我只信任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在宋庆龄逝世后，已年过七旬的爱泼斯坦不负重托，历时10年，用英文精心撰著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由著名翻译家沈苏儒翻译成中文于1992年出版。这部传记获得了第一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回到新中国后，爱泼斯坦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在宋庆龄领导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英文杂志《中国建设》（1990年

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队伍中,一干又是半个世纪。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爱泼斯坦投入到了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建设中。1957年,爱泼斯坦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获得周恩来的批准后,爱泼斯坦成了一名中国公民。1964年,爱泼斯坦又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回忆录《见证中国》中,爱泼斯坦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他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2005年,当爱泼斯坦九十寿辰之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前往他家中祝贺。当年5月26日,爱泼斯坦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在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亲自前往送别。

是怎样的热爱,才能让一个人把他乡当成了故乡?爱泼斯坦是真诚地热爱中国的,可能比起某些中国人还要爱得真挚、热烈。什么力量也都动摇不了他热爱中国的信念,即使在“文革”中遭到横逆的时刻,如同他在回忆录《见证中国》里面写的:“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除了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角色,也是由于爱泼斯坦对新闻工作的百倍热情和坚持,才让他的笔有如此锋芒,才会让他在报道中国革命事业的路上走得更远。

爱泼斯坦反复强调,一定要为读者着想。他谆谆教导年轻的记者:“报道第一应该准确;第二应该使读者喜欢

看。”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历。要有语言的新鲜感。要有积累深厚的基本功。这就是丰富的知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吸引力,有价值。

爱泼斯坦毕生从事新闻工作,非常勤奋,富于敬业精神。他主持《中国建设》的编辑业务,虽然十分繁忙,但依然经常外出采访,写了许多著作。为了写反映西藏变迁的书,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于1985年第四次访问了西藏。

可以说,爱泼斯坦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摘编自王永娟:“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要留在中国”,《解放日报》2015年9月23—27日。部分材料来自本书主编对爱泼斯坦的采访。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爱泼斯坦：投身中国对外宣传 事业的犹太人

爱泼斯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中一位重要的外籍专家。他早期就有在中国当记者的背景，具有创办刊物的丰富经验，凭借新闻工作者的特殊经历，加上长期在华生活，使他对本国国情有切身体验和实际了解，同时对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能准确把握，形成一套独特的宣传思想和恰当的办刊方针。他参与创办并先后担任执行编辑和总编辑的《中国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宣传战线的一份重要外文刊物，在较恶劣的国际形势下，冲破了西方国家的舆论封锁，为将新中国的真实形象向全世界广为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宣传”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增进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对外宣传极其重视，不仅在国内汇集大批人才，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其事，还委托新成立的国家外国专家局聘请经验丰富的外国专家来协助工作。爱泼斯坦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专家，在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上作出了很大贡献。¹新闻界对爱泼斯坦早有关注，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8年10月18日特意

¹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网页介绍 <http://www.safea.gov.cn/content.shtml?id=12748282>。

成立爱泼斯坦研究中心。¹他被誉为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开拓者之一，²并曾多次到西藏采访，向国际社会传播了中国对西藏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社会发展情况，³他在对外宣传方面的态度和方法给外宣工作者以深刻的启迪。⁴兹从史学研究角度，缕述其传奇生平和独特经历，并联系具体业绩来分析其宣传思想和办刊方针，以期有所借鉴。

早年生涯和媒体经验

爱泼斯坦是1915年4月出生于波兰华沙的犹太人。当时波兰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华沙是沙俄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拉扎尔和姑妈丽贝卡反对沙皇统治，有自己的革命组织“犹太劳动同盟”（简称“崩得”），属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姑妈后被德国纳粹杀害。⁵外祖父家庭富裕，但母亲也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犹太劳动同盟”。1917年父母携全家移居中国，1931年他到《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开始新闻工作生涯，3年后因阅读美国共产党出版的刊物被开除，主编对其评价是：“……爱泼斯坦的观点适宜于持自由主义或激进观点的报纸。”⁶期间他和埃德加·斯诺建立友谊，并为其早期著作《远东前线》⁷写书评。

1934年他作为流动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向国外出版物投稿。有一次在纽约出版的《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被翻译成法文转载在巴黎出版的《不妥协者》日报上。大意是：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战斗前进，没有像国民党报纸所说的那样被“击败”或“消灭”。这引起攻击，《民族》被批评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报刊”。斯诺在1935年4月1日写信给《民族》和《新共和》两个刊物，认为那篇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

1_ 贺潇潇：《爱泼斯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对外传播》2008年第11期；
方挚：《怀念爱泼斯坦——学习爱泼斯坦 研究爱泼斯坦——清华大学举行爱泼斯坦研究中心成立暨爱泼斯坦藏书捐赠仪式》，《国际人才交流》2008年第11期。

2_ 章之俊：《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莹：《爱泼斯坦的对外传播思想》，《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4期。

3_ 廖云路：《记者爱泼斯坦的涉藏新闻思想研究》，《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4_ 万智炯、陈芳：《“对历史负责”——求解爱泼斯坦》，《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林戈荪：《从四本书看爱泼斯坦写作的特点和风格》，《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12期。

5_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6_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61—63页。

最可靠的消息”，为爱泼斯坦辩护。这封信的抄件保存在堪萨斯的“斯诺纪念档案馆”。¹他还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那时国民党一再发布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将领死亡或被击毙的官方消息，针对这些不实报道，爱泼斯坦为这条新闻加了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²不久，报社通知不再需要他了。此时斯诺夫妇在天津创办刊物《民主》，爱泼斯坦为之积极撰稿，还应邀用笔名为美国共产党在上海办的刊物《中国呼声》写稿，通过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宋庆龄知道了爱泼斯坦这个人。³

1937年起，他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报道中国军民痛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如著名的台儿庄会战。1938年夏爱泼斯坦被调到广州，报道当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9月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难忘印象。3个月前宋庆龄在香港创立抗日救亡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谴责日本野蛮轰炸平民的行径，并邀请在广州的外国友人筹建“保盟”广州分会，⁴动员各国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爱泼斯坦参加了廖承志主持的“保盟”会议，但不到一个月广州沦陷，“保盟”分会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实际上没来得及做什么工作。⁵随后爱泼斯坦到香港，接受宋庆龄邀请参加保盟总会工作。“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不多但充满朝气，宋时年45岁，其他人只有30岁左右，最小的爱泼斯坦刚满23岁，将宋当作慈母看待。在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宋庆龄的威信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⁶

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在

1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66页。

2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69—70页。

3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72页。

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360页。

5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15、116页；《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3页。

6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20页。

1938年6月创刊，开始是一份油印简报，1939年4月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出版，最后一期出版于1941年11月，总计出版了36期（均为英文）。爱泼斯坦在1938年11月接手“保盟”的宣传工作，担任《“保盟”通讯》的编辑，尽管非常年轻，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新闻工作者”。¹他善于组织国际友人撰稿，以其在前方及敌后亲眼看见的经历，写出具体生动的报道文章，非常有说服力。²1940年春末他在香港的第一次居留结束，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编务。³刊物的最后一年还发行了中文版，在海外的华侨社区影响很大。《“保盟”通讯》虽然短小紧凑，却造成了广泛的效应。国外的友好组织机构以及个人都仔细阅读该刊，因为刊物“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起伏，并使他们团结奋起支援这场战争中的最活跃和最重要的战区，即敌后的游击战线”。⁴

同时，爱泼斯坦在《香港每日新闻》兼职。这是港岛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国民党购买了部分所有权，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效劳，在内部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它在业务上急需一个新的编辑。宋庆龄推荐他去应聘，得到负责人俞鸿钧的同意。⁵他上任后始终呼吁外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认为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变成战场以后，也仍然没有变成“次要问题”。他经常在晚上与香港《星岛日报》的编辑、进步人士金仲华通电话，所以这两家报纸的社论调门儿往往是一致的，共同抵制从日军占领区传出的一些歪曲中国局势的报道。⁶在廖承志组织下，爱泼斯坦接受周恩来委托的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这时他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后来写了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系列报道，这在该报是第一次。⁷

¹ 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何大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1页。

² 童之侠：《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第267页。

³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30页。

⁴ 爱泼斯坦：《为了国际友谊和了解》，本书编写组：《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⁵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23页。

⁶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26页。

⁷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29页。

此外，爱泼斯坦协助一些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如1938年初，美国海军陆战队埃文斯·卡尔逊上校经斯诺介绍给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把他带往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卡尔逊形成进步的、反法西斯的观点，主张同中国的新兴力量建立友好关系。¹1939年，德国的米勒医生在廖承志、爱泼斯坦安排下到达延安，很快与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挺进敌后。²爱泼斯坦自己于1940年赴重庆，在官方的国际宣传处下属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皖南事变后回到香港，任《南华早报》编辑，不久港岛陷落被囚禁在平民集中营，他与妻子邱茉莉等人趁隙逃出，经澳门至桂林转赴重庆。1942年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成立，仍选宋庆龄为主席，爱泼斯坦和邱茉莉都是中央委员，³并编写保盟的英文工作报告发到纽约印刷。

1944年，爱泼斯坦以《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与另外几个外国记者一起访问陕北。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撰写《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刊于印度《政治家日报》，并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延安之行的20多篇报道，最后著成《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与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等相继出版，向全世界报道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裂口。⁴在访问延安后，爱泼斯坦离开了中国。

¹ 爱泼斯坦，《回忆埃德加·斯诺》，《光明日报》1982年2月14日。

² 董强：《来自莱茵河畔的共产主义战士》，《解放日报》1987年3月7日，第2版。

³ 周成梁：《关于保卫中国同盟领成员的考证》，《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9年第1期，第7—8页。

⁴ 王明湘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在美援华工作和再次返华效力

1946年爱泼斯坦夫妇到达美国，帮助“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开展工作。这是一个新的组织，其成员是反对美国

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他以记者身份，将宋庆龄促使人们注意中国内战危险的《致美国工人运动书》转给美国的工会报纸，工会的许多报纸都予以刊登，在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而获得医药和其他救济物品的工作中，宋庆龄终于得到像约翰·谢伟思这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美国外交官们和驻华美军司令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支持。¹爱泼斯坦还加入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和曾在“保盟”上海分会工作的耿丽淑一起帮助中国。

然而形势突变，援华会停止供给并公开进行反共宣传，于是他们决然退出，打算另组一个新的机构继续支援中国。12月，中国福利呼吁会(China Welfare Appeal)在纽约成立，耿丽淑任董事会主席。在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设立工作委员会，华盛顿、彼得梅尔等城市中的赞成者也举行会议，最终成功输送了四批“友谊物资”到中国。中国福利呼吁会“要求美国人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以及其他各种服务项目方面对中国人民给予帮助。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它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事务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向中国人民表示友好，则是一切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美国人的事情”。²宋庆龄对此感到很兴奋，“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不用到国外去筹款，而是坐等钱从天上掉下来”。³借助呼吁会及其他友好渠道，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及战后新中国的救济做出巨大努力。中国福利呼吁会“是友谊之船，在两国关系出现敌对状态、航道都已冰封的年代，从来没有停航过”。⁴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呼吁会的努力，减弱了美国旧有的及新设立的救济机构对新生中国的嘲笑谩骂。

不久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爱泼斯坦夫妇也深受其害，决定返回中国。恰巧中国1950年底向联合国派了一个代表

¹ 爱泼斯坦：《回忆在重庆作记者的岁月》，本书编写组：《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第295页。

² 宋庆龄著，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³ 《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⁴ 肖岗：《耿丽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团，他把自己的想法通过乔冠华转告。此时宋庆龄正筹划创办一份英文刊物，遂邀其来华相助，1951年3月初他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绕道波兰赴北京。¹当年夏天爱泼斯坦重返中国后，以其对中国和世界的熟识及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理所当然地开始发挥对外宣传专家的作用。初期，他为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改稿，担任其顾问。《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开始排版时，爱泼斯坦和邱茉莉都参与创办，开始条件很艰苦，在北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不得不到公园里找个地方讨论工作。²12月17日，《中国建设》第1期终于印刷出来，“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大大超过《人民中国》”。³宋庆龄在审阅完样刊后，指示金仲华再加印第一期杂志，在更广的范围内听取意见，然后对杂志作些改进。并要求金把她的意见传达给爱泼斯坦和杂志社的其他成员。⁴

1952年《中国建设》正式创刊，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塑造这个刊物的性格形象，使之能为西方国家读者所接受和爱读，从而获得对中国的正确认识。为了赶急稿，他常常“度过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⁵7月，宋庆龄致函爱泼斯坦，建议《中国建设》下一期刊登报道大规模卫生运动的文章，并公布由周恩来下达的新的医疗工作指示，把它同劳动保险法联系起来，以显示千百万人正在实际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及其发展方向。⁶8月8日，根据新的组织规程，中国建设社做出人事调整，编辑委员会照旧，编辑部主任陈翰笙，执行编辑艾培（即爱泼斯坦——笔者注）。⁷其办刊与国家大政外交是紧密相连的，当他发现对外宣传工作存在什么带方向性的问题，

¹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257—258页。

² 张彦：《爱泼斯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³ 《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89页。

⁴ 宋庆龄致金仲华的信，《金仲华纪念文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1期（总第84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年版，第107页。

⁵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274页。

⁶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⁷ 《中福会关于派奚甲德同志赴京工作杨逸同志代理文化工作处副处长职务的通知》，上海市档案馆C45-1-76。

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批评和建议。¹

《中国建设》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赢得众多读者的赞誉，经常刊登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精美图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从一开始，杂志社就十分重视图片工作，特别是彩色封面、封底和画页。为此，成立了“彩色委员会”专司其事，由执行编辑兼顾问爱泼斯坦负责，²每张版面图片都要经过委员会的精心筹划和认真选择。这个优良的传统，至今依然保持。另外一大特色是：和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努力听取他们的意见。每期刊物，都必附加一张“征求意见表”，反馈回来的讯息都必须认真处理。与读者的通联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由陈翰笙和邱茉莉共同负责。每封来信必复，有时是陈翰笙口授、由邱茉莉打字作复。一些有特殊内容的信，往往要在编辑部会议上宣读，作为考虑选题的重要参考。³

投身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

《中国建设》初创时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国际局势，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仍在对新中国进行各种封锁。但在杂志社同仁的齐心协力下，爱泼斯坦说，“我们还是建立了联系，帮助改变了这种敌对的形象。”⁴ 1952年底，发行范围达到118个国家，销数最多的是印度、美国、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⁵ 1956年，杂志共出版623 000册，中近东地区的发行打破空白，有了发展。⁶ 1957年上半年，《中国建设》共出版359 000册，其中6月销售55 773册，较去年底增加了14%，开辟了泰国、希腊、新几内亚等国的销路。⁷ 在宣传效果方面，《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1957年出齐12期，共741 500

1. 张彦：《爱泼斯坦》，第40页。

2. 《中国福利会中国建设社1954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C45-2-91。

3. 张彦：《陈翰笙与〈中国建设〉》，张培年、陆国俊：《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4. 张彦：《爱泼斯坦》，第46页。

5. 《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文化馆、图书馆、保健院、中建社等单位情况概述和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C45-2-50。

6. 《中国福利会1956年工作概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C45-1-132。

7. 《中国福利会1957年上半年度工作概况》，上海市档案馆C45-1-145。

册，销数达到96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最高的是印度，19 254本，其次是印度尼西亚，7 263本，澳大利亚，4 926本，英国，3 914本，以色列，3 648本。此外，1957年下半年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希腊、毛里求斯岛、斐济岛等地。¹

杂志创办过程中也出现过各种问题。有一次，爱泼斯坦看到《中国建设》上一篇介绍陕西风俗民情的文章，居然只字未提陕北曾经是革命根据地，更没有说明今天的风俗民情与当年的革命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很有意见，认为，“我们应当适当交待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什问题了”。“假如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就可以坦率地说明拖我们后腿的缺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加以回避或辩解”。²爱泼斯坦本人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和专业的文字，揭示出如何进行对外宣传。

如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多于金门、这两个岛屿像其他岛屿一样，都是毋庸争辩地属于中国的。如果在任何程度上忽视这个事实，那就是有意或无意地支持美国对中国领土所进行的酝酿战争的侵略。”从引述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12月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声明着手，逐步分析美国蓄意挑衅的实际阴谋，将蒋介石形容为“被唾弃的政治僵尸”，强调台湾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并警告美国说，“权利不是靠空口维持的，这也是很清楚的。这种权利有社会主义威力的支持和各国人民的同情。”³数年后当他访问美国时，他看到了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这些人不是把他们自己和新中国划分开来，而是很想显示他们和新中国之间的某些联系。”⁴而这种转变的发生，与中国积极的对外宣传是有很大关系的。

¹ 《中国福利会下属单位1957年工作报告及1958年工作计划》，上海市档案馆C45-2 160。

² 张彦：《爱泼斯坦》，第12—13页。

³ 爱泼斯坦：《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英国《劳工月刊》1958年第10期。转引自《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信息不详，第221—227页。

⁴ 爱泼斯坦：《中国对外宣传与美国社会》，外文局《编译参考》1978年第3期。转引自《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第342页。

在西藏问题上，爱泼斯坦行经新修的、长达1 400英里的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由衷地感慨说，“它是中国人民用刚刚觉醒的力量建成的，它的建成是勇气和历史进步的标志。西藏地区的前途和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¹翻身的农奴和奴隶成长起来，担任乡级以上藏族干部的有16 000人，村级的有20 000人。他们遍布在地方政府、党的机构、群众组织、公安保卫，以及经济、教育、卫生等部门之中。这支藏族干部队伍的出现，“标志着自治区内阶级权力的根本转移”。²他还采访了藏族人民拉珠一家，拉珠对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别说你看不到我们家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全家这些人里面，恐怕多数早已饿死或者被打死了。”当时的西藏，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严肃的现实。所以他们全家都积极发展生产，投身西藏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³

爱泼斯坦用开滦煤矿的历史和现实，将新旧政府进行对比，认为：“没有一个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政府——不管他们自称君主、共和或‘民族主义者’，具备意志和能力去抵抗帝国主义的掠夺。能够收回国家资源者只有站在全体人民最前列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⁴他以广州的发展为例，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看到，作为中国的一个对外贸易中心，广州再也不是1949年前黑暗的一百年里那个殖民地港口，任凭帝国主义把中国的财富运出广州，又把本国的工业品大量运进，从而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如今，广州是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博览会所在地。在这里，“贸易是按照平等和互利的原则进行的”。⁵他参加了1965年春季广交会，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国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不断扩大了对外贸易交往以及好客的传统美德。并从

¹ 爱泼斯坦：《沿康藏公路去拉萨》，《中国建设》1956年第1期。

² 爱泼斯坦：《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在斗争中成长》，《中国建设》1965年第12期。

³ 爱泼斯坦：《拉珠一家》，《中国建设》1965年第11期。

⁴ 爱泼斯坦：《开滦煤矿——从帝国主义的领地到人民的企业》，《中国建设》1963年第2期。

⁵ 爱泼斯坦：《重访广州》，《中国建设》1961年第7期。

纺织业革命化、自力更生的机械、化工产品的突破、农业和畜牧业产品、金属和矿产、轻工业：品种和质量、贸易与友谊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这些向来访者证明中国坚信帝国主义侵略定会失败，各国之间的友谊，包括互补贸易，定会越过所有障碍而取得成功。”¹

在创刊5周年时，《中国建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开始驰名于世界。²自1960年起，杂志除英文版外，陆续增出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1978年停刊）、德文版、葡萄牙文版（1963年底停刊）和中文版。并与中宣部合作，发行杂志的盲文英文版，好让新中国的信息及时传达到海外盲人世界。³《中国建设》的七种文版的主要文章都是一样的，只在其他报道和特写（约占整个篇幅的20%）上有所变动，是多样化的。⁴这样，其读者面更广、影响力更大。随着时代发展，为适应新的形势，杂志改名为《今日中国》。它是整个保卫世界和平工作的一部分，“非但击碎了帝国主义分子对和平民主阵营的诽谤谎言，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人民从中国人民胜利的实例中看到自己国家的前途，加强了斗争的信心”。⁵在此过程中，爱泼斯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¹ 爱泼斯坦：《记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建设》1965年第8期。

² 详见徐锋华：《〈中国建设〉的创办与建国初期的对外宣传》，《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³ 张彦：《陈翰笙与〈中国建设〉》，张植年、陆同俊：《陈翰笙百岁华诞集》，第118页。

⁴ 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中国福利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10页。

⁵ 《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文化馆、图书馆、保健院、中建社等单位情况概述和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C45-2-50。

外宣思想和办刊方针

“对外宣传”成为时尚，与二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密切相关。在二战后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的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就更加尖锐。对于在东方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更加虎视眈眈，恨不得把它掐死在摇篮里。而且，中外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伦理、心理、生活等各个

领域中的差异，更不要说显而易见的语言文字上的隔阂。

因此，如何帮助外国人正确认识新中国，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十分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务。

爱泼斯坦对对外宣传的实质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读者是外国人，他们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习惯不同、经历不同。我们有的同志觉得外国读者不可捉摸，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外国人。这是相对的。关键是，我们要设身处地替外国读者着想，下决心使我们的报道能使外国读者明了。要明确一点，我们写东西是给外国读者看的，不是为了给发稿人（指签发稿子的领导人）看的。我们要真正做到有一支好的箭去射靶，就要编辑、记者写稿时脑子里有读者观念，而不是为了取悦于发稿人，以便于稿子通过。”¹

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他逐渐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和办刊方针。“替外国读者着想”“宣传必须要有针对性”，因为没有针对性就谈不上宣传效果，甚至会成为“对牛弹琴”。“针对性就是有的放矢……我们千万不能忽略针对性。如果忘记了宣传对象，这些宣传工具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和取得应有的效果，甚至完全没有效果。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去了解读者。我们要看外国的出版物，要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人们在不同时期想些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要了解他们怎样看中国。要知道，我们的宣传是在和读者对话、交流思想，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书刊宣传方针的决策人，必须要有读者观念，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投外国读者所好、迁就他们的观点。爱泼斯坦一貫强调，我们的对外宣传不是鼓动，而是解释，但要解释我们的

¹ 张彦：《爱泼斯坦》，第42页。

立场观点，说明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不应该躲躲闪闪。¹

同时，他指出，要紧的是，“不是像老师那样进行说教，而是像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他认为，“在对话中，我们应该谦虚、不应吹嘘，但对我们国家的成就却用不着去贬低。然而，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掩盖我们存在的缺点。有人怕说了中国还存在贪污腐化现象会影响国家的形象。其实大可不必有此顾虑。如果这是事实，就不必怕说出来，只要说明我们是怎样对待这种落后现象的，这就不仅不会损害、反而会有助于树立我们国家的优良形象。我们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掩盖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应过分担心形象问题。20世纪50年代，我们枪决了两名贪污犯。枪决人是粗暴的，但并没有损害我们的形象。相反，人们说，中国人在认真消灭贪污。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绕开问题不谈。我不是说，我们要强调夸大我们的缺点。但绕开问题，最终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²

关于西藏的宗教问题，爱泼斯坦说，“迷信观念在西藏，从来没有像我们文章所说的那样根除过。但也不是所有的西藏人都相信喇嘛教，尽管喇嘛教是他们的民族宗教。例如，我认识许多藏族共产党员——毕竟西藏已经解放了40多年了——他们是不相信喇嘛教的，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家里也许有神龛，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或妻子相信喇嘛教，也可能他们自己也有点信，但没有什么95%或100%的绝对数字。”他强调指出：“说话绝对化不恰当。应该给自己留点回旋余地。话说绝了往往自己否定自己。政策可能是策略性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种策略性。但事实不是策略性的，事实就是事实。”³

¹ 张彦：《爱泼斯坦》，第42—43页。

² 张彦：《爱泼斯坦》，第43页。

³ 张彦：《爱泼斯坦》，第43—44页。

在报道方式上，他提倡多样性，搞“百花齐放”。原则

立场上，应该是坚定的，但在说法上不能搞成模式，在写作技巧上不搞固定的模式。“事情往往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个人使用了新的写法，开始是比较新鲜的，人们都说写得好。如果一大批人都按这个模式去写，原来是新鲜的东西就变成人们不想看的东西了，成了新的公式化。在新闻写作上，千万不要公式化。”正因为此，爱泼斯坦和编辑部主任陈翰笙有时会产生分歧，据陈回忆，“杂志草创，要保证质量，因此几乎每篇稿子我都看。爱泼斯坦也看稿、写稿。我们两个人常常因不同看法争论不休，我说他是记者风格，他说我是学者风格”。¹

爱泼斯坦认为，对外宣传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如何宣传优越性，而在于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其优越性。再说，有些事情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办到的，但也有一些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可以办到的。如公共教育事业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办了。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既大又穷的国家，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行的！这是事实。事实是第一位的，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至于应该宣传多少好事和多少坏事，这要看实际情况而不能由我们的宣传意图来决定。”²

结语

在延安访问时，爱泼斯坦就对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其间，经他帮忙，新华社完成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从延安的窑洞通过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除了公开的记者招待会外，毛泽东还与他有一次单独谈话。周恩来1944年7月15日特意函告毛泽东：爱泼斯坦今日来谈，除答他所提的问题外，还有保卫中国大

¹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² 爱泼斯坦：《对外宣传要多替读者着想》，《对外传播》1997年第4期。

同盟的援助，也请你向他提几句，并托他致谢孙夫人及“中保”所有同人。如你能答应写一信给孙夫人托他带去，那就更好。他向毛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并就“保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毛的意见，随后由马海德大夫开列所需物资药品的清单交给他带回去。²

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参与《中国建设》的创办工作，还先后担任杂志社的执行编辑、总编辑，几十年来，呕心沥血，辛勤工作，为对外宣传战线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对年轻的编辑和记者们，爱泼斯坦经常告诫他们两句话：“不要过高估计了你的读者对中国了解的信息量。同样，不要过低估计了你的读者辨别事物的智力水平。”³他堪称以传播中国为己任的特别中国公民，并在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自重返中国以来，他实际上为不断改进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发挥着一个“高级顾问”的作用，如应邀参加许多重要文件英译稿的定稿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成为在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⁴

爱泼斯坦之所以能与中国结下如此深厚的感情，并在对外宣传工作上作出独特贡献，除了他犹太家庭出身的特殊遭遇和早年的记者生涯外，还与宋庆龄有很大关系。无论是1938年邀请他参加保盟，还是在他从日军集中营逃出后立即归队，以及他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想返回中国，宋庆龄都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因此，当中国福利会（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一脉相承）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时，他致函宋庆龄，“我们应该庆贺另一个20周年——自从我在广州第一次遇见你，差不多有20年了，在很

1.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张扬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爱泼斯坦：《见闻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206页。

3. 张晋：《爱泼斯坦》，第45页。

4. 张晋：《爱泼斯坦》，第12页。

多方面，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¹他还是保盟历史的最后一位见证人，直到2005年去世。爱泼斯坦热爱宣传事业，更热爱中国，他是外国友好人士、外籍专家的一个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与马海德、路易·艾黎、耿丽淑等一样，由于在革命时期有着长期精诚合作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他们有着充分的信任，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待遇，使他们能安心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所长。

作为国内外著名记者和作家，爱泼斯坦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文章和专著，主要有：《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还有以英文出版的《西藏的转变》（新世界出版社，1983年版），这些作品，包括《中国建设》杂志等在内，都如实地见证了爱泼斯坦在当代中国对外宣传上的杰出贡献。

（本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锋华撰写，重点研究爱泼斯坦在当代中国对外宣传方面的贡献，弥补了前文的不足。文中关于爱泼斯坦早期生涯的内容与前文略有重复之处，但编者没有删节，以保持全文的完整性。编者对标题和文字作了若干调整。）

¹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八宝山墓碑上的奥地利友人严斐德

每当想起新中国的诞生，我就情不自禁怀念那些为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友人们，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兼记者严斐德，就是其中的一个。1955年4月11日，他作为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的特派记者，经香港乘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度尼西亚采访万隆会议途中，遭敌人安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丧生。这就是有名的以周恩来为目标的国际谋杀事件。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高耸的纪念“四·一”事件烈士碑上，还刻着国际主义战士严斐德的名字，为世人所敬仰。

投身奥地利革命运动 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

“严斐德”并非他的本名，而是他来华以后才取的十分典雅的中文名字，他的原名是Fritz Jensen（弗里茨·严森）。他1903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一生虽然只活了50多岁，却充满着传奇的经历。他自幼好学，乐于助人，喜欢体育，擅长拳术。他成长的时代，正赶上俄国十月革命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情况复杂，生活困难。他很早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活跃在祖国的反法西斯群众斗争中。一次，他正在发表反对战争的演讲，

警察要逮捕他，他从讲坛上娴熟地纵身远跳，把自己埋没在群众之中，逃离了现场。1934年春，他被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出狱后，他以行医为生。然而，1936年，西班牙爆发举世闻名的内战时，人们发现，严斐德已经不在维也纳了，而在马德里成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的一名医生，当时，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佛朗哥法西斯军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志士都纷纷志愿前往支援，组成了闻名遐迩的“国际纵队”。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就是这支志愿军中的一名医生。

当西班牙共和政府1939年失败以后，这些人的一部分又转移到远东战线，继续向当时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其中就有严斐德医生。他们在香港受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热情接待，被当地报纸称作“西班牙医生”。于是，“西班牙医生”就这样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西班牙人。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和需要，宋庆龄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介绍去解放区，而是安排他们到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

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严斐德就和中国人以及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既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又跨过封锁线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国统区里，民生凋敝，物资匮乏，而且吏治腐败，这些外国医生开展救死扶伤的工作极其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严斐德这些“西班牙医生”的反法西斯斗志，他们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总是和中国人员一样，住茅草房，睡竹板床，吃糙米饭，遇到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就靠



严斐德(右)与夫人、孩子在一起

两脚步行。救护总队的药品和医疗器具都是依靠国际和爱国华侨捐赠的，但并不能满足需要，许多还需要自己制作解决，医护人员也需要就地培训。最使他们头疼的是，国民党士兵的给养常常被当官的克扣，士兵营养不足，军中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尽管如此，这些国际友人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和中国医务人员并肩战斗。他们中的共产党员自己编成小组，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并要求到解放区工作。周恩来对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他们解释在国民党战区工作也是为反法西斯服务的道理，希望他们在红十字救护总队继续安心工作。他们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直到胜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战胜利以后，严斐德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务的专员，对惨遭战争蹂躏的中国民众进行救济。为了能够公平地将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分发给真正需要的地方，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亲自到华中解放区作实地考察，曾经两度到过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在淮阴的欢迎会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等领导同志都发表热情的讲话表示感谢。严斐德却说：“那些未被侵略的国家应该感谢被侵略的国家，因为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认为，救济总署不仅是来做好事的，“他们是来报答恩惠的，好似还债一样来救济受灾的国家。”到淮阴的第二天，虽是大年初一，严斐德不顾疲劳，跃身上马，立即下去考察。在医院里，他看了病房、病人、医疗器具，并和医务人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在村庄里，他挨家挨户探望，倾听他们诉说长期以来的辛酸苦难。经过这次认真的

考察，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向救济总署汇报了华中解放区受灾的严重情况，极力主张以最快速度运去救济物资。事实上，除了发放救济物资以外，他还为边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协助淮阴地方建立了医院，并且及时防治了在当地为害十分严重的黑热病。

中国在他心中

我和严斐德1946年相识于上海，那时他刚从淮阴回来不久，正在紧张地落实向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事宜。5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解放区见闻的情景，抑制不住那种兴奋之情。他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使我认识自己走过的历史和前进的方向。”我问他：此话怎讲？他回答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封建旧中国，我上了直观教学的课程，看到了自己国家的过去；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新民主主义的领土上，我见到了我们自己未来的人民。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尽管尚未摆脱贫物质的贫困，却具有如此高度的政治觉悟。”在给我述说他的见闻时，他对一个个人物都描绘得活灵活现，观察极其深刻。说到那“受尽压榨和践踏的中国人”时，他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1947年，他回到了久别的奥地利。但是，他不再行医，而是拿起他那生花之笔在奥地利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之声报》担任编辑。1950年，他出版了《中国胜利了》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他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高的评价。1952年底，以宋庆龄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于是，我和严斐德又重聚了。我终生难忘，他

热情地开着他的“甲壳虫”的小汽车带我好好地看了看维也纳,请我在一家最具有地方特色的饭馆美餐了一顿。我发现,在开大会的这几天,这个奥地利人几乎把他全部的时间都献给了中国代表团,为它服务。他见到中国代表团的人,就像见了娘家来的人一样亲切。1953年,他被报社派往中国担任常驻记者,同时兼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记者,还在外文出版社担任德文专家。这个时期,严斐德如鱼得水,兴致勃勃,足迹遍及新中国各地,还去了朝鲜和越南,发表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和诗篇,并出版了一本《越南见闻》。

最后的旅程

严斐德的最后一本著作《牺牲者与胜利者》,是他自己未能看到它出版的诗文选集。为本书作《前言》的,是奥共中央委员恩斯特·费舍尔。他这样写道(以下系根据仁怡的译文):“弗里茨·严森既具有澎湃的激情,又具有高度的觉悟;既对生活充满情趣、时时关注生活中的紧张与风险、希望与惊异,又不断坚定决心和意愿,将个人的宝贵生命献给自己从事的伟大事业。对他而言,生命并非一种需要精心保护的私人财产,而是一个同各国人民息息相关、并继续面向世界的风暴与光明、希望与要求的战斗集体的组成部分。他以诗人的目光观察着半个世纪以来欧亚两个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他是医生和战士,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组织工作者和作家,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始终对新鲜事物、对未来、对陌生事物投以热切的追求,对他所献身的使命,对他所赢得的朋友,以及对同他保持联系的同志,怀着无限的忠诚……他的生命像一首铿锵有力和美妙的歌,一

首来自人民、又继续在人民中吟咏的歌。”

费舍尔给弗里茨·严森画的肖像，和我心目中的严斐德是完全一致的。1955年4月，我们两人都要去采访亚非国家第一次自己召开的万隆会议。临去香港前夕，他在电话上和我谈了足足半个小时，句句都洋溢着他对这个“划时代新事物”的无限热情。他最后和我相约：“万隆见！”至今，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

（摘编自张彦：“八宝山墓碑上的外国人——忆医生、诗人、记者、烈士严斐德”，《百年潮》2000年第7期中国之友专栏。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波兰白求恩：国际主义战士 傅拉都

白求恩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傅拉都这个名字却不太为人所知。实际上，他们两人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医生，都参加了1936—1939年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此后又都来华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同的是，白求恩在中国战场上以身殉职，而傅拉都却一直战斗到了抗战胜利，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又来华工作。

2016年6月在访问波兰前夕，习近平主席在波兰媒体发表《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一文，其中特别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

从西班牙到中国

斯坦尼斯瓦夫·傅拉都（犹太名是塞缪尔·莫伊泽·傅拉都），1910年6月出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傅拉都是他的中文名字。1929年考入华沙大学法律系，不久赴法国巴黎大学学医，在那里加入了犹太大学生左派组织——“斗争”，后又参加了波兰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傅拉都毅然参加了由各国共产党



傅拉都

员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援助共和民主力量。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于1939年3月率领一支纵队撤退到法国。

在挪威救援中国与西班牙委员会安排下，1939年8月，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他们是：波兰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医生柯理格，苏联医生何乐经，匈牙利医生沈恩，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值得一提的是，白求恩大夫也是在这前后从西班牙来到中国的。傅拉都医疗队于9月13日到达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宋庆龄的迎接。随后，在保盟的安排下，他们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于10月16日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傅拉都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顾问，担任卫生勤务指导员，后又受聘为691医疗队队长，率队奔赴湖南、湖北战场，积极救护伤病员。在湖南湘阴，傅拉都还举办了一个军医训练班，培养了诸多中国学员。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友情谊

傅拉都医疗队中多数人是共产党员，因此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根据地工作。为此，傅拉都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人面谈过数次。1940年夏，傅拉都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周恩来向他们解释道，只要在抗日战线工作，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傅拉都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去重庆，还认识了董必武、邓颖超、王炳南等人，并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董必武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后，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也笑

称，我与中国神医同名。

傅拉都与王炳南有一段生死之交。据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回忆：“父亲在中国工作，很快能说流利的中国话。有一次，父亲听到国民党特务密谋逮捕王炳南，那些人不知道他能听懂。父亲以最快速度将此事告诉周恩来。周恩来请父亲帮忙，父亲随后用救护总队的车，帮助王炳南成功逃脱。”当时，傅拉都身穿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制服，又有外国医生的特殊身份，持有来往各地的护照，利用救护总队的汽车将王炳南安全地护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对傅拉都表示感谢，并决定将王炳南的身份公开，任命他为八路军办事处上校秘书。

战斗在印缅战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亚洲实行“远东战略计划”。按此计划，英美联军进入缅甸、印度作战，中国则派出远征军，与英美军夹击日军，打通滇缅公路。不久，救护总队抽调人员组成三个医疗队，于1942年3月20日从贵阳出发赴缅。1943年11月20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致函中国军方：请派在华中国红十字会外援志愿医师八人至十人至印度兰姆伽医院服务。经救护总队确定，傅拉都与罗马尼亚医生杨周，波兰医生陶维德，德国医生贝尔、顾泰尔、孟乐克，奥地利医生富华德，捷克医生柯理格、纪瑞德，苏联医生何乐经共十人组成医疗队，首批派往印度，领队就是傅拉都，现存档案中的许多汇报材料都是傅拉都亲手写的。医疗队于当年12月31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此后在印度、缅甸前线工作一年零八个月，直到日本投降。他们先在兰姆

伽医院工作，后到训练营里担任教官，负责培养中国军队医护人员。1944年，一批中国军人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印度，在印度东北边境及缅甸北部与日军殊死战斗，采取分散作战办法，以营、连为单位各自为战。傅拉都等外籍医生被直接派往作战单位服务，冒着敌人炮火，把伤员送到野战医院治疗，并且还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作为中国军队与美国医疗队之间的“联络医生”。

战后的曲折经历

抗战结束后不久，傅拉都从兰州乘飞机经苏联回到祖国波兰。

20世纪50年代初东欧一些国家出现肃反扩大化的现象，傅拉都也受到审查，被关进了监狱。这次，曾经奋不顾身援助中国的傅拉都却得到了中国的救助。克里斯蒂娜回忆道：“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波兰访问，向波兰领导人提出要看望老朋友傅拉都。于是，父亲立即被释放，搬进波兰总统府附近一所高级住宅。”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他发现，年富力强的傅拉都竟然处于“被冻结”状态，闲散在家。波方称是因为傅拉都历史问题没有审查清楚。王炳南细问之下，才知道是指抗战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经历。波兰有人问，为什么他替国民党政府工作？王炳南立即向波兰共产党中央提供了傅拉都在中国的相关材料，冤案才得以澄清。傅拉都经历狱中磨难，身体每况愈下。他从事医学研究，在血清研究方面取得成果，但受邀去美国做学术交流时被波兰政府拦下。傅拉都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医学研究。

经中国政府与波方商议，1957年，傅拉都出任波兰驻华

使馆公使衔参赞，带着妻子儿女重返曾经战斗过的中国，其后在中国工作七年，走遍了中国各地，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友谊进一步加深。1959年他参加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的一系列庆典活动，回想起20年前在中国度过的艰苦岁月，目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有一次出差路过株洲、衡阳，他坐在火车上目不转睛地向窗外眺望，激动地对中国翻译说：“你知道吗？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几乎都有我的足迹。”

1964年，傅拉都回到波兰，在外交部担任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司长。在中苏争吵逐渐影响中波关系的情况下，傅拉都极尽所能维护中波关系。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六日战争”，苏联、东欧各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急剧恶化，波兰也出现了反以、反犹情绪，身为犹太人的傅拉都被视为有“亲以”嫌疑而遭到解职。1972年8月2日，傅拉都因患癌症辞世。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傅拉都。

1996年10月9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会”。傅拉都的战友甘扬道医生和克鲁格医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高度赞扬了国际纵队中包括傅拉都在内的22位医生离开西班牙后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义举。

2001年，傅拉都的好友、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在为笔者主编的《犹太人在中国》画册所写的序言中专门提道：“一批曾参加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医生后来也来到了中国，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他们总共约20多人，都来自中欧和东欧，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包括领队斯坦尼斯瓦夫·傅拉都医生。”

2015年9月，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与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的其他后裔应邀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并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2016年11月22日，“纪念西班牙国际纵队成立80周年：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傅拉都医生”学术报告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国际知名制片人杰瑞·卡尔森正在筹拍两部关于傅拉都的电影：一部是纪录片，将分别赴波兰、法国、西班牙、中国、印度、美国采访当年与傅拉都并肩工作过的战友及其后代；另一部是故事片，拟在纪录片的基础上撰写剧本并邀请国际导演及演职人员共同参与。

在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中，矗立着刻有22位国际医疗队队员姓名的纪念碑，傅拉都的名字也在其中。他们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摘自潘光：“波兰白求恩：国际主义战士傅拉都”，《世界知识》2017年3期)

犹太难民中的著名画家白绿黑

戴维·路德维希·布洛赫 (David Ludwig Bloch, 根据上海话发音起中文名“白绿黑”), 1910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弗洛斯的犹太家庭。他出生不久, 就父母双亡, 靠祖母抚养, 牙牙学语时又不幸耳聋, 后入慕尼黑聋童学校。他15岁进美术瓷器厂当学徒, 从此专心致志于五色斑斓的美术天地中。24岁时因成绩优异而获得美术奖学金, 得以进入州立实用美术学院习艺。1938年11月9日, 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大搞打砸抢烧杀的“碎玻璃之夜”发生。此后不久, 身为犹太人的布洛赫便被学院开除, 并关入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 囚号编为21096。幸而, 经在美国的堂叔疏通得以获释, 但德国已不能滞留, 便来到上海避难。

在上海进行美术创作

白绿黑是在1940年5月到达上海的。可能是由于他在上海有亲友照顾、接济的缘故, 当时并不像绝大多数德、奥犹太难民那样, 被安置在救济机构设立的收容所里, 而是住在赵主教路近海格路(今华山路)的一条新式里弄内。这一地区清幽闲静, 是个较好的住宅区。白绿黑劫后余生, 安心从事他热爱的美术, 并以此谋生。然而好景不长, 仅过了短暂的舒心日子, 就被占领租界的日本当局圈禁在提篮桥地

区的“犹太隔离区”，非经日本管理机构发给通行证，不得擅自出入。

德奥犹太难民从1938年下半年起陆续到达上海后，虹口的塘山路（今唐山路）、公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汇山路（今霍山路）一带开始改观，在废墟上出现了许多简陋的新屋，同时商店、餐馆、露天咖啡馆、小吃店、酒吧等也陆续开设，人称这里为“小维也纳”。舟山路则是这一地区的商业中心。白绿黑搬入隔离区后，住在长阳路24弄，离“小维也纳”仅一步之遥，经常徜徉其间。他的一幅速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小维也纳”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画面上依稀是舟山路长阳路一带的街景，有五家挂着德语招牌的店铺，隔着橱窗可以看到里面顾客的活动；外面有黄包车夫、有挑担者，一派华人和犹太人混杂而居的景象，栩栩如生。

白绿黑擅长木刻，细致绵密，一丝不苟。他有一幅著名的描绘犹太难民被圈入隔离区后申请通行证的版画：天下着雨，望不到首尾的难民长龙队伍，有些人撑着伞，更多的人听任雨淋，在发放通行证的“上海无国籍避难民处理事务所”门外焦急地等候着，期待能领到通行证，以便外出隔离区去办事或谋生。这是他们在日军占领上海时苦难生活的生动写照。

版画集《黄包车》

白绿黑最著名的作品是《黄包车》画册。册子中一幅幅的画页，展示出黄包车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些黄包车或载人，或运货，或既载人又运货，或派了人们意料不到的特殊用途。哪怕当年久居上海租界，但生活在住宅区和商业区的人们，恐怕也很少会见到画册



白绿黑(右)与夫人

中的许多景象，例如，小户人家搬家的一幅，不单搬家的人坐在车上，他的一家一当，不仅床架椅凳，连同圆台面，一同都在车上。再如西瓜贩子运瓜一幅，贩子坐在车上，一担西瓜放在踏脚板上，另一担西瓜荡在车后，由他用扁担挑在肩上。其他如俗称“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手持警棍驱赶，黄包车夫四散奔逃的画面；又如安南巡捕仗势抢去黄包车上的坐垫，高高放在街心交通岗亭的顶上，硬逼车夫缴纳罚款去赎回的画面。这两幅画描绘了租界当局雇佣的鹰犬肆意欺凌、敲诈黄包车夫，是当时市民司空见惯的丑恶现象。再如美国水兵搂着俗称的“吉普女郎”，两人挤坐一车，车夫不胜重载，勉力奔走的画面。再有在冬夜的寒风里，车夫坐在踏脚板上，默默地等候酒吧间打烊，等纸醉金迷的顾客酒醉饭饱出来，做上一笔生意。更有一幅画是人们见所未见的。

一辆抛了锚的卡车，雇了6个黄包车夫帮他推车，其中4人把自己的车子摆在卡车上，好腾出双手来推动卡车。另外2个车夫因为卡车上而已放不下自己的车子，只得分别站在推车队伍的左右两侧，一手挽着自己的黄包车的车杆，一手协力推动卡车。这样浩浩荡荡的场面，画家如若不是身历其境，亲眼所见，恐怕是想象不出来的。

版画集《黄包车》是由太平书局在1942年12月上旬印行的，恰好赶在画家举行油画和版画展览之前几天。为《黄包车》的各幅版画作过简短文字说明的草野心平，是日本诗人。1921年来中国，在广东的岭南大学就读。1940年再度来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从事文艺创作和研究，是日本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之一，曾多次访华。德国文学翻译家、以译歌德、席勒、海涅诗作蜚声于世的钱春绮，在当年看过白绿黑的画展，也买到过《黄包车》画册，颇为欣赏。

在1942年12月举行的白绿黑个人画展上，除了版画以外，还有白绿黑的50幅油画和水彩画，其中不少是在上海创作的，如外滩、徐家汇以及广东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的街头景色，都出现在他的画面上。

木刻家杨可扬认为：《黄包车》“从题材人物动态可以看得出，作者反映了当年上海劳苦大众生活情景，有平民画家的感情。从画作的技巧上看，作者有较好的绘画基础和速写能力，刻功细腻精到，有史料价值。”美术史家黄可见到《黄包车》后，撰文详介叙述了黄包车于1873年由法国人米拉从日本引进上海的简史，并说，它被称为“黄包车”，是因为座位造型犹如包厢，而起初规定本身涂以黄色油漆的缘故；黄文称，“画家熟练地驾驭圆刀、三棱刀、平刀等木刻刀，以线刻为主，结合块面处理，物象刻画基本写实，人物造型适当夸张、简洁、醒目、深沉，倾诉了画家对黄包车夫生活的各个侧面”。

画展和ARTA

1943年5月5—8日，白绿黑又与其他13位犹太画家在上海犹太总会举行了犹太画家在上海的首次联合画展。这时，日本占领当局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划出所谓的“无国籍难民指定地域”，实际是“犹太隔离区”，并规定犹太难民必须在5月18日之前全部迁入。画展的举行，距迁入隔离区的限期仅有10多天。另外，根据德国的达豪集中营纪念馆近年印制的白绿黑小画册发现，这位画家于1948至1949年间，还在YIVO在上海的机构内举行过画展，YIVO是一个研究犹太文化历史，特别是意第绪文化的机构，设在美国纽约。

从德国和奥地利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中间，有不少是

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他们组织了一个团体，英文叫ARTA，就是“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的简写。上述与白绿黑举行联合画展的画家，都是ARTA的会员。研究上海犹太难民历史的美国教授戴维·克兰茨勒，在《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一书中也谈到了逃沪犹太画家和其组织ARTA：画家们筹备或开集体画展，或开个人画展，企图吸引友人和顾客。为了争取较多的观众和招徕可能的赞助人，难民画家组织了一个团体，名叫“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简称ARTA），会员有64名画家和他们的友人。参加该会成为会员的赞助人，可以免费得到一件美术品，购买美术品也可享受折扣优待。他们的第一次联合画展于1943年5月举行，展出了14位画家的作品。绘画的主题集中于上海犹太人的生活。

美国生涯和中国情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白绿黑于1946年在上海成了家，娶了一个中国聋女为妻，一对异国夫妇，同“聋”相怜，恩爱相伴。白绿黑夫人郑迪秀生于1915年，自幼活泼可爱，但不幸3岁时坠楼跌成重伤，病好后双耳失聪。后来上海，先后在聋哑学校和美术学校读书，学油画。她与白绿黑可以说是师生关系。她后来以设计花布图案和为绣品打花样为业。1949年白绿黑夫妇先后前往美国，定居纽约。他们育有二子。大儿子是音乐家，经常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小儿子是妇产科大夫，在纽约行医。

白绿黑在美当了26年石印画师，经常举行画展，而常为人们称道的，则是他设计的扑克牌图案和他为美国总统餐具绘制图案。扑克牌图案以美国历史为题材，如4张老K的

画像，分别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一个头戴浣熊皮帽的拓荒者，构图别致。餐具是应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夫人之请定制，为白宫举行盛大宴会之用。全套瓷器共有2 000余件，其中大部分由白绿黑绘制。这使他青年时在美术瓷器厂和实用美术学院学到的本领得到了充分发挥。

白绿黑的画展，曾在首都华盛顿、纽约市、洛杉矶市举行多次。他的画展，还在法兰克福、柏林、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伦敦、巴黎等地的世界聋哑人运动会上举行。从1983年至21世纪之初，白绿黑在耄耋之年仍频频往返美、欧两洲之间。1994年3月，他又应德国慕尼黑一所犹太博物馆的邀请，出席了“犹太人逃难在上海”展览，并携带了自己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前往参展。他的画作还在巴伐利亚州的26个城市巡回展出，有一次还远赴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97年，在德国的圣奥古斯汀出版了他于1940年到1949年在上海制作的木刻集，由中国研究中心和华裔学社联合编印。在当年纳粹疯狂肆虐的德国，所有犹太作家的作品都在熊熊烈火中被付之一炬。而今远在德国境外的犹太画家的木刻集竟能在那里出版，足见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6年9月，白绿黑偕同儿子迪恩重访了上海，故地重游。他到了五原路的旧居，见到了老邻居。彼此之间在当年虽然关系也不熟，但谈起往事，都很动情。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白绿黑当时已86岁，但依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铄。这大概与他的画家生涯，尤其与搞木刻有关。版画家杨可扬说，画家、书法家所以长寿，与画画、写字需要运气有关。而搞木刻，乃是一半靠脑力，一半靠体力的职业，对身体尤其有好处。

白绿黑夫人于1988年去世。在海宁公墓郑家父母的坟上，墓碑所刻的子女敬立的名下就有迪秀的名字。在远嫁异国近一个甲子以后，她的名字依然长留于故乡。白绿黑本人于2002年9月在美国纽约逝世，一年多后，曾经关押过他的德国达豪集中营之纪念馆，在2004年1月3日至5月3日为他举行了身后的个人画展，并印行了他的小画册《吾画即吾语》(*Meine Bilder sind meine Sprache*)。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从难民到巨富

——艾森伯格与中国的不解缘

肖尔·艾森伯格 (Shaul Esienberg) 1921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在遍及全德国的反犹狂潮中,他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离开慕尼黑逃到上海。1940年,他也到了上海。战后,他经营实业十分成功,艾森伯格集团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他时刻不忘上海和中国。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机遇,他从以色列领导人那里获得了特许,将包括军工技术在内的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售给中国。80年代初,他又成为最早投资上海的外商之一,建立了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他的梦想是在上海浦东建设世界第24个钻石交易中心。在他去世后,这个梦想已经实现。

不忘上海救命恩 投资中国办实业

1940年,艾森伯格逃到上海,与先期到达的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会合。上海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全家幸存了下来,而他们在欧洲的亲戚大多惨死在纳粹的屠刀下。他经常对人说:“上海,当时是这个地球上犹太人唯一能去的地方,不需要签证和钱。我们在上海生存下来。是上海救了我们的生命,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与大多数在华的犹太难民相比，艾森伯格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去了日本，本想从那里转到美国，但是在那遇到一个经营钢铁的家族集团，于是便开始做起了向该公司提供矿石的生意。后来，他与东京大学美术讲师的女儿利厄·弗罗伊德斯伯格结婚，他的夫人具有日本和奥地利双重血统。战后初期，艾森伯格的生意越做越大。艾森伯格集团迅速拓展，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0多家办事处，分成两个控股公司，一个是以色列公司，另一个是在巴拿马注册的联合开发公司。前者的年营业额超过了25亿美元。艾森伯格集团投资泰国的咖啡加工，韩国的钢铁、铁路和原子能发电站，加勒比地区的海水淡化工程，美国的房地产业，还有采矿、燃料油和食用油、飞机租赁、航运及化肥等。1949年，他成为以色列公民，但是大部分时间仍住在东京等亚洲城市。他在日本的犹太人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1962年，他携妻子、孩子迁到以色列。

然而，上海和中国时刻在艾森伯格心中，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打开与中国的商贸大门。由于当时中国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拥有多重国籍的艾森伯格就通过其香港公司与中国做生意，在对华贸易方面迅速取得了进展。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使他从事的中国以色列间接贸易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他从以色列领导人那里获得了支持和特许，开始将包括军工技术和产品在内的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售给中国。那时中国正寻求一流的军事技术，但是却无法从西方和苏联得到。1979年，中国在自卫反击战中遇到了困难：陈旧的武器无法摧毁对方的苏制坦克。艾森伯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设法将以色列制造的穿甲弹提供给中国。由于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一直



赵启正(左)宴请艾森伯格(右)

面对阿方的苏制坦克，所以其生产的穿甲弹在摧毁苏制坦克方面特别有效。艾森伯格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获得了中国领导人的赞扬。

到20世纪80年代，在巴拿马注册的联合开发公司在中国各地建立分公司，成为最早直接投资中国、上海的外商之一。艾森伯格集团在上海建立的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率先在中国制造茶色玻璃和彩色玻璃，适应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额利润。

努力促进中国——以色列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历史上都发生了划时代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在亚洲东部和西端建立。当时两国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利害冲突，建立外交关系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必定会给中犹两个民族进一步发展传统友谊提供一个极好的契机。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全球冷战的激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被迫中断。直到43年后，两国关系正常化才得以实现。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在不久后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以色列总理拉宾举杯向艾森伯格祝酒。他对出席宴会的来宾们说：“艾森伯格先生为以色列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虽然艾森伯格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参加宴会的高级官员都知道拉宾的意思是什么，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文革”结束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以关系也开始逐渐解冻。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决定由部长魏兹曼负责这一工作。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拨款重开关闭了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由资深外交官鲁文·梅厄哈夫出任总领事。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千方百计打破以中关系僵局，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方针受到以色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香港犹太社团为推动中以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艾森伯格功不可没。

艾森伯格深知，外交试探对促进中以接触十分重要，但外交接触和政治行动需要经济和文化的铺垫，应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将自己经营多年的中以间接贸易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如前所述，他从以色列领导人那里获得了支持和特许，开始将包括军工技术和产品在内的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售给中国。当时，中以之间此类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贸易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的艾森伯格集体进行的。对于那时在武器和高科技领域仍然遭受西方和苏联严密封锁的中国来说，通过艾森伯格获得以色列的高技术及其产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过，如果仅仅把艾森伯格视为武器商是不公平的。他对华贸易和投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品种非常广泛，涉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前面提到的玻璃制品。他甚至还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许多促进中犹、中以交流的文化活动。

艾森伯格的工作为中以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中以两国领导人都对艾森伯格在促进中以关系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表示肯定和赞扬。

在上海建立钻石交易所

艾森伯格曾对本书主编说：“我的梦想是在上海浦东建设世界第24个钻石交易中心。我曾问你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了，你不是很很有把握地说可能是百分之五，我听后觉得可能没有钻石的市场，不过当你说中国有12亿人时，我发现百分之五也有6 000万，这个市场十分巨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艾森伯格竭尽全力。就在他去世前三天，他代表以色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与陆家嘴开发公司草签了组建上海钻石首饰交易中心的合同。那天他对记者说：“把建这样的中心选择在上海，是因为这里与以色列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二战期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工业城市，钻石交易中心选址在证券大厦的对面，位置很不错。全世界钻石交易量为600至700亿美元，我希望上海的交易中心今后能占到5%到10%，或者更多。这一目标不用5年就可达到，对此我有信心。我将请世界钻石协会主席等同行一起来参加正式签字仪式和开工仪式。钻石加工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它能给上海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他去世后，他的家属继续积极推动这一项目的实施。2000年10月，上海钻石交易所正式成立。从2002年6月1日起，我国对钻石进出口税收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钻石（包括钻石毛坯和未镶嵌成品钻）进口免征关税；对全国钻石进出口实行集中管理，归到上海钻石交易所一个屋檐下办理有关手续。从这以后，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交易的钻石进出口贸易额扶摇直上。到2004年，该所钻石交易额已达到3.68亿美元。现在，位于金茂大厦内的上海钻石交易所呈现一派忙碌景象，钻石进口、出口交易十分红火。此番情景，

令前来看生意的外国钻石商好不羡慕。

艾森伯格的梦想已经在他热爱的上海实现了。

（主要材料来自本书主编对艾森伯格的采访。其他材料摘编自：“让浦东成为钻石交易的一个中心——访以色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裁艾森伯格”，《新民晚报》1997年3月27日；“上海钻石交易所热闹了”，《文汇报》2005年2月22日，等等。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杰出的德国犹太作曲家弗兰克尔

沃尔夫冈·弗兰克尔 (Wolfgang Fraenkel, 1897—1983)，是一位本来以法官为职业，却在音乐上具有多方面精深造诣的奇才，作曲、钢琴和提琴演奏，乐队和合唱指挥，样样擅长。弗兰克尔出生在柏林，在那里的克林德沃思·夏尔文卡音乐院学习小提琴、钢琴和音乐理论。毕业后，他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国军队中任炮兵军官。战后继续学业，于1923年毕业，任法官。纳粹党上台后，他因有犹太血统（父亲是犹太人）而从“堂上官”沦为阶下囚，被关入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获释之后，又被限期离境，于1939年四五月间流亡上海。

桃李满天下

弗兰克尔到沪后，便在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上课，也通过私人教授培养学生。他的学生中，有诸多后来成名的人物，如丁善德、张昊、邓小敬、杨永、瞿希贤、汤正方、桑桐、管荫深、李乃聪、庞光聘、杨马石、李德伦、刘如曾、张宁和、朱建、董光光等人。弗兰克尔在上海国立音专讲授的课程，先后有和声、严格对位、自由对位、赋格、配器、曲式和自由作曲，主要讲授阿诺德·勋伯格的和声体系和恩斯特·库尔特 (Ernst Kurth, 1886—1946) 的线条对位理



弗兰克尔

论。这些新颖的作曲手法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它们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桑桐,是弗兰克尔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为小提琴和钢琴合奏而作的《夜景》,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音乐会上备受好评。桑桐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上发表“纪念弗兰克尔与许洛士”一文(许是弗的后任)。桑桐说,弗兰克尔以其精炼的归纳、明确的逻辑和讲授时的提纲挈领而使学生能充分理解。他认为,一位优秀的作曲理论教师,不仅限于作曲技术理论的讲授,而必然要对学生创作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进行启发和培养,弗兰克尔以其德、奥音乐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精神来启发学生,使他们在从师学习过程中深受影响。著名导演黄佐临曾把柯灵根据高尔基原作编写的剧本《夜店》拍成电影,并邀请弗兰克尔的5位学生桑桐、瞿希贤、汤正方、秦西炫、薛岩配乐,这部电影就成了弗兰克尔学生作品的荟萃。

后来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朱建曾对弗兰克尔的教课有生动、细致的描写。在老师弗兰克尔带来的现代音乐小总谱中,朱发现了不少自由节拍形态的音乐以及频繁更换拍子的小节,对此颇不理解,于是请教老师。老师当时并未多谈,但在下一堂上课时,却给朱带去了20多本小总谱,其中有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勋伯格、德彪西、克热内克等人的作品,要朱自己去研究、揣摩。这样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的方法,大大地开发了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若非弗兰克尔这样博览群“谱”并烂熟于胸,俯拾即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除了在上海国立音专教课之外,弗兰克尔还同阿德勒

(Ferdinand Adler, 小提琴)、余甫磋商 (Innocent Shevtzoff, 大提琴)、普陀施卡 (Josef Dodushka) 等一起, 由丁善德带队, 每周一前往南京国立音乐院上课。弗兰克尔所开的课程, 有作曲、和声、配器、曲体(即作品分析)等项。新中国成立后, 国立音乐院于1950年迁天津, 1958年再迁北京, 并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弗兰克尔当年在南京所教的学生, 至今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和从事理论研究的, 有段平泰、黄祖禧和王震亚、文彦夫妇, 而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则有黎英海, 他们虽已初入耄耋之年而仍老当益壮。弗兰克尔在南京教的学生, 也有移居香港和加拿大的。

创作和著述

弗兰克尔在上海曾为两首唐诗和一首宋诗谱曲, 供女中音和乐队合演, 即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春夜洛阳》(亦作《洛城闻笛》) 和苏轼的《春宵》。他一生只采用过这3首中国古诗谱曲, 而这3首又都是咏春的。古语云“言为心声”, 他离开纳粹肆虐、阴森可怕的集中营, 来到安定、平和的上海, 自然会有一种冬去春来的欣快之感。他开始以这3首咏春诗谱曲, 恰值1941年5月春暖花开之际, 可能是他心情的自然流露吧! 弗兰克尔据以谱乐的3首古诗, 不知是哪位饱学之士为他录写的, 书法潇洒秀丽。尤为特别的是, 用透明的薄纸覆盖在上面, 并在每个汉字的下面, 都用英文打字机在薄纸上逐字注出其英文释义, 以帮助作曲者的理解。弗兰克尔是通过德国诗人和汉学家洪涛生 (Vineenz Hundhausen, 1878—1955) 的译作, 而接触到这些唐、宋诗歌的。

外国作曲家为中国古诗谱曲的, 不乏其人。他们最

喜欢的，似乎是孟浩然、王维、李白等的田园山水诗。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奥地利犹太人马勒 (GustaV Mahler, 1860—1911) 的《尘世之歌》(又译《大地之歌》)，采用了7首唐诗，是一部为男高音、女低音独唱和管弦乐队而作的交响曲，早已成为经典著作。还有以表现主义手法而知名的瑞典犹太人罗森贝格 (Hilding Rosenberg, 1892—1985)，以唐诗谱成的歌曲有14首之多，所选的诗人，除孟浩然、王维、李白外，更有柳宗元、刘禹锡、张九龄、朱庆余、顾况、卢纶、李益等人。与上述那些作曲家不同，弗兰克尔为中国古诗谱曲的优势是他居住上海，任教音专，与中国同事、学生朝夕相处，对中国古诗的意境和内涵自然有更深的体会。可惜的是，不论是弗兰克尔在沪期间，还是离开以后，这3首歌曲都从未在上海演唱过。

有一次，青年小提琴家廖玉玑 (Leonore Valesby) 要同乐队合奏莫扎特的《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但只有钢琴伴奏谱，乐队无法伴奏。她求援于弗兰克尔。他在既无总谱又无小总谱的情况下，硬是凭借高超的作曲素养和对莫扎特乐曲的深刻理解和强烈记忆，把乐队伴奏部分即兴编写出来，救了燃眉之急。事后得到莫扎特这部协奏曲的总谱，两相比较，相差无几。这也可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创作吧！廖玉玑出身音乐世家，她的父亲是中国音乐家廖青主，母亲是德国钢琴家 Valesby (汉名华丽丝)，夫妻两人曾合著音乐教材《音境》，列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廖玉玑拉莫扎特协奏曲求援于弗兰克尔之事，谭抒真、陈宗晖等乐界前辈谈起过，在音乐界传为美谈。

另外，根据德国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图书馆藏的弗兰

克尔档案，他共创作了6部交响曲，其中的第三部始作于1940年、第四部作于1944年，都是他居住上海时期，可惜都只有片段。上述档案还提到，他从1939年至1947年居住上海的8年间，共写了6部作品，有交响音乐、歌剧、声乐曲和钢琴曲，但完成的仅有2部。

弗兰克尔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时，曾撰写了论著《非功用性音乐》，但因自己是犹太人而无法在那里出版。稿件携来上海后，他又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详细阐述了第二维也纳乐派的特点。与他同属这一乐派的逃亡来沪的犹太音乐家，还有许洛士 (Julius Schloss, 1902—1973) 等人。弗兰克尔于1947年离沪赴美之际，曾因国立音专师生之请，推荐了许洛士填补他的空缺。弗兰克尔在上海时，曾在1941年12月出版的一本 *Kreis* (《圈子》) 德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新音乐的若干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euen Musik)。这本杂志水平颇高，可惜只出了一期就短命夭折了，这似乎与不久后日本进占租界有关。

指挥和演奏活动

弗兰克尔在上海的指挥和演奏活动，可以从其档案中保存的节目单和剪报中了解，大致有钢琴独奏、钢琴伴奏、小提琴独奏、室内乐合奏、合唱指挥、乐队指挥和在乐队中拉中提琴等。

1939年10月25日，弗兰克尔来沪不久，就以小提琴家的身份，与大提琴家文克勒 (Eugen Winkler) 和钢琴家马戈林斯基 (Henny Margolinski)，在美国妇女俱乐部举行的室内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德沃夏克、拉威尔的三部三重奏。1941年5月4日在兰心大戏院的室内音乐会上，弗兰克尔在

勃拉姆斯的弦乐六重奏中拉中提琴，又与钢琴家查哈罗夫 (Boris Zakharov) 合奏弗兰克尔的小提琴奏鸣曲。1941年1月9日，弗兰克尔在《字林西报》广播电台 (XC, DN) 为女中音拉普 (Sabine Rapp) 钢琴伴奏，由她演唱了道兰 (John Dowland, 1563—1626, 英国作曲家)、普赛尔、舒伯特的歌曲。1942年4月4日，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行的李民 (指李惟宁) 定期音乐会上，弗兰克尔再次与拉普合作，为她演唱的沃尔夫、瓦格纳、勃拉姆斯、德彪西、比才的歌曲担任钢琴伴奏。李惟宁为拉普担任钢琴伴奏的则有舒伯特的歌曲和李氏创作的5首歌曲。1941年2月18日和20日于兰心大戏院，在上海雅乐社 (The Shanghai Songsters) 合唱、广东旅沪中华基督教会管弦乐队伴奏的音乐大会上，弗兰克尔担任指挥，担任独唱的有上述的女中音拉普，和男中音—低音瓦尔绍尔 (Max Warschauer)，他是当时逃亡来沪犹太音乐家中最出色的会堂领唱，并擅作曲。演出的节目有巴赫的《圣诞清唱剧》(第一部分)、普赛尔的《弦乐组曲》、莫扎特的《经文歌和弥撒升阶圣歌》等曲。1944年6月15日，弗兰克尔在上海犹太总会演奏了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和维厄唐 (Henri Vieuxtemps) 的叙事曲和波兰舞曲这两部小提琴曲。

1945年8月1日，弗兰克尔指挥中国交响乐团 (又名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英文名China Symphonic Orchestra) 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为一所集英中小学筹募贷款。这场音乐会举行的日子很值得注意。它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节节败退仍垂死挣扎的最后10天。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美国向长崎投原子弹。10日，日本天皇决定投降。这场音乐

会的节目单把参加演出的全部团员的名字都登在上面。谭抒真担任乐队首席，他是第一批正式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的4名中国音乐家之一。事隔60年后回顾，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告诉人们在当年有哪些人在从事演奏活动，演奏哪种乐器。它是当时力量最强的业余乐队，人才济济，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声名远扬。中国交响乐团全名应为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团员以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为主，资历较深的有马思宏、谭抒真、毛楚恩、丹政修等，李德伦为主要的组织者。据李德伦在他的传记（罗筠筠著，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中回忆，这个乐团经常活动的地方有马思宏家、李天铎家、曹石峻家。曹爱音乐也懂音乐，后与乐团中拉大提琴的钱挹珊结婚。乐团规模后来扩大，由曹出钱，并改到在郁忻祖家练习，那里房子宽大，同学中能拉的都拉上了，并由李请他的和声老师弗兰克尔指挥，参加指挥的还有俄罗斯犹太作曲家，以歌舞剧闻名的阿甫夏洛穆夫。参加这个乐团的人员，除了1945年8月1日那场音乐会节目单上的乐师外，还有秦鹏章、马思芸、马思璐等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乐队。它从1944年正式成立起，一共排过四五套节目，1945年8月1日的那场，挑选了其中的部分乐曲。在这之前，乐团曾为抵制日本当局企图插足而宣布解散。到这时眼看日本败局已定，才又从地下状态恢复活动，准备迎接抗战胜利。

当年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预科学医，课余之暇参加这个乐团拉第二小提琴的叶椿秀，如今虽已年逾八旬，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叶医师说，弗兰克尔指挥《蓝色多瑙河》时，只把个别乐句的节奏稍稍变动一下，就将多瑙河和维也纳的欢快、祥和的气氛彰显了出来，真是会者不

难，举重若轻。叶又说，乐团排练时，是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威海别墅一个团员的家中进行的。他家的客厅很宽敞，能够容纳下整个乐团。但是弗兰克尔的个子魁梧奇伟，实在挤不进去，于是只好想急法子，索性把客厅通向院子的落地窗打开，由弗兰克尔站在门外指挥。

抗战胜利以后，在1946年3月1日，弗兰克尔又指挥上述乐团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音乐会，演奏莫扎特的歌剧《堂·璜》序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乐队首席改由马思宏担任，他同时在门德尔松的协奏曲中担任独奏。

尾 声

1947年，弗兰克尔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赴美途中，他创作了一部供大型乐队演奏的组曲。他在乐谱上注明了沿途所经过的城市名称，有上海、南京，然后乘船横渡太平洋，途经神户、横滨、檀香山、旧金山而到达洛杉矶。这体现了他勤奋创作、不稍懈怠的专注精神。弗兰克尔到美后定居于洛杉矶。初到美国时，他以为好莱坞的纪录影片和电视节目谱写背景音乐为生，并以抄谱之收入贴补家用。后来，才开始从事严肃音乐的创作。

他的音乐创作，包括已发表的作品和手稿，现分藏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莫登豪尔档案馆（Moldenhauer Archive）和德国慕尼黑市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他创作的乐曲共有193部之多，其中19部未完成，堪称著作等身。他主要的作品有：歌剧《燃烧的荆棘丛》（1924—1927）、《勋伯格主题变奏曲和幻想曲》（1957年在意大利的博岑市获布索尼奖），第三弦乐四重奏（1960年作、于1962年获伊丽莎

白皇后奖，在比利时的列日市举行的国际现代音乐节上演出），管弦乐《交响格言》（1965年，在米兰市举行的国际比赛中获拉·斯卡拉剧院首奖）。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犹太难民 布鲁门撒尔

迈可·布鲁门撒尔 (Michael Blumenthal) 1926年出生于德国柏林，1939年与父母、姐姐来到上海避难。1947年，他怀揣65美元离开上海，抵达美国。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出任过美国政府的副贸易代表和大使，1977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

上海难民生涯

布鲁门撒尔1926年1月3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近郊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曾经在那里经营一家服装店，全家过着和和睦睦的小康生活。纳粹上台后，他与家人成为希特勒疯狂的种族政策的受害者。孩提时代的布鲁门撒尔在柏林“选帝侯大街”上亲眼看到过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和到处打砸抢的纳粹党徒。他的父亲一度被抓走，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当时，只有在保证离开德国的情况下，父亲才能获释。所以，全家人想尽办法离开德国，而上海是唯一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方。布鲁门撒尔回忆道：“当时父亲本来没有机会拿到第四张来上海的船票，家人差点放弃，把我送去法国，但是父亲说，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最后一刻我才登



布鲁门撒尔

上了到上海的船。”那是1939年,布鲁门撒尔只有13岁。

他们一家4口到上海后,住进了虹口区舟山路59号的一间小屋子(上海人叫“亭子间”)。这个屋子只有10个平方来左右,4个人如何睡觉是个大难题。经过反复商量和比划,他们决定大家头朝四个墙角睡。于是,父亲、母亲、姐姐和他各自选了一个墙角,睡觉时头朝墙角脚朝里。对于个子比较高的父亲,他的脚总要碰上别人的脚,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对于当时只有13岁的布鲁门撒尔,由于个子比较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到上海后最初的那段日子,他们就是这样睡觉的,虽然十分艰苦,却是永远难忘的。

布鲁门撒尔对上海的难民生涯记忆犹新:“作为家中老幺,我在柏林出生和成长,然后随父母去了中国,那时我们已一贫如洗。战火中,我被日本人关押在一个隔离区,条件极端恶劣”;“中国人当时也很穷,我们‘占领’了他们的地方,他们本应该对我们坏一点的,但中国人都太善良了,还帮助我们”;“我在医药公司做过,送过面包,也在江湾机场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可以拿出上海地图,告诉人们他小时候在哪里生活、在哪里读书。他已经不太会说上海话了,但是不时冒出的“三轮车”“黄包车”“舢舨”等“上海名称”,说明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上海经历。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日本人的占领,上海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饥饿、死尸、疾病、娼妓和腐败,但他还是感激上海和中国人,因为“如果没有上海,留在德国就没命了”。

布鲁门撒尔目睹了犹太难民们如何在极其艰困的环境中争取生存,特别是妇女和青少年突然之间可以“超越自我”,发展出“领导”能力。布鲁门撒尔从中领悟到:突破自

我才是正道，金钱、地位或关系并不重要，只有发自内在的力量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后来，无论是在财政部长办公室，还是身为总统顾问，他从未忘记在上海度过的岁月，那些岁月为他后来的人生上了十分难得的一课。他说：“在上海学到的宝贵东西在正常情况下也许永远也学不到。在上海，我看到人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凭借爱、家庭、品行、勇气和坚忍不拔仍能取得成就。在上海，我看到了人性那光辉的一面，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闪光。在上海的经历还塑造了我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一生关心公共事务。”

步入美国政界

1947年，布鲁门撒尔用一口袋中国的纸币换了65美元，怀揣这点钱离开上海。抵达美国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刻苦攻读，毕业后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学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职务。

此后，他先是进入经济、金融、企业界，担任过许多公司和银行的主席、总经理和合伙人。在积累了丰富的经济、金融、企业管理经验后，他步入政界，出任过美国政府的副贸易代表和大使。1977年，他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成为“在美元上签字的人”。后来，他还担任过美国总统顾问等许多重要职务。

布鲁门撒尔始终认为：“在那极端艰困的时期，我学到了很多。正是那种极端境遇磨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力，也因此而使我的人生取得了成功。”

最近，他总结自己一生经历的巨著《从流放到华盛顿》(*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在纽约“利奥·拜克研究所”

(Leo Baeck Institute, 专门研究德语犹太人的权威机构) 出版。布鲁门撒尔在400多页的新书中, 以大事记方式记录了自己的生平: 从柏林、上海到移民美国。在美国, 他迅速晋升为经济界的管理人才, 曾在三届总统的财经部门任职, 最后担任卡特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 直到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被“征召”为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创办馆长。布鲁门撒尔深信, 创造历史的是人而非事件, 而他最感兴趣的则是强势性格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例如书中记述的希特勒, 只因内政及外交对手的软弱, 才使其一手操纵的恐怖和战争罪行得逞。书中写道:“二战之后的情况正好相反, 大西洋两岸都具有杰出的领导者, 其中最主要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及德国的反对党。”

他在书中不仅谈自己, 还对当今的美国政治发表了看法: “以我曾身为三届总统工作团队的成员以及多次在华盛顿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 目睹当今政党之间各不相让, 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 令我特别感到痛心。我们的政府工作陷入停顿。”布鲁门撒尔认为茶党 (Tea Party) 是导致美国停滞的罪魁祸首。他表示:“他们是一群虚无主义者, 一切只为否定而否定, 并因此而导致所有重要决策被迫叫停。真是匪夷所思!”有意思的是, 他在书中也不忘德国, 他认为德国不愁没有领导人才, 但政治领袖的素质问题则不容乐观。

努力促进中美关系

1973年, 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的一年, 布鲁门撒尔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华, 也是他26年后重返上海, 那次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1979年中美建交后, 他作为财政部长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互相解冻对方资产的协议, 还出

席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那次他见到了邓小平。在那次访问中，布鲁门撒尔曾专程到上海虹口寻访旧居，与当年邻居共忆难忘的战争年代。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与他1939年13岁时自德国逃难来沪时相比，一大变化是“街上已没有乞丐和倒毙者。”参加接待布鲁门撒尔的杨洁篪等外交部官员，听到他讲上海话时都十分惊讶，后来才了解他的上海经历。

此后，他一次又一次访问中国，为促进中美两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每次访华，总要抽时间来上海。1993年10月，他来到上海，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虹口舟山路59号的那间小屋子。当他走进屋子时，顿时热泪盈眶，当年的一切均浮现在眼前。以后他每次来上海，都要去那里看看。2015年，年届九十的布鲁门撒尔又一次来到上海，看到在虹口舟山路59号前挂上了写着他名字的纪念牌，十分感谢上海市政府和虹口区政府为保护历史遗址所做的有益工作。

不忘“以史为鉴”

令布鲁门撒尔意想不到的是，在他70多岁时，德国政府还邀请他出任柏林犹太博物馆 (Der Jüdische Museum) 馆长。他回忆道：“德国政府请求我接受这份职务，原因是，柏林犹太博物馆项目整个陷入僵局：项目参与各方龃龉严重，彼此指责对方反犹，同时各方不同的利益算计互相冲突。”

虽然承担这个任务有一定难度，但是布鲁门撒尔还是很高兴，因为这符合他一贯坚持的“不忘历史，以史为鉴”的思想，而且为他实践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故乡走马上任，制定了博物馆筹建

策划的方案，又经过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得以逐步克服困难，迅速取得了进展。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意在博物馆内设置了中国境内犹太人历史和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内容，这在欧洲许多犹太博物馆内是没有的。今天，柏林犹太博物馆已成为德国首都的一个亮点，显示出德国政府和人民“以史为鉴”的态度。为此，布鲁门撒尔十分自豪地说：“犹太博物馆已成为联邦德国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

2014年，布鲁门撒尔对采访者说：“以我的年龄来说，退休已刻不容缓，我马上就满88岁了。”话虽如此，他还是放不下自己呕心沥血一手筹建的“犹太博物馆”。他说：“我决不会停止关心犹太博物馆，即便是间接性的。它是我的最爱，直到生命的尽头我都会继续关注它，并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

（主要材料来自本书主编对布鲁门撒尔的采访。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上海犹太画坛巨擘——希夫

在上海的画坛上，曾经活跃过一些外国画家，存在过一些外国美术团体，如20世纪30年代之初成立的“上海美术俱乐部”(Shanghai Art Club)和“名流创作室”(Elite Work Room)。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为避难而大批涌入上海，这里又成立了一个英文简称ARTA的组织，由流亡的画家和美术爱好者组成，共有64人，举行过几次个人画展和联合画展。前面已提及这个组织及画家白绿黑，这里再介绍一位著名画家希夫。

美术生涯和中国情结

弗里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1908—1968，中文名：许福)，出身于维也纳的犹太美术世家。父亲罗伯特·希夫是著名的画家，曾为奥皇画像。希夫就读于造型艺术学院，师从达豪尔(Dachauer)、容维尔特(Jungwirth)等名教授。他为维也纳的几家报纸所作的漫画，使他声名鹊起，但他更向往到遥远的国度去扩大自己的视野，去描绘那里的人物。他的一个表哥在中国做古董生意，邀他前去，于是，他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在1930年6月到了上海。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剥夺了奥地利犹太人的国籍，于是希夫也成了上海滩上的犹太难民，只不过比大多数犹太

难民早来了几年。

希夫到上海不久，就掌握了中国人的面貌、形体特征，画出生动逼真、多姿多态的中国人形象。希夫被“上海美术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延聘任教，来到上海的头几年就举行了多次画展。1933年，他同奥地利在“水晶宫”参加联合画展，介绍中国。1934年，他到北平（今北京）举行画展，并在那里结识了埃伦·托尔贝克（Ellen Thorbecke，她的丈夫是荷兰驻华公使，汉名杜培克）。托尔贝克后来资助他出版了多种画册。希夫所到之处，不论是上海、北平，还是维也纳，都受到了欢迎。上海、北平、天津的报纸如《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北平记事报》（*Peiping Chronicle*）、维也纳的报刊《新维也纳杂志》（*Neue Wiener Journal*）、《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新维也纳日报》（*Neue Wiener Tageblatt*）等纷纷予以好评，介绍了他的生平，刊登了他的绘画，有时用了整版篇幅，有的杂志甚至把他的作品用作封面。在北京，他受《北平记事报》委托，绘制名人肖像结集出版，其中收有他画的胡适、马衡（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何应钦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如英国的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德国的陶德曼（Oscar Trautmann）等人的画像。他还与埃伦·托尔贝克合作出版了《中国名城丛书》，由他绘制插图，由托尔贝克提供照片以补充插图之不足，并撰写文字说明。可惜后来战事发生，丛书未出齐，仅问世了“北京”“上海”“香港”三种。

在上海，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imited）采用希夫的绘画印制了《圣诞特辑》，又以他的素描发行了一套题为《华人生活》的明信片。别发洋行是英国人在上海、香港、新



布夫

加坡开办的一家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过许多介绍中国的英文书刊。《华人生活》明信片用了《剃头师傅》《黄包车夫》《独轮车夫》《杂耍小姐》《流动饭摊》《算命先生》6幅。这些素描，以及他的其他画作《老农》《苦力》《盲丐》《叫化来的残羹剩饭》《街妓与老鸨》等，都以高超的技巧、同情的笔触，绘出上海社会和底层民众的风俗世态。他常说，“我爱中国人”，他的一幅画就以《我爱中国人》为题。他的某些绘画则是讽刺、嘲笑西方人在上海的养尊处优、纸醉金迷的生活，如乐极生悲、窘态百出的《西女坠马》，灯红酒绿的《夜总会生活》等。

希夫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于1947年前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954年回到维也纳，1968年逝世。不论在阿根廷，还是在奥地利，他的画展中仍经常包含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他不仅精于素描，油画、水彩画、粉画也独揽胜场。晚年他的画日趋成熟，把旧日在中国的作品修改润色，使之日臻完美，从而使很多从未到过中国的观众通过他的画作认识、熟悉了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

“中国作品”得到广泛介绍和高度赞扬

希夫关于中国的画作被人戏称为“中国作品”，在世界各国，特别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介绍和高度的赞扬。近年来，他的作品陆续在中国结集出版。

1992年，本文作者在《上海艺术家》杂志第5期发表了《“我爱中国人”——记奥地利犹太画家希夫》一文，概括地介绍了希夫的生平，他在上海、北京、天津的美术活动，他的绘画生涯，以及他离开上海以后的情况，对他作品的中国情结给予很高的评价。

1998年8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奥地利画家希夫笔下的上海画展”，由钱建平先生、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和万象书坊等单位合作主办，奥地利共和国联邦议会议主席盖斯特尔和上述促进协会主席卡明斯基博士出席。

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由卡明斯基撰文、钱定平编译的希夫画册《海上画梦录——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这一中文版本经卡氏与当时健在的希夫夫人商量，同意授权钱氏翻译，并放弃版税。

2003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卡明斯基著、希夫绘、王卫新译的《老上海浮世绘——奥地利画家希夫画传》。

现在，希夫其人和绘画已逐渐为上海滩上的人们所熟悉和喜爱。他有一幅漫画名叫“我爱中国人”，画了十幅淳厚朴实的中国男女老少头像，其中两人借用叶浅予笔下的王先生和小陈，他们围成一圈，中间用英文写着“我爱中国人”。相信中国人看了他的漫画以后，也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中国人爱你！”

精彩画作《海上画梦录》

希夫关于上海的代表作，也是最精彩的画作便是《海上画梦录》。

在这本画册中，编者卡明斯基将希夫的漫画分门别类归成十一章：“芸芸众生”“街头巷尾”“娱乐种种”“剥削吃人”“外国势力”“神女生涯”“侵略战火”“欧洲难民”“日本占领”“所谓‘胜利’”“斯土斯民”。

卡明斯基的文字说明，除了总的阐释各章的漫画内容以外，也广征博引，介绍了漫画以外的许多相关知识。例

如，外国人是如何通过威胁利诱、巧取豪夺，从中国政府手中把中国土地变成租界，并逐步扩大，反客为主的。又如，对于希夫所画的被上海人称为“大出丧”的送殡队伍，卡氏援用了著名捷克犹太记者基希 (Egon Erwin Kisch) 的描绘：“比起中国送殡队伍来，维也纳的隆重葬礼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的送殡游行其阵容齐全而壮大……抬棺材的人穿红戴绿，吹鼓手们鼓乐喧天。”接着，话锋急转直下：“然而，人们在晚间散步时也往往碰到躺在路边的尸体，他们是冻饿而死的，送殡队伍同他们决不相干。”上面最后一句，是这位记者的特色，不着一字褒贬而对吃人的旧社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控诉。

卡明斯基也以轻松的笔触，讲述了奥地利人在上海和中国的小故事。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曾有过原奥匈帝国的军乐团演奏或在跳舞厅伴奏；他们是穿过西伯利亚逃过来的”。奥地利人奥托卡舒伯特不但在上海出名，在避暑胜地北戴河也当过乐队指挥。他创作的乐曲《北戴河之夜》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小夜曲。

画册的编译者钱定平先生学贯中西，曾在奥地利某大学任职，兼教文、理，对上海的近代史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遭受歧视、虐待乃至屠杀的历史，以及他们从德国、奥地利、波兰集体大逃亡到上海的经过，都有比较多的了解。他的编译，文笔生动活泼，卷末又附有长达30多页的后记，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对希夫画作的深远意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卡明斯基的原著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芸芸众生”“街头巷尾”“剥削吃人”“神女生涯”是画册标题的四章，都以底层社会为对象，集中描绘了劳苦大众的风俗。以“芸芸众生”一章为例，画家刻画了陆上和水上

的各种人力交通工具，如独轮车、黄包车和当时刚出现不久的三轮车，以及江河上仅容两、三乘客的舢舨，还有江上的渔船。这一章也把各种食品担子收进了画面：油炸臭豆腐干，白糖糯米赤豆粥，广东叉烧包、伦教糕。而画家特别爱画的，首先要推馄饨担，其造型的优美，做工的精细，功能之全令人叫绝。担子一头的行灶中有熊熊炉火，灶上的锅子里有下馄饨用的沸腾翻滚的汤水，另一头有堆放着待添加的柴片，有一格格盛放馄饨皮子和肉馅的薄抽屉，还有摆放味精、辣糊、香料等调味品的小搁几。难怪外国人要叹为观止地称之为travelling restaurant（流动的饭馆）。馄饨担主做生意勤快，人总是不闲着，在暂时没有顾客光临就餐的间隙，便抽空裹出更多的馄饨以备用。他摊开的左手心里放一张薄薄的馄饨皮子，右手持竹筷或竹片“拓”少许肉馅放到皮子上面，左手五指稍一弯曲便捏成一个俗称的“拓肉馄饨”，手法之熟练不能不令人赞叹。

“芸芸众生”一章中还有《算命先生》和《代客写信》两幅，描绘的是当年一些落拓的老年文人常干的行当。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旧社会，不少人迷信命运，求神拜佛，搞拆字、相面、算命、起课算卦、扶乩圆梦等迷信活动的人应运而生，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些模棱两可的话，骗取主顾，使之信以为真，以博取蝇头微利，养家糊口。代客书写家信的摊子则常设在邮政局门口，为目不识丁或不会写信的主顾代劳，收取微薄报酬，光顾者以江、浙、皖三省，四乡八镇来沪帮佣的“娘姨”为主。画面上替人算命和代客写信的两位老者，伛着身躯，戴着老花眼镜，手执毛笔，在认认真真地忙着各自的工作，神态极其传神。

“神女生涯”则将妓女强颜欢笑的痛苦生活入画。大灾

人祸，农村破产，大量乡间妇女涌入上海寻找工作谋生，有进纱厂做工的，有到人家帮佣的，或做粗活做娘姨，或做奶奶，或领孩子。也有做交际花、伴舞女、按摩女、“玻璃杯”等色情或半色情行当的，更有等而下之，赤裸裸地从事皮肉生涯的“神女”，其中有类似日本艺伎的“长三”“幺二”堂子，号称“卖艺不卖身”，更下等的，则有普通堂子、“咸肉庄”，乃至沿街拉客、俗称“野鸡”的街妓。当时堂子均云集在四马路（福州路）的会乐里。此外，还有专做外国水手生意的“咸水妹”，陪美国兵开吉普车兜风取乐的“吉普女郎”。

希夫的画笔下，有一幅三合一的漫画，描绘一个农村少女到了纸醉金迷的大城市后，怎样迅速蜕变的过程。她在4月份还是粗布衣裤、天真无邪；6月份已是手摇折扇，身穿开衩极高的丝绸旗袍，足登高跟皮鞋的城市小姐；再到8月份，更成了口叼香烟，胸脯高耸、下身穿超短裙的摩登女郎。希夫手法的高超之处，在于三幅画中的同一女性，其面庞仍是同样的面庞，但表情却起了显著的变化，足见旧上海这口大染缸的腐蚀力之强。《街妓与老鸨》一幅，希夫入木三分地画出了街妓涉世不深、稚气未脱的神态，嫖客贪婪、肉欲的表情，老鸨阴鸷、狠毒、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刻画可谓力透纸背。

“欧洲难民”一章所描绘的，是画家希夫的犹太同胞，他们从德国、奥地利、波兰向上海集体大逃亡，把上海视为安身立命的最后逋逃薮。事实上，上海当时接纳的犹太难民，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在同一时期接纳犹太难民数的总和。这一章所收的画为数虽不多，但其中一幅题为《小红头阿三》的画面却道出了犹太人逃亡史上一段非常重要又十分奇特的经历。“红头阿三”是上

海人对锡克族印度巡捕的别称，印度巡捕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又因头缠红巾（其实各种颜色都有），故常被谑称为“红头阿三”。希夫画面上的“小红头阿三”，实际是来自波兰的密尔经学院的学生。他们头戴黑帽、身穿黑袍，服饰怪异，颊上留着络腮胡子，耳际挂着长长的发辫。中国居民从未见过这种装束打扮，以为他们是小个儿的“红头阿三”，而称之为“小红头阿三”或“小阿三”。

浏览《海上画梦录》，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特别是战时上海的情景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从难民少年到柏林爱乐乐团 首席小提琴手

赫尔穆特·斯特恩 (Hellmut Stern) 1928年出生于德国柏林,5岁学习钢琴,9岁学习小提琴,从小具有音乐天赋。1938年12月与父母一起抵达上海避难,后转赴哈尔滨,在那里继续学习音乐,17岁就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1949年,他与父母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加入以色列爱乐乐团,后加入过美国和德国的多家乐团,最终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多次重返中国,访问“故乡”哈尔滨,进行演出和讲学,并资助过许多中国青年出国学习音乐。

避 难 来 华

纳粹上台的时候,斯特恩刚5岁。人们在5岁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太多事情,但他还记得,当时家里乱成一团。他父亲的朋友们主要是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常常在他家里讨论到深夜。自那以后,他们的聚会变得越来越少,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流亡之路。由于纳粹的排犹政策,他们也像斯特恩的父母亲一样失业了。

他还记得父母亲怎样向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发出移民申请。每天早上,只要送信的人一来,他们就会激动起来。斯特恩跑去迎接,因为他总想第一个接到信,单是为了信上



赫尔穆特·斯特恩(右三)回到“故乡”哈尔滨演奏

许多国家的美丽邮票也乐意，例如乌拉圭的或者委内瑞拉的邮票。然后，父亲立即忍不住把信夺了过去——又是拒绝！这种不断的失望在全家人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斯特恩上学的路经过柏林劳巴赫大街，西南林荫大道，皇帝广场（现在叫联邦广场）直到摄政王大街和巴登街的路口，犹太人教堂也在那儿。1938年11月9日，他7点半从家里出来，沿着西南林荫大道慢慢地溜达着，横过皇帝林荫大道。在法尔齐纳大街街角有一个乐谱商店。商店被砸得粉碎，大街上全是碎玻璃、乐谱、一个单簧管、许多被摔碎的小提琴和一架显然是从楼上摔下来的钢琴。他走近学校，看到犹太人会堂的圆顶在燃烧。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站在大街上。

消防车已经到了，但没有人动手救火。他的学校在教堂后面也在燃烧。正当大家束手无策、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希特勒少年团的大卡车开了过来。他们狂呼乱叫，用石头打师生们，用的是真正的铺路的小石块。就在那一天，冲锋队的乌合之众走遍全城和全国。他们先抢劫、然后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一个特别保守的估计是：91个犹太人被杀，29个百货商店、171间住房和101个犹太会堂被破坏或者被烧毁，7500个店铺被抢劫并被捣毁。大约有3.5万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但是人们却把头转向一边，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当斯特恩宣布他家将到中国去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们拿来世界地图，想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同时，斯特恩心里也充满了恐惧，担心可能太晚就走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抓住了逃往中国的机会。因为这期间斯特

恩母亲在“德国犹太人救济协会”里工作，一个合同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哈尔滨去工作。本来那是一个虚构的合同，但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签证。

他们只要带上一些衣服、被单、枕套和纪念品之类的东西就够了。他们是不能打点行装的，那只能由管运输的人干。在他家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旁坐着一位高大的佩戴着党徽的官员，监视着他们不得将贵重物品藏起来。当母亲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时，他变得完全不知所措了。

1938年12月底，他们乘坐的轮船驶入上海港，他们冻得直打哆嗦，湿漉漉的寒冷直刺骨髓。他们上了岸，一个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接待了他们。那个委员会的人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安排几千难民的吃住和生存。每个人得到一个地址，大多数地址都是在被日本人轰炸以后的虹口区。

到了虹口，全家站在一个几乎没有灯光的被炸毁的房屋前面。地下室的小洞子里住着许多中国人。除了三张没有垫子的可折叠的行车床之外，房间空空如也。没有水。母亲哭了，父亲安慰她：“我们已经抽了一个上签，我们将继续走，到哈尔滨去。想想那些不得不待在这里的穷人吧。”第二天上午，他们被人送到救济委员会所在地，至少那里生了火。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一辆本特莱小汽车开过来停下，司机下车给他的身穿皮大衣的主人开了车门。那个人下来，走进救济会，来到斯特恩的父母面前，并与他们交谈起来。最后，父母亲问斯特恩，愿不愿意跟这位先生走，在上海逗留期间，斯特恩可以住在他家里。斯特恩没有反对，那位先生还到另外的桌边，带走一个小姑娘。在告别了

父母亲之后，他俩就坐进了那辆豪华的小轿车，到了他们的新住所。外面的台阶上站着好几个身穿佣人服装的中国人：杂役和奶妈等人。他们成了上海最富有的犹太家庭之一托以格 (Toeg) 家的客人。托以格家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塞法迪犹太人¹。托以格先生向斯特恩的父母亲建议，斯特恩应该留在上海，他将会照顾斯特恩的教育，特别是音乐教育，斯特恩应该住在他家，他也会关心斯特恩的父母亲并且为他们找合适的工作。

可是，斯特恩的父亲坚持要去哈尔滨，说母亲在那里可能会得到一个合同和工作，在那里可能会比在上海好些，因为那里不会有那么多流亡者。他坚持原来的计划，不为所动。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母亲的合同只是一纸空文，仅仅为了搞签证用的。可是，在斯特恩父亲虚无缥缈的想象里，总以为确有其事。不久后，全家人乘一艘日本轮船到达满洲的港口大连，从那里坐火车北上。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哈尔滨，犹太人团体的一位先生到车站接他们。他看到他们的衣着分外震惊——斯特恩还一直穿着短裤。那里的温度低于零下20℃。他们只能在候车室等候，直到犹太人团体给他们拿来一些衣服，用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犹太人团体的驻地，那里有热饭招待饥饿的人们。

这就是斯特恩家的“中国时期”的开始，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时期会持续11年。直到1941年12月日美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还希望离开中国，能继续前往美国或者巴勒斯坦，指望他们在德国就提出来的申请仍然有效。可是，那些希望由于美国和英国当局丝毫没有松动限制犹太移民的政策而破灭了。结果，哈尔滨就成了斯特恩家“长时期的故乡”。

¹ 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原指从西班牙、葡萄牙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现泛指犹太人。

此非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1840年后来中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大多来自奥斯曼帝国属下的巴格达和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等地，其中著名的有沙逊(Sassoon)、嘉道理(Kadoorie)、哈同(Hardoon)、亚伯拉罕(Abraham)、所罗门(Solomon)、埃兹拉(Ezra)、托以格(Toeg)、海亦姆(Hayim)、索福(Sopher)等家族。

哈尔滨生涯

起初，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同样来自柏林的医生曹德凡博士家的一个房间里。后来，得到犹太人团体的经济支持，他们才能自己租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在一个总共15个家庭的小院里，大家进出都是通过一个大门。斯特恩家的房子在最后排，有两层，下面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上面是两间卧室和一间小斯特恩住的很小的房间——里面刚好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一个厕所。

斯特恩家仍然不富裕，但是比以前好多了。父亲开始给人家上课，母亲在现代剧院里找到一份工作，最后甚至得到了一份真正固定的工作合同。斯特恩开始进俄国犹太人的塔木德—托拉学校¹。然而，他10岁了，却必须和6岁的孩子在一个班，因为他不会俄语。他有时被其他的孩子嘲笑，被骂为“德国人”。

后来，斯特恩的父亲把他接出了学校，因为他们认识了本德尔先生。他是一个细心而又善良的人，成了斯特恩父母亲的朋友和斯特恩的家庭教师，在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在一般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些。这种私人授课只有在本德尔先生几乎不要求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斯特恩母亲为他做饭，时不时地也给他买点酒，他感到在斯特恩家很舒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斯特恩居然像富人家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位家庭教师。

可是，他们家的经济情况却是江河日下。1944年，他们不得不为日益增多的柴米油盐和穿衣费用而奋斗。全家人忍饥挨饿、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没有温暖的房屋住，缺少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连面包也是配给的。早晨，斯特恩总是被派到面包铺排队等候，用面包票买面包。当然，他的肚子总

¹ 学习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和摩西五经（托拉）的学校。

是饿得咕咕叫，经过长时间站着排队，等排到的时候，他也快冻僵了。面包热乎乎的，香气诱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先揪下很小很小的一点儿面包吃掉，然后，又揪下一点点儿，又一点点儿。当到家的时候，那一块面包就几乎被吃完了。

不过，他们家又有了一架钢琴。对此，斯特恩并不怎么快乐，因为他除了练小提琴之外，还得练钢琴。虽然喜欢弹琴，但他从来没有好好地练过，因为缺乏正规的基础训练。他父亲和他的学生上完课之后，轮到母亲干活，然后斯特恩也被叫过去，为学生提供钢琴伴奏。这时候绝对不能和父亲顶撞，即使厨房里的汤流出来或者土豆烧糊了也得服从他。所有这些完全是免费的，不过学生的家长们也确实付不起费用。

母亲还要承担沉重的家务。父亲一向不假思索地随意购买各类食品，可是准备餐食过程当中许多复杂工作都要母亲来做。他有时买鸡回来，可是，既没有宰杀，也没去毛。买鱼回来的时候也是同样，必须将鱼去鳞剖腹。对此，母亲感到特别恶心，因为那些鱼常常都还活蹦乱跳。此外，家里没有什么工具。所以，做家务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生火做饭简直是一场灾难，不是因为木柴太潮湿，就是煤中有太多石头。

弗拉基米尔·大卫朵维奇·特拉赫藤贝格是哈尔滨音乐生活的领导人物。他是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和“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的奠基人之一。斯特恩刚到哈尔滨就受到他的指导。他免费给斯特恩上课，使他进步很快，然后让斯特恩进入他的音乐学院。学院的经营是按照俄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教师几乎都是俄国人，都是一些很好的音

乐家。1942年，斯特恩十四岁时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现在，每当他想起当时必须演奏的节目时，都会感到像骑马飞越波登湖。记得当时自己双膝颤抖，琴弓犹如一根锯条，下巴颏下面的小提琴像一把低音提琴。尽管如此，评论全都是称赞的话，斯特恩的老师也很满意。1945年，斯特恩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积累了最初的演奏经验，那年他才17岁。那年秋天，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日本人投降了。

中 国 情 结

从1939年起，斯特恩家就在哈尔滨不断地申请到美国去，但一直得不到签证。因为尽管他们早已被“取消”了德国国籍，但仍然被列入德国移民的配额之中。到1949年初，斯特恩和父母亲写了一封申请书，并辗转将它交到管辖整个东北地区的八路军¹司令员陆熙（音）将军手中。6月底的一天，他们被告知可以出境。不久之后，全家乘坐“Wooster Victory”号轮船驶离中国。漫长的航行之后，他到达以色列海法港。那天是1949年除夕，斯特恩母亲的生日。自从他们离开德国，整整11个年头过去了。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了以色列。

不久后，斯特恩加入了以色列爱乐乐团，成为团中的青年骨干。拥有在哈尔滨打下的扎实演奏基础，加上以色列良好的艺术氛围，使他如鱼得水，音乐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名气越来越大。此后，他收到了国际上许多知名乐团的邀请信和聘书，加入过美国和德国的多家乐团。最终，他回到故乡，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国，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二

¹. 此处即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赫尔穆特·斯特恩对中共领导的军队不太了解，所以仍使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用语“八路军”。

故乡哈尔滨。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迅速恢复和发展,斯特恩盼望的重返中国、哈尔滨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79年10月27日,斯特恩随柏林爱乐乐团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当斯特恩走进接待大厅时,突然听到有人用英语喊他的名字“赫尔穆特! 赫尔穆特!”两人相见时,那人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原来这个人是杨慕云,与斯特恩一同在特拉赫滕贝格老师那里学习的同学,斯特恩简直认不出他来了。站在其旁边的是斯特恩父亲最喜欢的学生王一鼎,现在是一位歌唱家。另外还有几位斯特恩在哈尔滨结识的朋友也来了。11月1日,斯特恩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率领一个三重奏小组去了哈尔滨,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亲人般的款待。斯特恩一行的演出在哈尔滨青年宫举行。他回忆道:“剧场内两千多名观众格外安静,除了三重奏优美和谐的乐曲绕梁回荡外,剧场里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大声说话……对于哈尔滨这座音乐城的观众来说,久违了的西方音乐,对他们是那么亲切,犹如一个老朋友又回来了。”演出结束后,斯特恩与哈尔滨同仁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答应帮助乐团解决所缺少的必要的工作条件。

斯特恩一回到德国,就立即同其熟悉的机构接触,他认为,仅仅向音乐家们发放奖学金,让他们到德国来学习还不够,还应该向他们提供乐谱、琴弦、乐器零件和乐器。在波恩音乐理事会之家的一次聚会上,德国工业联盟文化圈,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德国音乐理事会和德国乐团联合会都答

应给予支持。为了帮助中国，斯特恩还把募集的捐款和一次音乐会巡回演出联系起来。另外，斯特恩还把从其朋友那里拿到的捐款，作为奖学金亲自提供给中国学习音乐的大学生。

从此以后，斯特恩几乎每年都要回一趟中国，常常到一些偏远的从未听到过西方室内乐的地区举行音乐会。斯特恩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5年，他到了哈尔滨，然后去了扎兰屯，再后去了北京。这里的一草一木，令斯特恩感到十分亲切，尤其是这里的人们亲切、淳朴、善良，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帮助中国特别是第二故乡哈尔滨人的决心，并努力使这种在患难中凝结的友好情谊不再中断，世代发扬光大。

（摘编自赫尔穆特·斯特恩：《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部分材料来自本书主编对赫尔穆特·斯特恩的采访。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参加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 红医战士傅莱

在20世纪30年代从欧洲来华的犹太难民中，有一位参加了八路军部队，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且此后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国的奥地利人，他就是红医战士傅莱（Richard Frey，原名 Richard Stein）。

早年革命生涯

1920年2月11日，傅莱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市一个殷实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维也纳市一个地方财务官员，母亲是一名擅做女服的裁缝。少年时期，他在维也纳市19区的杜普林根中学读书。为了实现将来从医的梦想，他参加了医学知识的课外学习和培训。

1934年初，也就是傅莱14岁那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而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奥地利爆发了国内战争。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工阶级举行罢工，并走上街头游行、后来发展到与政府军队展开正面冲突的巷战。受到思想“左倾”的父亲的影响，傅莱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运动。作为坚守在“卡尔·马克思大院”的革命军中几个红小鬼之一，他拼命地帮助搬运弹药和包扎负伤的战士。虽然最后政府军无情地镇压了革命军，但



周恩来在延安

傅莱却更加坚定了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追求和平和公正的信念，逐渐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内战结束后，他于1937年秘密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战地医疗培训，学会了使用X光、临床化验和防疫急救。后来，他除了在文理学校上学外，还一直坚持参加一些专科医院培训，并到离家不远的维也纳大学旁听相关课程。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傅莱到维也纳赫尔兹克勒斯特放射专科医院和维也纳大学皇家附属医院工作，医疗实践更加丰富。

1938年3月13日，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共产党人、左翼人士和犹太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和屠杀。12月，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紧急通知傅莱，他已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必须立即离开维也纳。为此，傅莱不得不告别热恋中的女友，放弃自己喜欢的医务工作，乘火车经瑞士逃到意大利的海港城市热那亚。1938年12月，在父亲和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未满19岁的傅莱搭乘远洋客轮，前往中国上海。他后来回忆，那时之所以去上海，一是因为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接受犹太人的大都市，二是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有一支中共领导的、坚决反对法西斯、抗击日本侵略的八路军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奔向中国——上海。

从上海到晋察冀

在船上，傅莱就打听怎样能找到八路军。当得知在香港的宋庆龄可以提供帮助后，船一靠香港码头，他就急于上岸去找，但终因人生地不熟，没有找到宋庆龄办公处。接

着，他继续前往上海。在海上颠簸了近一个月，他最终于1939年1月15日抵达了上海，这时他身上只剩下5个马克。

因一时难以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傅莱只好在虹口一个慈善团体开办的接待站住下，一面在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工作，一面继续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同年3月，傅莱北上，来到天津一家奥地利医生开设的德美医院任X光及化验技师，后又转入天津马大夫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他多次前往邢台、北平等地区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1941年秋天，他正在天津马大夫医院工作，突然接到北平中共地下党的通知，要他立即从天津赶到北平。他先到了北海公园，同联络员接头，随后一起前往颐和园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接着，他和交通员骑自行车出发，取道妙峰山，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平西根据地。在那里，傅莱见到了肖克司令员。两星期后，他又在平西根据地部队的护送下，到达晋察冀军区的中心地区，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还根据德语“自由”一词的谐音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并解释说：“你从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我们的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从那以后，他一直使用傅莱这个名字。

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

考虑到傅莱有医疗方面的特长，聂荣臻司令员请他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传染病学教员。傅莱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司令员的期望。从此，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对这片辽阔的

上地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这正是他日后选择定居中国的重要原因。

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傅莱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在1942—1944年两次反“扫荡”中，他一边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传染病的教学工作，一边又积极地同学员一起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他对教学十分认真，平时下苦功夫学习汉语，努力克服语言障碍。

由于傅莱不太会讲中国话，因此一开始上课非常困难，必须在上课之前先用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在其他教员的帮助下借助字典将讲稿翻译成汉语，并在汉语旁注上读音，反复练习发音。虽然讲课的时候他经常念错字，大家也捧腹大笑，但是学生们喜欢听他讲课，觉得这样的课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当时，为了给傅莱这个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学校专门特批给他使用有两个油捻的油灯，这在艰苦的反扫荡时期成为一项“特殊待遇”。当然，除此之外，他和大家一样一面背粮食、打游击、一面执行战地救护任务。他吃的粮食是黑豆，喝的是稀粥，并不享受特殊的优待。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传染病。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层层封锁，药品奇缺，很多病人得不到医治。傅莱当时担任边区医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尽快找到治病救人的方法，他采用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有效地阻止了病疫的肆虐，并在作战部队组织实验并推广这一疗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此，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给他颁发了边区政府的奖状。1944年，经聂荣臻司令介绍，傅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国际主义战士参加中国革命的夙愿。

成功研制粗制青霉素菌

1944年秋,傅莱受组织派遣到陕甘宁边区工作,来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国医科大学传染内科进行教学和医疗工作。由于当时药品奇缺,傅莱和战友们一边教学、医疗,一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研工作。

1945年初,在王学礼、宋同珍两位同志的帮助下,傅莱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的菌种和部分资料,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自制了粗制盘尼西林并应用于临床。

1945年5月20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莱作了专题报告,介绍了他们团队成功自制粗制盘尼西林的过程。当时的《解放日报》和英文报刊《新中国》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5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延国际友人傅莱医生试制成功粗制青霉素”的消息,称赞道:“青霉素,是世界灵药之一,有杀灭病菌的功效,是美国医药界发明的,经过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条件落后的边区制造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傅莱及其战友们在困难的条件下成功研制粗制盘尼西林,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

与战友柯棣华在一起

在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难岁月中,傅莱并不感到孤单,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他这样志愿投身革命洪流,帮助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自由的外国人。来自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同傅莱一起生活、工作的好战友。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互相用英语问候,当时傅莱的心情

激动得难以言表。1941年冬天，傅莱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传染病教员，柯棣华当时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开始傅莱住在村南头，后来领导考虑到照顾他，便安排傅莱与柯棣华做邻居，所以他们俩之间交流的机会更多了。

一开始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中文入门。柯棣华比傅莱早一年到中国，已经能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讲课，甚至直接用中文备课，而傅莱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对柯棣华的钦佩之情也油然而生。柯棣华却摇摇头说：“不行，这点进步全是逼出来的。”他告诉傅莱，在广州时有一次下馆子，因为说不清烧鸡二字，只好在纸上画，偏偏画得不像，结果端上餐桌的竟是炸青蛙——中国称之为田鸡者。还有一次在边区老乡家里吃饭，因为将主人问他吃饱没吃饱误为吃不饱，混淆了“没”和“不”的意义，便连说“没没没”。于是，热情的主人又为他加饭添菜，搞得他颇为狼狈。他深有感触地说，最初认为学中文很简单，因为中文不像英文有性和数的变化。其实不然，说话还容易一点，读和写就很难了。他最怕写板书，常因为多一笔少一笔闹出笑话，如分不清“般”和“股”，“球”和“救”，结果将“一般”写成“一股”，“急救”写成“急球”。傅莱告诉柯棣华，我不但怕写，就是说话也出过洋相，有同学问我家乡有无高山，我回答说，不但有，而且比你们这里的山高好几次！在德语里，次和倍是一个单词，而在中文里这两个词却是各有所用。柯棣华听了这个洋相也哈哈大笑。

不过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庆幸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周围有一群乐于助人的中国同志，他们的热情使你不能稍有懈怠。譬如他们房东家的孩子，就常常“逼”他们说这说

那，当然，归根到底还是要有恒心，准备在中国干一辈子。在生活上，柯棣华令傅莱羡慕的事情就更多了。傅莱羡慕柯棣华能穿草鞋，那用草绳或布条编织的草鞋，他穿着是那样的爽贴舒适。傅莱就不行，一穿草鞋脚就打泡。曾经咬牙坚持几小时，害得路都走不了，只好作罢。傅莱还羡慕柯棣华敢吃辣椒，他敢大口吐嚼用以佐饭。那时油少、盐少、菜少，开胃的也只有此物。校长吃，教员吃，傅莱也学着吃吧，可真不如柯棣华来得轻松。傅莱还羡慕柯棣华能睡炕。老乡家的土炕大都和炊灶相通，一日三餐，炊灶的余热便进入主炕底。加之房东生怕冻着这些八路军里的外国兵，每顿都要多烧几把柴，有时考黄了炕席，这如何睡得下？柯棣华就十分适应，哪怕炕再热，再硬，只铺一令席他也能鼾声大作，傅莱就热得睡不着了。

柯棣华这样一位坚强、开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好同志，最终被癫痫夺取了生命，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32岁。他永远活在傅莱的心中。

深深地眷恋中国这块土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接着，傅莱和战友们奉命随开赴东北的中国医科大学北上，同年11月到达张家口，他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医院承担了解放太原和天津战役的战地医疗救护任务。在3年多时间里，他随着解放军转战各地，直至全国解放。

值得一提的是，傅莱到晋察冀参加八路军后，不仅与家乡的女友失去了联系，而且与后来追随他来到上海避难的父母也失去了联系。当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候，傅莱原本可以回到奥地利继续深造，大部分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

主义战士也都先后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父母由于没有他的消息，也只好从上海回到维也纳。但那时，傅莱已经深深地眷恋上中国这块土地，爱上了这里的人们，决定继续留在中国。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临着建设、发展国家的艰巨任务。傅莱和钱信忠等同志从华北来到大西南，深入到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各种地方病及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负责人，重庆卫生局顾问，重庆医学院卫生系教授。

1953年4月3日，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傅莱终于加入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享受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196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傅莱带着妻子前往奥地利探亲，很多人猜测他这次出国肯定不会回来了，然而傅莱不仅如期而归，还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中国住了两年。后来傅莱回忆：“那次回奥地利探亲时，我的亲朋好友也都劝说我留下，我知道留在奥地利也许我会更富有，可是我到哪里去寻找我在中国艰苦岁月中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和友爱呢？”

1962年，傅莱从重庆市调往北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工作。他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为中国医药学文献和信息提供高质量论文，将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西南六大地区的信息联成网络，方便了国内、国际医学信息的沟通。他先后还当选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后，傅莱老当益壮，全身心投入国家的改革发展

热潮之中。1982年，傅莱和同事们引进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研制的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中国建成了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

1985年后，年过花甲的傅莱不再担任单位的具体职务，但是始终关心着中国医学信息和医学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

在去世前不久，傅莱深情地说：“我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我的第二祖国——中国。虽然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只是贡献了绵薄之力，但中国人民和政府却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照顾，我深深地感激这片美丽的土地和这里善良的人民。”

（摘编自本书主编对傅莱的采访记录和李立明主编：《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彼得·迈克斯：从跟着“阿妈”学画到为总统画像

在美国，人们都知道彼得·迈克斯是一个著名画家，但却不知道他最初学画是在中国上海，而美术启蒙老师则是他的“阿妈”¹。

随家人避难上海

彼得·迈克斯于1937年10月19日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家庭。次年，在一片反犹狂潮中，年仅1岁的迈克斯跟随家人来到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上海避难。此后10年，一家人住在虹口提篮桥舟山路霍山路一带。

迈克斯回忆，他们家居住在一幢类似别墅的房子里，那是一幢塔形建筑，房子的一边是佛教寺庙，另一边是锡克教堂，听说那栋住宅大约建于1927年。当时，迈克斯的父亲在离住处不远的舟山路霍山路路口经营一家规模挺大的服装店，每天从家走到服装店也只要10多分钟。

迈克斯记得，清晨，他会看见佛教寺庙的僧侣们用很大的竹毛笔在宽阔的宣纸上练字；晚上，他又会聆听锡克教徒们用优美的旋律诵读经文。这些，都在他儿时的心田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长大成人后的迈克斯一直没有忘记他们一家在上海的

¹当时上海的犹太家庭都将照顾自家孩子的任务交给“阿妈”。



彼得·迈克斯回到上海寻找“阿妈”

避难生活。他经常对人说，虽然那十年是艰苦的，但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因为比起那许许多多在欧洲被杀害的犹太同胞，他们实在是十分幸运的。

跟“阿妈”学画

在上海避难的岁月中，迈克斯的父母请了一位比迈克斯年长八九岁的中国保姆照顾他的起居，迈克斯一家称她为“上海阿妈”。“阿妈”长得很漂亮，她的父亲是一名画师，也是迈克斯母亲的朋友。迈克斯把她看作自己的姐姐，她则叫迈克斯“皮特”，因为生长在画师家庭，“阿妈”喜爱绘画，于是也把这一嗜好带给了迈克斯，成为他绘画艺术的启蒙老师。

迈克斯记得，“姐姐”每天都教他作画和用毛笔写字，特别是训练他如何用腕力握毛笔和作画，后来也训练他快速绘画的能力。当时，迈克斯每天都要画一大摞纸，而他的母亲也很鼓励他，总是把各种绘画的材料放在阳台上，任由他去涂鸦。阿妈每天晚上还带迈克斯看星星和月亮，培养他观察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感，也有利于使他产生绘画的灵感。

除了画画，“姐姐”还带着迈克斯与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其中除了五六名和他一样的犹太孩子，其他的都是普通的中国孩子。“姐姐”想方设法教迈克斯中国话和上海话。迈克斯至今还会用上海话念“1、2、3、4、5……”等阿拉伯数字，这些都是“姐姐”教他的。

1948年，迈克斯随家人离开上海，他与“姐姐”难分难舍，直到船上还哭得很伤心。

近70年来，迈克斯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今日

的成就和‘阿妈’的启蒙和指导密不可分”。

在美国的成功之路

离开上海后，迈克斯一家先去了以色列，后来又到了法国，最终在美国定居下来。现在，迈克斯大多数时间都住在纽约公园大道的一套漂亮公寓里。

经过艰苦奋斗，迈克斯的画技日趋成熟、精通，逐渐成为美国著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在表现名人、政治家、运动员、体育项目以及一些其他的流行文化方面尤其出色，受到公众的欢迎和专业人士的好评。

政界领导人对他的画作更是推崇备至，以致他受邀为一位又一位总统画像。他先后为美国总统福特、卡特、里根、布什等画过像，更为克林顿总统画了许多肖像和广告画，也为现任总统奥巴马画过像。他也为企业和大公司做专业美术服务，如原大陆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200ER的机身特殊图案就是由迈克斯设计的。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十分自豪地说，作为一位当年在上海的难民少年，我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世人，日后成就大业的许多人，是在上海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确实，他的成功之路印证了上海在那段历史中展现出的大爱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故乡”寻找阿妈

自从离开中国后，迈克斯一家便与“阿妈”断了音讯。迈克斯一直十分想念“姐姐”，希望能够再次回到上海，找到他的画家生涯启蒙人。他经常说：“我去过很多国家，不管到哪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认为自己百分之八十是

中国人。”

他在美国有个中国朋友李谦，每次两人会面，他都会念叨小时候在上海的事，每每必提及“阿妈姐姐”。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李谦辗转找到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陈馆长欣然答应帮助寻人。实际上，真正促使他将梦想付诸行动的机缘，是一个类似的成功案例。他在媒体上得知，曾经有一个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维拉，通过纪念馆找到了儿时的邻居，维拉的事例给了他很大的希望。

当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展览时，他向纪念馆赠送了一幅画作，感谢同样遭受战争苦难的上海市民在大屠杀时期对犹太人的善良和包容。当时，他还通过视频连线与上海媒体见面，首次吐露找寻“阿妈”的心愿。终于，在离开64年后，他决定重回上海，希望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寻找“阿妈”。

2012年10月，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上海。10月11日，迈克斯专程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寻找他当年的“阿妈”和“姐姐”。他在发布会上说：“她只比我大几岁，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1948年后，我随家人离开中国，从此与她分别。时光荏苒，满头银发的我如今已是在美国十分成功的画家，而她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现在，我第一次重回‘第二故乡’上海，开始寻找童年在上海避难时的中国‘姐姐’。我甚至无法回忆起她的名字。但她的样子和与我们相处的情景，至今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他又补充道：“如果‘阿妈’健在，应该年过八十了；以下这些信息也许对找寻‘姐姐’是有用的：我当时叫杰克，妈妈叫莎拉，爸爸叫弗林克斯戴尔，她应该记得这些。”

迈克斯还特意前往舟山路附近，希望可以找到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但一番走访后，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经过建设和拆迁，很多街道和建筑他已经记不得了。除此之外，他还带来了几张小时候的照片。他认为，“阿妈”如果看到，肯定一眼就能认出。他还根据儿时的记忆，画了一幅“阿妈”的头像。他反复说：“我非常感谢同样遭受战争苦难的上海市民在那个特殊时期对犹太人的善良和包容，如果能够找到‘姐姐’，我想再抱抱她，就像她当年抱我一样，我希望把她接到美国去安度晚年”。

尾 声

当然，仅凭迈克斯儿时的旧照和一张速写画，要找到“上海阿妈”或许很难。尽管困难重重，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陈俭馆长表示将尽力帮助彼得·迈克斯实现这个愿望。现在，许多人仍旧在上海、在中国其他地方、甚至在中国之外的地方为此努力。

同时，迈克斯已决定在上海开设个人画室，因为这可以“使我经常想起在上海生活的片段，想起我那亲爱的‘阿妈姐姐’。”

（摘编自陈俭、廖光军对彼得·迈克斯的采访资料，文中标题和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魏璐丝

魏璐丝 (Ruth F. Weiss)，于1908年12月11日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是家中独生女儿，父亲当过一家玻璃厂的经理。在维也纳，魏璐丝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27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英国、德国语言和文学，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

对中国萌发兴趣

在大学期间，魏璐丝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的维也纳，经常举办国际艺术展览。通过观看关于中国和东方艺术文化的展览，她对有5 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发生了兴趣，但最初的注意力仅仅是停留在音乐和艺术上。她所喜爱的《大地之歌》，就是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根据一名汉学家意译的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和王维的诗篇谱写的。同时，在参观维也纳的展览会和皇帝的别墅时，她也看到了中国古代名画和中国瓷器，更是对古老的中国艺术赞叹不已。

1929年，由苏联人特瑞提阿阔夫 (Tretyakow) 创作的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万县惨案”为素材的话剧——《中国的呐喊》在维也纳上演。魏璐丝观看后，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文明古

国，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她决定去中国考察一段时间，并准备为几家报纸写一些旅途见闻，时间定为半年。

没想到，她到中国后，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正如她后来讲的：“结果在这里长期扎下根来了，并感到自己也是属于中国的，感到中国的命运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谴责日本侵略 支持中国革命

1933年10月2日，魏璐丝抵达上海。随即写了几篇报道中国情况的文章发回维也纳发表，其中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便遭到日本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抗议。此后，她暂搁写作，到上海一家犹太人办的学校教书，同时着手对中国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来华已多年、正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任职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这年秋天，路易·艾黎带领她参观了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几家小工厂。这次参观，给魏璐丝留下很深的印象：破烂不堪的工厂，没有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条件的生产环境，每天担负10几个小时以上繁重劳动的包身工那面黄肌瘦的身影，手执皮鞭如同对待犯人一样来回巡视的包工头，以及工人在工厂火灾和爆炸事故中丧生的悲惨现场等等……她后来回忆说：“这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使我感到这个社会必须彻底推翻。”为此，魏璐丝放弃了原打算只在中国停留6个月的计划。为了安定下来，她在“国际合作委员会”中谋得一个职位，负责编辑有关教育书目的工作。

1935年前后，魏璐丝结识了1929年初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的美籍女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曾在德国学习过8年，主修德文，研究印度历史和中国民族

主义，对东方文明古国的历史有较深的了解。由于思想上、语言上的相同，使魏璐丝很快同她熟悉起来，并通过她的关系，认识了宋庆龄、鲁迅以及其他中外进步人士。在同宋庆龄、鲁迅等的交往中，魏璐丝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也为她后来在中国的革命经历奠定了基础。

魏璐丝越来越受到史沫特莱的影响，很快便成为史沫特莱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助手。魏璐丝曾一度住进霞飞路史沫特莱的寓所，担任史沫特莱与苏区红军干部秘密会见时的翻译，并协助史沫特莱帮助抗日志士们进行抗日宣传。1935年，中共地下组织以“中国工人通讯社”的名义，在上海和北京秘密出版了《中国经济情况（1934年1月—1935年3月）》的小册子，史沫特莱将满满一抽屉的小册子交给魏璐丝去分发。于是她乔装打扮，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将小册子秘密地投入邮筒和信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12月，要求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魏璐丝受史沫特莱之托采访和报道上海学界为抗日救国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的活动。至今，她仍珍藏着当年她与“上海复旦大学扩大宣传团”进步学生的合影，以及她当年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照片。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热情地支持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还冲破国民党的禁令与封锁，邀请青年学生到她居住的公寓讲述斗争的情况。作为史的得力助手，魏璐丝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和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魏璐丝与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路易·艾黎等人一起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开始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后来她回忆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不是我在讲德语的家乡，而是在远东了解的，这件事虽然出乎意

常，但却令人欣慰。”该小组成员还收集和编印关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展情况的材料，为此买了一台小型油印机，安放在魏璐丝家里。他们自己印刷。编印好材料后，由史沫特莱寄给西方的进步人士或学生组织。后来这些油印材料由美国友人马克斯·葛兰涅区和他的夫人格蕾丝主编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抗日刊物《中国之声》所代替，继续报道有关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

这一期间，魏璐丝在中国的活动，对她未来的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参加抗日战争 加入中国国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魏璐丝就在这一天乘船离开上海，几天后抵达四川成都。她先后在华西大学教德文，在中央大学医学院教英文，并更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在这期间，她帮助美国友人创办了一份英文报纸——《成都新闻》，目的是将国外电台报道的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她参加了战时服务队工作，慰问和护理中国的伤病员。她还在一个由5所大学学生联合组成的抗战服务团中担任顾问，并且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做一些抗战工作。

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初期，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魏璐丝的父母和千百万犹太人一同被关进希特勒的集中营惨遭迫害。出于对法西斯的愤恨和对中国的爱戴，魏璐丝正式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

1943年，魏璐丝由成都来到重庆，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工

作了几个月，后又到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工作，负责制作关于盟军活动的幻灯和照片，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期间，魏璐丝结识了一位中国工程师，并于1943年在成都与之结为伉俪。婚后不久，丈夫即赴美国留学，魏璐丝继续留在中国参加革命活动。

永远扎根于自己深爱的中国大地上

抗战胜利后，魏璐丝回到上海，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1946年，她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纽约与丈夫团聚，并在美国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在此期间，魏璐丝在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但她依然十分关心着中国的事态发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中国台湾。11月，有特派代表伍修权等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安理会，强烈抗议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魏璐丝时常抽空到安理会旁听中国代表的发言，其中伍修权11月28日对美国的控诉和谴责，深深地打动了她，并使她萌发了再回中国的想法。

1951年秋天，魏璐丝在联合国的任联回同期满，她决定返回中国大陆。但是，她丈夫不愿意去。而国民党驻美国使馆官员对魏璐丝重返中国大陆的决定也百般劝阻和刁难，并强行没收了魏璐丝的护照。但魏璐丝前往中国的决心是坚定的，她继续寻求新的办法。1951年底，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带着两个幼儿回到中国，受到了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1953年，魏璐丝向中国人民法院提出与其丈夫离婚的申请，1954年被批准。1955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批准，她第二次取得中国国籍。

魏璐丝回国后，一直工作在对外宣传战线上，相继在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做英文和德文编译工作，并在1961年担任外文出版社的专家。1965年后，魏璐丝一直是《人民画报》社的德文专家。1978年以后，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有关领导要求她不作或少作些日常业务，但她仍每月到编辑部坚持通读和审定每一期德文版《人民画报》的全部稿件。她还坚持为香港《大公报》《东方地平线》等报刊撰稿，宣传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在《人民画报》《中国日报》等国内报刊上，她经常发表文章回顾自己在华多年的感受和见闻。

魏璐丝来华半个多世纪，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挚爱之情，献给了中国人民，献给了崇高的中国革命事业，正如她讲的：“中国就是我的家。”因此，她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她是中国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2月10日，北京国际俱乐部宴会厅灯火辉煌，《人民画报》社在她75岁寿辰时举办了“庆祝魏璐丝同志来华50周年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出席祝贺。1988年12月10日，当她80岁寿辰时，《人民画报》社再次为她举行隆重的庆贺活动，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黄华、雷洁琼、康克清等到会祝寿。

2006年3月6日，魏璐丝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享年98岁。2009年4月25日，魏璐丝墓碑揭幕仪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举行，她终于永远扎根于自己深爱的中国大地上，并且与自己敬爱的宋庆龄主席相邻为伴。

（部分内容源于本书主编对魏璐丝的采访，主要内容摘编自叶丽茶主编：《来自异国的朋友——在中国有过特殊经历的外国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标题和小标题由编者所加，编者还对文字作了若干修改。）

视上海如故乡的犹太 工程师韩布葛

1978年的一天，在民主德国历史名城德累斯顿的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走着一个年约八十、身材瘦小的老人，他口中喃喃地念叨着：“回上海了，回上海了，好到上海探亲访友，好到中山公园打太极拳了。”老者是什么人？他对上海为何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重访上海的心愿又为何如此迫切呢？

他就是德国犹太工程师韩布葛。当希特勒刚在德国上台，犹太人开始遭殃之时，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后在大学教书，在工程界供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外国人纷纷离去时，他不为所动，决意留在上海，继续为新中国工作，成为人民政府的干部，拿一般中国职员的标准工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他不得不离开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就向中国领事馆申请访问上海，由于申请的人多，他苦等了2年，签证方才批准。他喜不自胜，高兴得手舞足蹈。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在狂喜中忘乎所以，不知不觉从人行道误走到车行道。正好有一辆汽车疾驰而来，煞车不住，把他撞翻在地。这次飞来横祸使他股骨折断，腕部重伤，脑部也受了伤，幸亏医治及时，他被救活了。但是，由于受了重伤，他再也无法实现回上海探亲访友的愿望了。他



韩布葛

缠绵病榻,到1982年逝世,享年83岁。

逃离纳粹迫害来华工作

韩布葛的德文原名为汉斯·格奥尔格·阿道夫·汉布格尔(Hans Georg Adolf Hamburger),1899年出生在德国的布雷斯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改名为弗罗茨瓦夫),毕业于汉诺威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成为工程师,曾任职于布雷斯劳城建局。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的歧视、排挤逐步加剧,韩布葛虽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同样难逃厄运。这时,在中国的中国留学生劝他尽快离开德国,告诉他中国正在搞建设,急需他这样的人才,何不前去中国发挥自己的才智。韩布葛听了怦然心动,决心去中国。

1935年8月8日,韩布葛搭乘意大利脱礼爱司脱邮船公司(Lloyd Triestino)的“康梯凡第”号邮轮到了上海,比1938—1941年间大批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早了几年。韩布葛到达中国后,先后在金华的英士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同济大学,以及抗日战争期间迁校于上海租界的苏州东吴大学和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开设土木工程和德文课程,有时还教数、理、化。当时曾任英士大学教务长的朱重光及其夫人王祖蕴,都是德国留学生,在德国时就与他认识。整个抗战时期,韩布葛一直在中国辛勤工作,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

抗战结束后,韩布葛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到上海市工务局任职。上海解放后,他继续在上海市工务局(后改名城市建设局)供职,直到1966年退休。

同事眼中的“书呆子”

韩布葛的同事程世抚称他为“书呆子”。这大概是指他

尽管学贯西中，知识渊博，精通业务，却只知钻研书本，而不懂联系实际，为自身谋求利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犹太人都是长于理财、工于计算、锱铢必较、门槛极精的人。韩布葛却反其道而行之，是另一类的犹太人。

另一个同事金经昌则称韩布葛是“倒霉的外国人”。这句话似乎是指他拿的是中国职工的标准低工资。从他在1952年6月的一份薪给单（当时每半月发薪一次）来看，他领到的薪金是130个折实单位，以当日牌价每个折实单位合人民币5 713元计算，为742 690元即每月不到150万元（当时流通的是旧人民币，1955年3月起发行新人民币，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期物价尚波动时，人民政府为保证人民收入不受物价波动影响，而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在上海，是以粳米、食油、煤球、龙头细布四项日用必需品的前一天的市价折算。

韩布葛的薪给，以他这位得过工程师学位，担任过多所大学教授的外籍留用人员来说，是相当低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据韩的养女说，解放前他除在工务局任职外，还在大学教课，并兼职做一家杂志的编辑。解放后，人民政府机关规定兼职不得兼薪。他考虑再三，觉得工务局是政府机关，工作更体面而牢靠，于是毅然辞去了另外两个待遇更好的职位。他的这种行为，也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犹太人金钱至上的作风大相径庭，反映出他恬淡谦和、随遇而安、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的一面。

还有一个同事王正本和韩布葛都曾在德国读书多年，能自如地用德语交谈。王亲眼看见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深表同情。王、韩所从事的又都是土木工程，专业相同，两人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语言，成为挚友。王在工务局

所住的家属宿舍，在另配房子搬走后就由韩入住。王正本常把中国同事对韩布葛的看法婉转地告诉韩。在集体食堂吃饭时，同事们看到韩总是把荤菜全吃掉，然后再吃素菜，常常素菜也吃完了，饭仍剩下许多，他就吃白饭。同事们啧啧称奇，背后说他“吃相难看”。王把这种看法婉转地告诉了韩，哪知韩毫不买账，说“吃饭是我的自由，我爱怎么吃就怎样吃，别人管不着”。同事们知道了，都笑着说，别瞧老韩为人随和，与世无争，有些地方还真有一股德国人的犟脾气。

兴趣广泛 以“艺”会友

韩布葛不善画画，但是他兴趣广泛，对西洋绘画涉猎颇多，对于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很想了解。由于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国画家王季迁，谈得投机，成为至交。王季迁曾与德国驻上海的文化官员孔达 (Victoria Contag) 合编过一部德华对照本的《明清画家印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颇有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画家中，同外国人接触的很少，与外国文化人上合作编书的可说更是凤毛麟角。

王季迁，又名纪千、己千 (1907—2003)，生于苏州。他毕业于上海的东吴法学院，但对于法律缺乏兴趣，不久就放弃这行职业，而继续专心跟名画家吴湖帆学国画，成为其高足，后又以鉴赏和收藏书画、文物而蜚声于世。他对于传统书画无所不学，而尤其推崇元代的黄大痴、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王原祁，潜心研究其笔法结构，深得个中三昧。

王韩两人的关系极其亲密，以下一例便可为证。王季迁知道韩布葛没有成家，饮食马虎，因此每逢家中烧些好菜，常邀韩去做客。韩布葛特别爱吃王家的红烧肉。王的儿子正值发育年龄，也爱吃红烧肉。因此发生过菜刚端上

桌，两人就抢着吃红烧肉的趣事。

王季迁于1949年移居美国，常住纽约，兼用英文名字C. C. Wang。他曾到美术学校学习毕加索、马蒂斯等印象派大师的绘画方法，以求贯通中西，以西润中，并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创王氏新画法。先将画纸揉团、拈墨、加潮、轻压、放平后，根据纸上出现的不规则乱纹，画出高峰、深谷、流水、丛林，画风发生剧变，成为开拓现代水墨画新领域的先驱，他常到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地办过画展和开设过讲座。他曾任著名的苏富比(Sotheby)拍卖行的东方艺术顾问。他珍藏的中国古代文物，于1990年由该行举办专场拍卖会，并印制了精美的画册。

译书撰文为市政建设吸取国外经验

韩布葛根据当时上海市政建设所需要实施的项目，或前景规划所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选择地从民主德国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择优译成中文，介绍给上海同行。他离开德国不算太久，对德国工程界仍较熟悉，而民主德国的科技水平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数一数二的。他经常逛书店，舍得花钱买书。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的图书，因外汇比价低而价格十分便宜，他这个爱书如命的人便成为福州路上国际书店(后改名外文书店)的常客。他有选择地将其中的权威著作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供同行参考，这在当时的中国译坛上是比较罕见的。

韩布葛的译书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先把原著从德文译成英文，再由上海工务局的同事韦国英和李学海转译成中文。韦、李两人通晓专业，谙熟英语。韦与韩合译了6种，李与韩合译了1种。这7种译本都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这家出版社创立于1956年，而韩布葛等人的译本从该年4月起就陆续问世了。韩布葛与该社合作出书的经过是这样的：韩写英文信去毛遂自荐翻译选题，而当时该社总编辑顾济之也是学土木工程的，韩推荐的选题又符合该社的总体出书方针，故一拍即合。韩的信是由该社请同济大学教授翻译，以后的译稿也是请同济大学审定的。

韩与韦、李合作的7部译作是克拉特 (K. Klatt) 的《人造雨》，希姆里克 (F. Schimrigk) 的《雨水处理》，殷霍夫 (K. Inhoff) 的《城市排水工程和污水处理》；维希曼 (A. Wechmann) 的《实用水力学》，舒尔塞 (W. E. Schulze) 的《基础建筑工程》，奥森道尔夫 (C. Aussendorf) 的《隧道建筑》，勃劳泰尔 (H. Proetel) 的《水下隧道的设计和施工》。这些书从原著在德国问世，到运销上海发售，再经过德译英和英译中的两道过程，又经过出版社编辑的审稿、发排直至付印，共历二三年时间，这样的出书速度，在当时算是快的。这些书中，有几种后来均再版，《基础建筑工程》曾发行到第4版，说明是符合市场需求的，颇受专业人士欢迎。《城市排水工程和污水处理》的作者殷霍夫，发明了双层沉淀池，闻名世界，得到广泛使用。韩布葛等的中文译本是根据原著第15版翻译的。

韩布葛除了翻译工程专著以外，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在赵祖康主办的中文版《工程界》上，发表过谈海港建设的文章。港口和涵洞的建设是他的强项，

他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所负责的，也是港口的规划。他在上海的一本英文版季刊《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 的“工程”栏内，发表过论述鲁班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中国古代这位创造攻城云梯和相传发明木作工具的建筑工匠推崇备至，把中国这位无人不知的能工巧匠介绍给世界。

一丝不苟 知识渊博

韩布葛的工作札记，从一个侧面显出他治学的严谨，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

他的札记是把中文著作，如华东水利部编的《涵洞设计参考手册》等译成英文，再加以记录。其中有人名、地名、山名之处，他都一一加注中文，如“郦道元”“郭璞”，以及太湖流域的诸山“虎丘”“灵岩”“天平”“凤凰”“穹窿”等。他的字写得一丝不苟，横平竖直，但呆板而不灵动，一望而知是用功的外国人毕恭毕敬写出的中国字。

韩布葛读书认真，买书也同样认真。他买书有一个特殊要求，凡学术书而不附有索引的，他绝对不买。索引就是把书中的项目或内容（人名、地名、事件）摘录下来，每条下面标明出处页码，按一定次序排列，以供读者检索。他常说，学术书如果没有索引，读者想知道某人、某地、某机构、某事件出现在书中何页，出现过几次，又如何能按“引”索骥，一查即得呢？

韩布葛具有高等学历，他的土木工程技术具有扎实的功底和多年实践的经验，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不仅科学、技术，而且对文、史、哲和音乐美术，无不涉猎。在语言、文字方面，他来华前就通晓德、英、法文和古典的拉丁、希腊文，来华后又学习了中文，不仅会读书报，而且能读懂比较通俗的名著，如《三国演义》等。

半百成家琴瑟和谐

经过工务局一个女同事的介绍，韩布葛认识了雷文秀女士并与之结了婚。婚礼由韩的好友王正本操办，王并请到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为证婚人。又由于韩在上海没有亲

人，王还当了主婚人。韩当了半辈子光棍，饮食起居无人照顾，邻居看到，他的袜子破了，总是自己笨手笨脚地穿针引线乱补一通。一直过得是“衣裳破了无人补的王老五”生活。结婚之后，他的生活顿起变化。雷文秀是一位住在上海的湖南籍家庭妇女，她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烧的辣味湘菜很对韩的口味。韩虽是犹太人，但来到中国多年，早已入境随俗。因此雷在做菜选料方面有绝对的自由，可以充分发挥她的厨艺。

雷文秀只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夫妻在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上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在语言沟通方面，两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韩虽然会说中国话，但毕竟说得不太好，尤其在需要表达复杂情况或细微差别时，总是感到词不达意，以至常常闹出笑话。尽管如此，夫妻互敬互爱，琴瑟和谐。遗憾的是，他们结婚后未曾生育，家庭中没有孩子，生活不免单调冷清。于是，他们领了雷的妹妹之女曹外英为养女。孩子为他们带来了生气和快乐。后来孩子上学学习汉语拼音时，韩还拜她为师，跟着学习。凭着她谙熟欧西多国语言之发音的经验，他学习汉语拼音不久就青出于蓝，超过了女儿。女儿长大结婚，仍住在家里，并生有一子一女，从此家中就更热闹了。韩一向独自睡一张床，爱整齐、干净，从不让别人去碰自己的床。但自从有了外孙、外孙女后，韩却任凭孩子在他的床上尽情爬滚嬉戏，不以为忤，含饴弄孙，怡然自得。

“文革”浩劫 被迫离去

韩布葛从新中国成立前起，迄至“文化大革命”，一直供职于上海工务局，直属上海市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工务

局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直属的机关单位，例行的政治学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韩是外国人，领导并不要求他参加政治学习，因而他对政治和历次运动都懵然不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起，遭到冲击的个人和家庭不计其数。出乎意料的是，不论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居然都未曾对这一家人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地逃过了这场浩劫的高潮。然而，韩家尽管平安无事，却从此宾客绝迹罕至，门庭冷落。天性喜欢交友，尤爱神侃的韩，这时寂寞无聊。他想，人家既不上门，他就上人家去串门。妻子劝阻他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危，你就不要去找人家，给人家添麻烦吧！”经妻子一再苦谏，他只好不再去寻访亲友、同事。

后来，韩布葛又想，自己又不便到别人家里去串门，那么到公园去会会拳友总是可以的吧！他打了多年太极拳，练的是杨式，日长月久，颇有心得。他经常去的地方是离住家延安西路不太远的中山公园，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拳友，互相切磋，交流经验。然而“文化大革命”以来，情况大变，拳友们见到他都避得远远的，有时即使迎面遇上，也是勉强点一下头，便急急地走开了。这使他大惑不解，也十分愤懑、寒心。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些人，为何一下子就翻脸无情，如同路人呢？他向妻子诉苦，妻子劝慰说：“现在大家害怕，唯恐沾上一点海外关系引火烧身，你又是外国人，人家岂能不躲着你，你说是吗？”他在道理上虽然被说服了，但在情感上却始终不能接受。他百无聊赖、彷徨无主，在苦熬了3年之后，终于凄然地萌发了离开中国的念头。

在这之前，韩布葛在上海工程界的资历、贡献、名望，久已为圈内人耳熟能详。民主德国方面，曾在1955年和在

1960年两次邀请韩回德国去教书，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这时，韩主动表示想回德国，民主德国方面自然乐意，并安排他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任教，尽管无论按照中国抑或民主德国的规定，他都超过了退休年龄。

回沪探亲

韩移居德累斯顿以后的4年内，生活安定，环境舒适，但他仍时常思念起上海。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半辈子的地方，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养女、女婿一家和两个可爱的外孙子女。韩布葛决意携妻子回上海看看。

韩布葛夫妻在1972年9月底回到上海。那天下午，外孙在幼儿园还未放学，老师告诉他家里有人来接他，说外公来了。孩子不信，瞪大着眼睛说：“我哪里有外公？我从来没有外公！”老师说：“你不但有外公，而且还是从外国来的呢！”孩子听了更加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的养女对于自己与韩的这层养父女关系，一直担心害怕。别人有了丁点儿海外关系，弄得不好还会引火烧身，更何况养女与韩的这重关系非同一般，在“文化大革命”中常使她寝食难安。韩夫妇走后，养女在这方面如释重负，但仍怕两个孩子随便乱说，祸从口出。于是，她和丈夫相约，在孩子面前绝口不提外公、外婆之事，再加上外公、外婆走时两个孩子都只有一两岁，久而久之，印象淡薄，早已想不起有过外公、外婆了。

之后，韩布葛夫妇又到杭州去探望了同事和好友王正本家。王对于韩的突然造访，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久别重逢，可以叙谈别后，惧的是“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6年，阶级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他生怕因为

同外国人有接触而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在当时的杭州，外国人比在上海更为少见。于是，王赶紧向组织上汇报，得到同意后才和韩见了面。

韩布葛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归来，他们夫妻居然被“革命委员会”奉若上宾，应邀到人民广场观礼了国庆游行盛况，令他啼笑皆非。

尾 声

韩布葛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身材很矮小，因为发育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食品匮乏，导致营养不良。这是战争造成他的终身遗憾，而他的弟弟和妹妹体格都很高大。

韩布葛一贯倾向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两德分治，他在中国所持的一直是民主德国的护照。后来联邦德国赔偿犹太人损失，分别居住在南非和英国的弟弟和妹妹都去联邦德国领取给父母的抚恤金。趁此机会，他与弟、妹相约在西柏林会见。劫后重逢，恍如隔世，不胜喜悦，又念及父母惨死于纳粹魔掌，尸骨难觅，他们不禁悲从中来，抱头痛哭。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韩布葛静极思动，急于想重返上海，探亲访友。他的签证在1978年被批准，却不幸遭遇车祸，造成终身残疾，始终未能圆上再回第二故乡之梦。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就是这惨痛感人的一幕。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编者对文字和小标题作了调整和修改。）

犹太难民中的比较语言学 专家罗逸民

本文的主角是奥地利犹太人埃尔温·赖夫勒 (Erwin Reitier, 1903—1965), 汉名罗逸民, 祖籍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区。从1932年到1947年, 罗逸民除1938—1940年在香港工作外, 一直在上海做教学和科研工作。罗逸民是一个颇有政治远见的人。纳粹党于1933年在德国夺权后, 他预感到与德国同文同种又毗邻的奥地利有被希特勒兼并的危险, 虽远在上海, 却毅然主动放弃了奥地利国籍, 而成为无国籍侨民。后来, 他又干脆把寡母和一个妹妹接到了上海。果然不出他所料, 到1938年4月, 虎视眈眈的纳粹德国就一举鲸吞了奥地利。当成千上万被剥夺了国籍的德奥犹太人逃来上海避难时, 早已没有国籍的罗逸民及其家人也成了“无国籍难民”群体的成员。

尽管命运坎坷, 罗逸民在教学、科研领域却成果卓著, 被誉为“比较语言学的国际权威”。

罗逸民讲比较语言学: 析“瞳”解疑

20世纪40年代, 在上海震旦大学¹的讲台上, 罗逸民教授正在讲授比较语言学。讲者侃侃而谈, 学贯西中, 广征博引, 言人所不曾言; 听者全神贯注, 闻所未闻, 兴趣盎然, 思

¹ 震旦大学是马相伯在1903年捐资、捐地兴办的, 初名震旦学院。以后学校管理权为法国天主教会取得。1952年院系调整, “震旦”停办。在原址上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 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近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



罗逸民

路为之大开。罗逸民讲的是在汉字与若干外国文字中，有些字眼的构词方法异常相似。

罗逸民说，英文的pupil，既是“学童”又有“瞳孔”之意，而拉丁文、古希腊文、古希伯来文乃至日文，也无不存在一个字眼兼有同样数个意思的现象。罗逸民接着提出了问题：这么多在地域上相隔如此遥远的各族文字，要说它们在这个字眼上共有一个来源，或一个民族借用另一个民族的单词作为外来语，都是说不通的，这个问题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罗逸民谈了自己对此的解读。他说，他读到汉字中的“瞳”字，发现“瞳”字将“目”加“童”，是有其含义的。他解释道，一个人若朝另一人望去，对方“目”中的小小人像就是“童”，也就是自己的缩影，这便是“瞳”字的由来。汉字的这种构词法，使他豁然贯通，联想到西方的某些单词，可能也是如此构成，从而破解了一些困惑他多年的疑团。

罗逸民对“瞳”字的解释，虽与《说文解字》所说不同，但言之成理，是具有新意的独到见解。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字，则可将之作为恢复史前人类思考方式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史书中关于“瞳”的传说，最著名的要数“帝舜和项羽都有重瞳子”了。《史记·项羽本纪》作“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但《汉书》在叙述同一故事时却径直把“童”字假借作“瞳”，由此更可见出这两字的直接关系。

除此以外，罗逸民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洋”字，从“水”、从“羊”。他的解释是，大批“羊”群在奔跑时，宛如洪“水”泛滥，波涛汹涌，故而“洋”字从“水”、从“羊”。他

说，在古希腊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中，同一字眼都兼有“羊”和“波涛”的意思。而在非洲之尼日利亚和苏丹的豪萨人所用的文字中，这一字眼则兼有“骆驼”和“波涛”之意。而英文中的white horse一词，则兼有“白马”“白浪”之意。总之，只要是大批动物在成群地奔跑，不论是羊，是马，是骆驼还是别的动物，都会令人联想起波浪滔天、汪洋一片的壮阔景象。

罗逸民就是这样讲解比较语言学的，难怪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名师出高徒：罗逸民的老师罗斯托恩

罗逸民的老师是著名的奥地利汉学家罗斯托恩 (Arthur Edler von Rosthorn, 1862—1945)。

罗斯托恩汉名纳色恩，毕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他又是一位经历丰富的海关专家和外交官。他1883年到中国海关工作，直至1895年。1895—1906年，他历任奥匈帝国驻华使馆秘书、代办、参赞。1911—1917年，他出任奥匈帝国驻中国公使。从1883年到1917年，他在中国任职的时间长达30年。

奥匈帝国瓦解后，罗斯托恩回到祖国奥地利，任维也纳大学汉学教授。他辛勤耕耘，写了有关中国历史、经济、宗教、社会的诸多专著。

1986年，奥地利政府设立了以他命名的勋章，以表彰为发展奥中关系、增进奥中友谊而作出贡献的奥中两国人士，先后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的王殊和杨成绪两位外交官，就曾获得该项殊荣。

罗逸民同他的老师罗斯托恩一样，也是由研究比较语

言入门。逐步感到需要深入学习中文，进而成为汉学家的。他在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就是研究中国政府的。对于他的中文水平，罗斯托恩教授曾经大为赞赏。

罗逸民在华的其他工作

除了教授比较语言学外，罗逸民还做过编辑，研究过铁路管理，教过德文、拉丁文和中文，他的所有这些工作或是在中国做的，或是直接与中国有关。

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前，罗逸民就已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1927—1928年，他担任中国通讯社驻欧洲的编辑。1928—1930年，他是中国政府通信机关驻德国、奥地利的工作人员。1932年，他出任国际联盟派驻上海的奥地利籍顾问的助理。

当然，罗逸民主要的工作还是教书，除1938—1940年在香港工作外，他一直在上海的多所大专院校任教。1932—1937年，他在交通大学教德文。1940—1941年，他在上海国立医学院¹兼教德文和拉丁文。1941—1942年，他又到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²兼教德文和拉丁文。当时，医学院和药学院在培养学生行医和制药时，都要用到许多拉丁文，因此都设有医用拉丁文课程。1943—1947年，他在震旦大学教汉学和比较语言学。此外，他还开设业余中文班，教授侨居上海的外国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交通大学期间，罗逸民除教德文外，还为该校搜集和整理了所有的有关奥地利铁路的资料，并将其译成中文。在后来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实行路政改革时，这些资料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罗逸民有时也写一些小文章在报上发表，如他在震旦

¹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国立医学院先后更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现与复旦大学合并。

² 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设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是上海第一所系统培养药剂师（当时称药师）的学校。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制药厂信谊药厂，和颇有名气的新亚药厂，大部分药剂师都是该校毕业生。校舍原为德国人的宝隆医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把该处房地产赔偿给法国。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药专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在药专的校址上建立了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大学教授汉语和比较语言学期间，就在1944年3月25日的《申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该校图书馆及其丰富的藏书。

罗逸民热爱中国文化达到痴迷程度

罗逸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痴迷，从以下几例便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出来。

罗逸民的学生傅景常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交通大学就读。当时交大除英文是第一外国语为必修科目外，另设法、德、日文为第二外国语，是选修科目。傅对德文有兴趣，跟罗逸民教授学了一年德文。据他回忆，罗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讲课时非常幽默。有一次，他问学生：“中国最有名的猴子是谁？”学生面面相觑，回答不出。罗笑着说：“是孙悟空呀！”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傅景常还记得，罗逸民的母亲逝世时，罗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如下讣闻：“不孝逸民，不自殒歿，祸延先妣，谨此讣闻。”署名是“不孝罗逸民泣血稽颡”。这种讣告固然是中国丧家惯用的套语，但也是见他对中国风俗礼仪的熟悉。

罗逸民对中国文化的深爱，甚至表现在他身后。他留下遗言，在他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墓碑上镌刻《论语》的语录：“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这句话出自《论语》第17篇“阳货”，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向他的请教。碑文用钟鼎文镌刻，古意盎然。在遥远的美国太平洋之滨的西雅图市，在一位犹太教授的墓碑上，居然见到记录孔子言行的经典著作《论语》的章句，不能不令人对这位终身潜心探索中国文化的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据罗逸民夫人告知，罗因严重心脏病住院，临终前接到

学生的来信，信中用大篆书体写了上述的一段《论语》，罗见了十分喜欢，就要求将这段话作为遗言刻在自己墓碑上面。

罗逸民协助黄伯樵改革铁路路政

黄伯樵留学德国，获得特许工程师（相当于硕士学位）。从20世纪30年代之初至1937年，黄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当时“京”指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该局简称“两路局”。

黄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并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包括来自上级的不正之风。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经常来往南京与上海之间，要两路局为他专门挂花车，却迟迟不付款。黄伯樵敢于要两路局派人上南京到财政部按章收账。此事经《申报》披露后，百姓无不称快，称赞两路局和黄伯樵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在对外方面，黄伯樵不畏帝国主义列强，力争国权。当铁道部向上海市政府借调他出任两路局局长时，操纵该局财政大权的英国银团久闻他在市政府工作时对外国人和租界当局态度十分强硬，因而极力反对，但最终未得逞。两路局的会计处和工程处都由英国银团把持，铁路所需器材一律须向英国购买。英国人作风保守，对于改革措施一概反对。黄伯樵不予理会，兴利除弊，取消不合理的制度，大力发展货运，积极改善客运，使铁路收入逐月增加，促成两路局萎靡不振的债券在伦敦股票市场空前高涨，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银团无法再对黄持反对态度，转而主动促成英国向中国继续贷款，用来建造对铁路交通非常重要的钱塘江大桥。

罗逸民与黄伯樵有过几度合作，一贯对黄全力支持。

在黄伯樵代表建设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到德国柏林出席世界第一次动力会议，以及随后在欧洲考察铁路时，都由罗逸民担任顾问和翻译。对欧洲铁路的考察丰富了黄在这方面的直观认识，再加上研读了罗为交通大学搜集和加工整理的所有有关奥地利铁路的资料，使黄对如何进行路政整顿、改革成竹在胸，形成全面的规划。经过黄的锐意整改，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的路政蒸蒸日上，客旅称便，众口交赞，声名鹊起。此后，两路局与青岛铁路局成为当时全国的模范铁路局。

罗逸民在编纂《德华标准大字典》中的重要作用

罗逸民与中国德文界众多学者、教授共同编纂的《德华标准大字典》，是上海乃至全国德语界的一件盛事。

这部16开本、1300余页篇幅的中型偏大的德华字典，经马荫良、许元方倡议编纂，得到黄伯樵、吴之翰、陆振邦、罗逸民的响应、支持，于1943年7月专门组织德华标准大字典出版社于明复图书馆（现名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内开始运作。原稿在4年内完成，并在1944年就进行了发行预订。但因国内政局变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原定出书计划一再延迟，直至1950年7月才得以正式出版。

由于大字典编纂者熟悉国内学习德文者的一般困难之所在，而能使其适合国人的需要。读者在查阅一字之时，随即即可获得所期待之答案，既节省时间，又增加兴趣。编者对单字的译意、文法、发音以及音节分隔，都根据各种德文原本的字典和百科全书详加考核。全书专门名词的译意，以及人名、地名的译音，均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因此，具有以上优点的大字典深受读者欢迎。单从1953年1月至1956年

5月，该书就重版过5次32开的缩印本。1957年，该书再版了16开的精装本。据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社长马荫良告知，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他曾主动放弃版权所有，以降低该书的成本。1979年11月，香港三联书店印行了海外发行的版本。《德华标准大字典》从1950年问世以来，一直是德语界专家、学者、教授、学生案头所备的参考用书，历时30余年不衰。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新编的《德华词典》问世，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漫长的一代人的岁月中，这部辞书为我国德语学习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部书主要是中国众多学者、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凝聚着后来蜚声世界的犹太学者罗逸民的心血。参加《德华标准大字典》编纂工作的人员，除罗逸民以外，还有黄伯樵、朱公谨、吴之翰、邱锦淇、晏华璋、陆振邦、陈蜀琼、戴鸣钟等十余人。他们都是留学德国归来的专家、教授。如上所述，黄伯樵曾在德国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做过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朱公谨是交通大学数学教授和光华大学副校长；吴之翰是结构力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晏华璋是讲授建筑学的教授；陆振邦教授力学，在抗日战争前曾任同济大学附中校长；陈蜀琼是法学教授；戴鸣钟是经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机械学院副院长；邱锦淇是一位医学专家。

担任主编的黄伯樵，在民国初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过一部德华字典，但未竟全功而离去，后在别处继续完成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独立所编的德华字典，但他本人对这部字典并不满意。德华标准大字典出版工作开始后，黄伯樵轻车熟路，担任字典主编，为众望所归。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奥、瑞士三个德语国家与中国之文化交流断绝，多亏黄以其历年所藏之参考资料百余种捐赠，供给编纂工作借鉴。黄因其他职务繁忙，仅能以余暇负责对外联系和最后审稿。1948年2月的一天，黄在下班后仍力疾从公，到字典的名誉编辑德国人梅亚家，商讨字典事宜，不料心脏病突发，猝死在主人的客厅里，赍志以终。除他之外，长期担任编纂工作的还有朱公谨、吴之翰、陆振邦、陈蜀琼、戴鸣钟5人，尤其是后面的4人承担了主要工作。

罗逸民在编纂工作所起的作用是很特殊的，与其他编辑恰可相辅相成。从上述编辑队伍可以看得，大多数人都是学习理、工、医、法、经济各科的，没有人读人文艺术类学科。罗逸民却是读汉学的，通晓中文和多国语言文字，又专攻比较语言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缺。而且，《德华标准大字典》以Muret Sanders的德字为主要蓝本，其编纂工作更需有精通德、英、中三种文字的人才能胜任。马荫良生前曾说，集体审稿是由黄伯樵、许元方及马本人在罗逸民家中进行的。为此，出版社为罗逸民置备了英文版的《韦氏大字典》，还要木匠在他家专门定制了一张台面倾斜、摆放大开本书籍用的读书桌，由他根据各种字典对存在争议的某些单词的确切含意详细阐述，以供大家讨论决定。这样的讨论研究，对于斟酌推敲用何中文准确、简括地表达出德文词汇尤其是语词类词汇的原义，更为全面、可靠。

担任德华标准大字典出版社社长的马荫良，又是《申报》的总经理，也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外甥和得力助手。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他继任总经理，秉承史进步、开明的方针办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先后到武汉和香港，在那里办了《申报》的汉口版和香港

版。回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后，他又以美商的名义复刊了《申报》。办报时间长达78年的《申报》，被称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马荫良将大字典出版社设在明复图书馆，那里原来是中国科学社¹图书馆，落成于1931年，后因纪念游泳溺水、英才早逝的数学家胡明复而更名。德华标准大字典出版社设在明复图书馆的二楼，后来又在原本三层楼的顶上加盖了假四层，使办公场所更为宽敞。需要一提，暗中襄助大字典工作的，还有一位开设荣丰纺织印染厂的章荣初。他隐名捐助款项，对参加编纂者每人每月发放黄金一两（俗称“小黄鱼”）。他的用意是使这些人可得到一些报酬，不要为谋生计而被日伪方面利用。

饱受磨难的罗逸民一家人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罗逸民的家人。

罗逸民的夫人本名亨里埃塔·布朗 (Henrietta Brown)，是罗讲授中文班上的学生，师生相恋成婚，婚后住在亚尔倍路（今陕西南路）、近蒲石路（今长乐路）口。后来，罗逸民夫人曾在清心女中²教英文。罗逸民夫妇的婚礼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拉希尔犹太会堂 (Ohel Rachel Synagogue) 举行，由备受尊崇的上海犹太社团首席拉比梅耶·阿什肯纳兹 (Rabbi Meier Ashkenazi) 主婚。这座会堂巍峨典雅，是上海的犹太富豪雅可布·沙逊爵士 (Sir Jacob Sassoon) 为纪念亡妻而捐巨款在1920年建成的。

罗逸民的岳父门德尔·布朗教士 (Reverend Mendel Brown) 1932年来沪就任上海犹太学校校长，同时又是拉希尔犹太会堂的兼职拉比。上海的犹太子弟，多数就读于这所犹太学校，后来赫赫有名的迈克·布卢门撒尔 (Michael

1. 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由胡明复与任鸿隽、赵元任、周仁、秉志、杨杏佛等在美国发起成立，随后又有胡适、竺可桢、侯德榜、叶企孙、曾昭抡等参加。1917年，该社由美国迁到上海，影响巨大，社员发展到数百人，其中有许多都是中国现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奠基人。马荫良和罗逸民都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2. 清心女中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于1861年，英文名 Mary Farnham School，是上海创办最早的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先后改名上海市立第八女中和第八中学，校址至今仍在陆家浜路。

Blumenthal) 就是其中之一。¹ 在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以前，上海就有两个犹太社区，即塞法迪犹太人 (Sephardi) 社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Ashkennazi) 社区。塞法迪犹太人原指西班牙犹太人，后泛指西亚和北非的犹太人。在上海，著名的沙逊 (Sassoon)、嘉道理 (Kadoorie)、哈同 (Hardoon) 等富豪，都来自西亚的巴格达，属塞法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指欧洲犹太人，后泛指从欧洲进入俄罗斯、北美、澳大利亚等地的犹太人，居住在上海的多数是其中的俄罗斯犹太人。起初，塞法迪犹太社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区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有时还产生摩擦和矛盾。布朗教士是英国犹太人，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奉派到上海，主持塞法迪犹太人社区建造的拉希尔犹太会堂，又是该社区成立的上海犹太学校的校长。因此，他与两个社区都有较好的关系。利用这一有利地位，他发挥了“桥梁”作用，做了许多沟通和协调工作，促进了两个社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了解。

1938年8月后的数年中，有20 000多名德、奥犹太人逃来上海。稍后，在1941年夏秋，又有1 000多名波兰犹太人来到上海避难。犹太难民的来到，使上海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数量大增。犹太难民来到后，门德尔·布朗又积极投入救助难民工作，并在两大社区的救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前已提到，罗逸民是一个颇有政治远见的人，因预感到奥地利有被希特勒兼并的危险，毅然主动放弃了奥地利的国籍，而成了无国籍难民。不过，他夫人家却具有英国国籍。因此，与在上海的大多数犹太人相比，罗逸民一家在即将到来的大劫难中的遭遇是很特殊的。

¹ 布氏于1939年随父母逃难来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美国，在卡特总统任内曾担任财政部长，在当时发行的美元上有他的签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公共租界，1943

年2月又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划定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强迫1937年以来从欧洲来上海的“无国籍难民”（即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罗本人因为在30年代初就定居上海，不属于日本人规定的“1937年以后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必须迁入隔离区之列，而得以居住原地不迁。但罗夫人却由于是英国籍，属于日本人所认定的“敌性国侨民”，而不得不带着3个孩子，住进愚园路的敌侨集中营，日本人美其名为“Civil Assembling Center”（“平民集结中心”），以掩人耳目。集中营的旧址，就是今日的市西中学所在。

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随即占领租界，为什么事隔一年多后，才把美、英、荷兰等“敌侨”关进集中营呢？这个行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原来，美国于珍珠港遭受重创后，十分担心日本进攻美国本土，为防止在美国的日本人做内应、当间谍，就防患于未然，坚壁清野，把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三个州的日本人，包括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所谓“一世”“二世”日裔，一律强制疏散到内陆的科罗拉多、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各州，集中管理。于是，日本便以牙还牙，采取报复措施。把上海的“敌侨”关进集中营，将他们居住的好房子分配给日本人使用。

就这样，罗逸民这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活活拆开，妻离子散达15个月之久，罗逸民的小女儿就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在此期间，罗逸民虽仍然可以自由行动，但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妻子和子女出事，而罗夫人在拘留营中要照顾孩子，还挂念丈夫，日子十分难熬。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平民集结中心”宣告结束，罗逸民一家才得以团聚。¹

¹ 在此之前，日本曾将所拘留的“敌侨”与盟国所拘留的日本侨民进行过若干次交换，罗逸民家属是否在交换人员之列，尚无从查考。

最后的历程：罗逸民在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逸民举家前往香港，不久又去美国，于1947年起定居西雅图。他先后在该市的华盛顿州立大学之远东与斯拉夫语言系、文学部的中文系担任访问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他开设的中文课程包括钟鼎文和甲骨文，这是汉学中一门非常冷僻、艰深的课程。

1956—1960年和1961—1963年间，罗逸民经过潜心研究，首创了用机器从俄文译英文和从中文译英文的方法，而成为机器翻译在世界领域内的8位先驱者之一。罗逸民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古代中国和世界上多国的度量衡制度进行过研究。他还对《圣经》中所述的所罗门王所造宫殿及其他希伯来建筑进行研究，还对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宫殿之遗址进行勘查，也对王莽¹的谷物量器“律嘉量”进行研究。1984年，格里芬（H. J. Griffin）根据罗逸民在这方面的研究札记，编纂了《比较度量衡学史》（*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etrology*）一书。

罗逸民也曾与包括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多位世界名人通信，探讨各种问题。

需要一提的是，在长住西雅图期间，罗逸民夫人对曾居住在中国的西雅图犹太人进行了采访，并将采访到的30人之口述历史，连同他们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由华盛顿州犹太历史学会出版，保存了珍贵的史料。²

罗逸民在上海的外国友人中，有一位汉名魏特夫或魏复光的学者（原名：Karl August Wittvogel），原籍德国，1935年来华。他与胡适、陶希圣相识，研究中国的社会与历史。他后来也去了美国，先后在太平洋学会和社会问题研究所

¹ 王莽在西汉末年（相当千公元初年）毒死皇帝，后又篡位自立，改国号为新朝，复古改制，屡次改变官制、币制和其他制度，加深百姓苦难，后为起义军所杀。

² 可参见美国华盛顿州犹太历史协会编，《简报》，（Washington Stat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ed. *Bulletin*, Seattle, U.S.A.），美国西雅图出版。

任中国史教授及所长，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中国史教授。

罗逸民到西雅图后，也在该校任教，老友再次相逢。在此期间，魏特夫用德文和英文撰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多种。

罗逸民与魏特夫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一个研究古代，一个研究当代。两人在上海相识，又在西雅图成为同事。魏本人不是犹太人，但妻子是犹太人，而罗夫妇都是犹太人。因此，罗、魏两家过从密切，晚年罗逸民也有了 一位可以经常谈论中国和上海的老友。

1965年，罗逸民在美国西雅图去世，享年62岁。如前所述，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他十分喜欢的、引自《论语》的一段话：“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摘编自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编者对标题、文字、注解和小标题作了调整、补充和修改。)

热爱中国的职业革命家和优秀摄影家叶华

叶华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女摄影家，中国著名诗人萧三的夫人，中国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充满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

与萧三结为终身伴侣

叶华原名耶娃·桑柏格尔德，与萧三结婚后改名为耶娃·萧(Eva Siao)，但人们都用她的中国名字“叶华”，因为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好记。

叶华1911年11月8日出生在德国东部小城布莱施劳¹的犹太人家庭，当时该城有一个人数众多的犹太社团。不幸的是，在叶华出生的第二年，她那当医生的父亲就病逝了，是她那爱好摄影艺术的母亲与叶华兄妹俩相依为命，使叶华度过了充满幻想的童年。17岁时，叶华在布莱施劳上完小学和中学，考入慕尼黑电影学院，攻读摄影专业。毕业后她迁居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同哥哥生活在一起，并在一家照相馆当摄影师。

在斯德哥尔摩，叶华接触了不少共产党人和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执政，随即展开疯狂的反犹运动，叶华故乡布莱施劳的犹太

¹ 布莱施劳在二战后划归波兰，改名为弗罗茨瓦夫。

人也惨遭迫害，使叶华心中充满愤恨。这时，她心中萌发了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一看的想法。

1934年10月，叶华到了苏联南部的黑海之滨观光旅游，领略那里大自然的风光。也许是艺术的魅力所致，叶华在那里结识了正在出席苏联作家代表会议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这两位艺术的崇拜者一见钟情，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于当年结成伴侣。1935年，纳粹德国颁布的纽伦堡法案剥夺了所有德国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叶华成了无国籍难民。正是在那一年，叶华正式加入了苏联国籍。

在延安参加反法西斯大会

1939年春，萧三返回革命圣地延安，叶华这位中国的“儿媳妇”带领未满周岁的孩子从苏联回到瑞典。1940年八九月间，叶华离开瑞典，穿过苏联，进入我国新疆，到达西安。不久，她在萧三的亲自护送下到达延安，实现了追随丈夫到天涯海角的心愿。叶华抵达延安后，受到了萧三的同乡和同学毛泽东的亲切接见，¹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保育顾问。此后，她到延安抗日小学和幼儿园工作，贡献了她在儿童教育和妇幼保健方面的聪明才智。

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也表示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并将犹太民族视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重要盟友。二战期间，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用了大量篇幅对欧洲犹太人的境况作了报道，对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暴行给予揭露和抨击。

194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主持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叶华作为犹太民族的

¹ 参见耶娃·萧(叶华):《世纪之恋——我与萧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叶华(右)与丈夫萧三合影

代表应邀与会。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关注和对他们反法西斯斗争的声援与支持。在代表大会前夕，延安《解放日报》对叶华进行了专访。她在采访中指出，“德国的犹太人，受希特勒压迫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谁能否认犹太人在科学上的贡献呢？尤其是在医学界的地位。”她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灭绝种族的罪恶行径：“为了不让犹太人的血液溅污了‘优秀的’日耳曼人种，所以下令对大批犹太青年处以宫刑。”她号召全世界犹太血统的资本家和犹太血统的工人团结一致，彻底消灭法西斯。¹

10月26日，盛大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组成了包括毛泽东、蒋介石、朱德、宋庆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犹太名人爱因斯坦等在内的名誉主席团。²叶华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全世界二千万犹太民族，都认识到希特勒就是犹太人的死敌，我们愿以坚决的斗争消灭这一批人类害虫。”在大会闭幕式上，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旨在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意日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叶华也当选为联盟执委。³

为新中国勤奋工作

1943年冬，叶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苏联，先在哈萨克共和国以照相谋生，3年后回到莫斯科，旋即前往乌克兰，继续从事摄影工作。

1949年春，萧三随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在那里与叶华及两个孩子重逢。同年夏天，叶华及两个孩子随萧三回到北京定居，开始崭新的生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¹ 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6日。

² 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³ 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日，
参见前引叶华书。

1950年春天，叶华担任了新华社摄影记者。从此，她以对新生活的无比热爱和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追求，不辞辛苦，几乎每天都背着照相机，骑着自行车，来往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各种人物风情，记录文明古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每一个崭新的变化。她对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及正在消失的一些优秀的、珍贵的历史遗产，拍摄了大量的资料。1951年至1953年，叶华同萧三一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

从1958年起，叶华应邀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台的记者，主要从事摄影工作，直到1964年她辞去这一工作为止。在此期间，她利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专题新闻记录电视片。她经常深入工厂和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不断加深了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正是基于这一点，就在叶华辞去民主德国电视台记者不久，她就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这一发自内心的需求仅隔3周就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批准。从此，叶华正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

辛勤的劳动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的十几年中，叶华亲手拍摄的《北京》《西藏上空的星星》《京戏》《小鬼》等作品先后出版，热情歌颂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反映了她对伟大祖国的赤诚之爱。

“文革”后焕发青春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像无情的恶魔“扫荡”着每一个幸福的家庭。1967年6月23日，叶华和萧三一起被投入监狱。叶华坚信自己

无罪、无辜,以勇敢的胆识,与迫害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甚至用竹签划破手指写下血书,证明自己的一身清白,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在狱中,叶华还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中文,学习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先后读完了中文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等。1974年10月10日,叶华与萧三被继续作为“管制对象”放出监狱,直到1979年9月26日正式平反。

“四人帮”的倒台,使叶华万分高兴,并从内心深感中国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认错误,为她平反,更使她坚定了对中国的热爱之心。她常常对周围的同志说:“我爱中国,愿意中国好。”1983年2月,萧三去世。1983年6月,叶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了参与国家大事的光荣使命。从此,叶华的精神更加饱满,生活更加充实,以全新的面貌踏上了新的征程。她还多次到德国、瑞典、美国等许多国家去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受到各国友人的高度赞扬。

1999年8月,88岁高龄的叶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名为《中国:我的梦、我的爱》的摄影展,并结集出版了大型画册《叶华眼里的中国》,在国内外赢得了一致好评。

尾 声

2001年12月3日,新华社发出了如下电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届委员,著名摄影家,国际活动家,新华社德籍专家叶华同志,因病于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叶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丁关根、田纪云、吴官正、温家宝、王忠

禹等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不同方式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

叶华同志在中国工作期间，热情投身于宣传中国的工作，曾先后在国外出版了介绍中国文化的画册《家》《京剧》《西藏》《西藏上空的星星》《小鬼》等。改革开放后，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以著书、办图片展等各种形式向世界介绍日益变化的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走过了90年的传奇历程，叶华终于又回到了他亲爱的埃及（萧三笔名）身边，双双扎根于他们深爱的中华大地。

（摘编自耶娃·萧〔叶华〕著：《世纪之恋——我与萧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叶丽茶主编：《来自异国的朋友——在中国有过特殊经历的外国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标题和小标题由编者所加，编者还对文字作了若干调整、补充和修改。）

后记

2016年的七八月，上海特别热。我和几位副主编几乎没有休息，全力以赴战高温，终于在9月初完成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三卷）：杰出人物》全部统稿工作。三位副主编虞卫东、陈心仪、刘夏妮辛勤工作，为本书最终完稿付出了大量精力。在资料汇编第三卷完成后，第四卷的统稿工作也将很快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① 本书收集的杰出人物资料中有些原来用的是繁体字，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都把它们转为简体字；② 本书中的英译中名词往往在不同的文章中有不同的译法，还有一些在旧时的译法与现在的译法并不一样，为了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我们没有加以改动或强求统一；③ 本书中不同的著述里可能提到同一件事和同一个人，出现重复的现象，也是为了保持资料的原汁原味，我们没有将重复内容加以删除。④ 本书中每篇文章的注释均具有其独立体系，因此我们对所有注释一般不加改动或删除，对不同论文中出现的相同资料来源，一般也不用“同上”的简化提法。

历史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的，但也是最为艰苦的工作。要将浩如烟海的文件、档案、报刊、口述记录等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没有一丝

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是难以取得成果的。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副主编外，我还要感谢为本书资料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各种支持的王健、周国建、汪舒明、张忆南、沈国华、黄崇峻、罗爱玲、戴轶尘、张健荣、陈俭、史蒂夫·霍赫斯塔德、索尼娅·密欧伯格、廖光军、周晓霞、郑文韬、袁帆、赵倩倩、赵静、张健、郭晴霞等其他课题组成员、合作伙伴及各方朋友。

我特别要感谢时任上海交大出版社的谈毅董事长、刘佩英社长、钱方针主任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徐荟，没有他（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愿我们这本资料集能为促进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主编 潘光

2016年9月10日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3卷

杰出人物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3卷 杰出人物

作者=潘光主编

页数=212

SS号=14282705

出版日期=2017. 08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 SBN号=978- 7- 313- 16558- 9

中图法分类号=K18

原书定价=78. 00

主题词=犹太人- 难民- 史料- 中国- 现代

参考文献格式=潘光主编.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3卷 杰出人物[M].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08.